

炎黄春秋



1948年，彭德怀在西北战场



1954年，瞿秋白的遗骨从锡林河打捞到北京后，周恩来总理亲手把他安葬在八宝山



中日甲午战争反思录

揭开甲午历史的黑匣子

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多余

“文革”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

忏悔

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天

9
94

藏族同胞的圣宫

——布达拉宫新风貌

举世闻名的祖国名胜——布达拉宫，是西藏同胞的神殿，是西藏的象征。它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经5年精心维修，已于今年8月9日全部竣工。这是新华社记者戴纪明最近拍的一组照片。



上：今日盛装的布达拉宫

中：布达拉宫壁画：五世达赖谒见清顺治皇帝

下：布达拉宫供奉的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本期导读

我和彭德怀交往 12 年

新华社记者田方，随彭总转战陕北，朝鲜前线还拍下了张珍贵的照片。在乱云飞渡时，他又跟孤独的彭总走下庐山……

大难不死 尚待后福

著名诗人公刘，在五十年代被总政一些人划为“右派”，他向我们讲述起在当年的“劳改”中，如何几经大难，又死里逃生的故事，读来令人酸楚。

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

文革中，他与狼共舞，审理过中共一大批领导人，但人性未泯，给我们沉痛地揭露他那支政治刑侦队是怎样对人性的摧残……

老舍为什么没领到诺贝尔文学奖

《猫城记》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瑞典学院拍定给老舍诺贝尔文学奖，当瑞典外交官在中国寻找这位大师时，他已饮恨离开了尘寰……

我的军事外交官生涯

尼赫鲁赞扬他“架起金桥”，有人却说他是“游击专家”；他为彭德怀“里通外国”辩诬，他向周恩来苦谏慷慨无度的军援……一件件秘事要闻，使你感慨万千。

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多余

瞿秋白就义前留下一篇遗言，曾有人认定是“叛徒自白书”，也有人说它是“严重的污点”。我们请两位有关人士来破解这桩近 60 年的谜案。

揭开甲午历史的黑匣子

一本秘而未宣的北洋水师军官日记，辗转到了作者手里，经他一番加工整理，给我们再现了那场甲午海战惨烈的真情实景。

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天

作者用锐利的笔，犁开历史深层的板块，从浩瀚的中日档案库里，录下一份确实无误的答案。

战将许继慎之死

威扬鄂豫皖的红军将领许继慎，蒋介石重赏拿他不得，张国焘却以个人恩怨，把他秘密处决……

下期要目

- △ 兴建天安门英雄纪念碑 内情写实
- △ 乒乓外交的内幕珍闻
- △ 鬼戏《李慧娘》冤案画上句号
- △ 四大家族及其子女的现状
- △ 古代廉吏拒贿术
- △ 世界屋脊上的神秘宫殿
- △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其人其事
- △ 错误批判马寅初的前前后后
- △ 两广总督叶名琛误国辱身记

顾问:

伍修权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张 锲 李 庄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副总编: 刘家驹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石福生

责任校对: 张凯夫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 码: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出版日期: 每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编辑部电话: 6016633-227

定 价: 3.20元

英杰谱

⑦① ④

我和彭德怀交往十二年
老舍为什么没领到诺贝尔文学奖

舒 云 田 方

春秋笔

⑥② ②②

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天
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

柳 山 张 嵩 山

殒星篇

③⑤ ④⑥

战将许继慎之死
张闻天在无锡的最后十个月

朱 亮 桂 诗 新

古镜台

⑤① ④①

中日甲午战争反思录
左倾盲动主义的飞行集会

一 丁 王 戎 笙

目 录

文荟园	神州光	古今谈	他山石	人海浪	赤子心	遗闻录	求实篇
⑦⑤ 咏「臭老九」…………… ⑤① 中国现行哀乐的由来…………… ⑨ 神之谜……………	⑦⑥ 珠穆朗玛峰上的奇迹……………	⑧⑥ 长春真人万里传道成吉思汗……………	⑧④ 冲垮大清王朝的川汉铁路股票风潮……………	⑦② 大难不死 尚待后福…………… ——我的「右派」生涯片断回忆	④⑤ 白话诗人徐志摩…………… ⑩ 我的军事外交官生涯……………	③⑥ 揭开甲午历史的黑匣子…………… ⑧② 胡宗南包围延安受挫记…………… ②① 冯玉祥征婚记……………	⑤⑦ 「多余的话」的历史真实…………… ⑤② 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多余……………
梁漱溟 宁 可 李冰封	王友齐	纪 流	王晓华	公 刘	王凡西 朱开印	邓加荣 立 之 述而作	林 勃 陆立之

我和彭德怀交往十二年

●田方



从这张照片谈起

这张照片是1951年5月我在朝鲜前线访问彭总时拍摄的，1952年3月《解放军画报》公开发表。彭总身躯魁伟、面露微笑、深沉而坦然自若的神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到朝鲜前线访问彭总、为彭总摄像的记者很多，为什么就选用了我所拍摄的这张照片？彭总十分严肃，难得一笑，为什么在紧张战斗的朝鲜前线却面露微笑？面对这张照片，根据我多次接触彭总的印象和回忆，使我想到当时这一微笑，乃是会心的微笑，是藐视敌人、胜利

在望的微笑，是真理在手、具有自信的微笑。

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特别是文革中“四人帮”对彭总的诬陷，《解放军画报》上那张彭总的活页照片，已经全部被销毁了。直到1992年春节期间找到了解放军图片社资料室的李贤光同志，经他耐心的帮助，才终于找到了这张亲切而熟悉的照片。

看到这张照片，当年解放战争从西北战场开始认识彭总、历次战斗中接触彭总、解放西安初期访问彭总、直到抗美援朝前线受到彭总的接见，以及庐山会议期间对彭总的所见所闻，都涌现在我的眼前，由于我还多年当过习仲勋的秘书，和

彭总直接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所以有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还是值得记叙的。

相见于青化砭战斗

1947年2月,战火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全面展开。新华社领导人廖承志和范长江决定让我到西北野战军担任随军记者。

3月19日,胡宗南23万大军侵占延安。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西北野战军两万多人在青化砭设伏。这是条南北走向的大川,确实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3月24日,本应是敌人到达的预定时间,可是,我们整整等待了一天,也不见敌人踪迹,有的指战员怀疑情报的可靠性,或者以为被当地群众泄漏了消息,乃至产生不耐烦的情绪。彭总却坚信敌军一定会来,而且,相信老区群众决不会向敌人告密的,他认为敌人孤军深入,有所顾虑。他再三强调部队要耐心等待,严格隐蔽,注意保密,决不能松懈斗志。第二天一早,我们再次爬上山头,只见彭、习等首长正在隐蔽在山头上的指挥所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此刻,敌三十一旅正沿川底的公路浩浩荡荡的来了,我们看到走在头里的敌人连机关枪、小炮上裹着的枪衣、炮衣都没有卸掉。正当我们屏息观察的时候,突然间,山头上我军信号弹升起,伏击部队陡地跳出隐蔽地带,从东西两侧以排山倒海之势往下冲杀,在腾腾的硝烟中,吓懵了的敌人已乱作一团,狼奔豕突,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三十一旅直属队及其九十二团2900多人全部被歼灭在这条十里长的川道里。旅长李纪云个子高大,慌乱中换了一套士兵军衣,很不相称地混在乱军之中,又加上他喜爱的狼狗始终跟随他的左右,所以很快被俘。

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只我一个随军记者,显然已不适应客观要

求。野战军政治部领导要我回后方请新华社总社设分社机构,携带拍发新闻的电台等设施,以加强对西北战场的报道;同时又委托我协助政治部敌军科长张光天带一个排的战士,押送李纪云和三十一旅尉级以上军官40多人到后方基地。

行军路上,最使李纪云感动的是,我们每到一地宿营时,当地群众对我们燃放鞭炮,载歌载舞,送肉送蛋,亲切慰问。夜间,我和李纪云同睡一炕,在彻夜长谈中,他承认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同时,他又十分感慨地说:“彭将军真是体贴我啊!这次出发,他把我这个败军之将,作为战场起义人员看待了。现在我才明白他的善德。唉!跟他在战场上还是死对头呢!”后来听说,李纪云不久就参加了我军工作。

5月,当我重返部队时,西北野战军在彭总指挥下已经取得了羊马河、蟠龙的胜利。5月14日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了有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祝贺。

忠实贯彻 毛泽东军事思想

三战三捷后,敌军龟缩到延安地区。彭总报请毛主席同意,我军引师西向;进击马步芳、马鸿逵的陇东、三边,再围攻陕北战略重镇榆林,诱敌北上,力求在运动中聚歼胡宗南主力钟松的三十六师。

果不出所料,当我向榆林进发时,蒋介石、胡宗南即令榆林守军坚守待援,急调延安地区胡军8个旅分两路向绥德、葭(佳)县急进;另以钟松的三十六师组成援榆“快速兵团”,轻装日夜兼程,限期进抵榆林。

当时我军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在榆林城南五里屯凌霄塔下的隐蔽出发地准备攻城。我夜间曾和任世鸿团长同上凌霄塔观察敌情,只见在城墙四周和城内高地燃烧起堆堆

篝火,彻夜严密防守。一次任团长观察到兄弟部队攻占了东南高地。他要我和他一起率部趁势攻城。当我们猛冲到城南时,由于没有重武器掩护,终于被迫撤出战斗。彭总下令挖地道到城墙下埋设炸药进行爆破,虽炸塌了几段城墙。也因无重火器配合未能登城。此时,北线东胜国民党军紧急南下,钟松的三十六师也已北上横山,逼近榆林,彭总鉴于攻城已不可能,即下令于8月12日撤离榆林。彭总却抓住钟松的“孤军冒进”,迅速集中我军主力,在钟松必经的沙家店待敌。

8月20日拂晓,我军分两部分别包围三十六师及其援军一二三旅。彭总当即发出歼敌动员令:“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全军振奋,斗志昂扬。钟松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下,化装乘夜暗逃跑了。经过激战,20日黄昏,我军已消灭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多人,俘敌旅长刘子奇。

沙家店大捷,西北战场从此由被动转为主动,8月23日彭总主持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亲临祝贺。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

接着又进行了清涧战役,活捉了师长廖昂。

廖昂是个反共老手,本是1936年11月红军西征中彭总手下败将。10月10日晚,彭总曾派员携带亲笔函进城对廖昂劝降,要他及时放下武器,可作战场起义将领予以对待,廖昂却想援军解救,拒绝投降。

廖昂被俘后,彭总曾找他谈话。他却一味埋怨胡宗南指挥不当。彭总说:“你们的失败,是人民反对你们,士兵厌战!”谈话后彭总留廖昂吃饭,警卫员端来一盆面条。廖昂却惊讶地说:“早就听说副总司令生活



▲1923年彭德怀在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俭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真是名不虚传！”彭总沉下脸说：“这样的饭还不好吗？老百姓还吃不上这样的饭！我彭德怀吃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觉得难以下咽，正说明国民党腐败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谈话后，廖品不禁连声赞叹解放军，称颂彭总为英明的将领。

彭总智喝空城计

1949年春季，我野战军正在黄龙山区进行整训，西北野战军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新华社也正式成立了新华社一野前线分社，我受命担任前线分社副社长（社长由一野政治部宣传部长兼任）。此时，我前线分社开办了新闻训练班，培训新闻干部进城后如何开展工作。一天，应我们申请，彭总在一野司令部接见了我们。他背着手踱边谈，诙谐地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哟，看那个《红楼梦》可不要老盯着宝玉、黛玉，悲悲切切、缠缠绵绵、卿卿我我；要多看看那个刘姥姥。这个土老婆子才有意思呢！没进城想进城，一进城就花了

眼，丢人、现丑、出洋相！”彭总一边说，一边还比划着刘姥姥又憨又俗又贪的样子，笑得开心极了。事后不久，彭总就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为进城作准备的中共第七届二中全会去了。我们才开始理解他这一席谈笑的深意。

在黄龙山区，不论我们自己或者敌人都知道，光靠一野现有实力，是无法解放西安的，只有等待华北十八、十九兵团解放临汾、太原，经过休整，西渡黄河编入一野以后，才有实力解放西安。

5月中旬，一野发动陕中战役，相继解放高陵、三原两县，逼近咸阳，并强渡渭河，20日我先头部队不费一枪一弹轻松地解放了西安。原来我支援解放太原后归建的两个旅渡黄河时，给胡宗南的探子发现了，胡宗南以为华北兵团过河了。他的20万大军就仓皇弃城西逃。彭总命令王震兵团司令员率三五九旅向西猛追，一直追到宝鸡。当时我军从潼关到宝鸡，八百里秦川仅有三万多人，战线拉长了，后方十分空虚，彭总命令王震三五九旅停止追击。胡宗南发现上当，立即掉头对我进行反扑。三五九旅且战且退，敌军已压至咸阳，西安城内枪炮声已清晰可闻。

就在这紧张时刻，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通知：彭总紧急召见。我匆匆地赶到设在西大街建国公园内的一野总部，心里沉甸甸的，在这种形势下，怎样挡住潮水般淹来的敌人？怎样保住西安？彭总见我要谈什么？有什么奇策呢？

我来到一幢老式而考究的平房里，一进门，看到张宗逊、闫揆要、甘泗淇、王政柱等首长早在等候。

“哦！记者来啦！”随着一声招呼，彭总从里屋出来，边走边笑，轻松自如。他不谈正题，而是背着手踱来踱去，极有兴趣地讲起了《三国志》中的“空城计”。讲到得意处，就放慢速度，用那双浓眉下的大眼睛

朝我诙谐地笑笑，带有几分幽默，几分诡谲。讲完了，又用奚落的口吻说：“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是个花花公子。我们欢迎他进西安，西安有的是羊羔美酒，漂亮姑娘多得很！”我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可《空城计》在彼时彼地能成功，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

“大道如青天，欢迎他们进来么！”说罢，彭总便信步走了。

我一时纳闷，彭总不是要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吗？怎么没头没脑地讲了一阵就这么走了。

“首长，彭总要给我谈什么？”我莫名其妙地问甘泗淇。

“就谈这个！”甘主任点了一下指头。

刚才我光听彭总说说笑笑，竟没有记下一字。经甘主任这么一点，才恍然大悟，定了定神，把刚才彭总轻松的说笑如实写好。新闻的主题是一野前线指挥员发表谈话，欢迎马继援进西安。语调保持了彭总的风格，谈笑风生，如有百万雄兵在手一般。新闻经彭总过目，就送西安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翌日晨，又在《群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城外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了，隔天，西安全城沸腾，鞭炮连天，鼓声雷震。钟楼附近，人山人海，连树上都爬满了孩子。人们欣喜若狂，欢迎星夜赶到的华北兵团。看到荷枪实弹，雄赳赳、气昂昂开向咸阳的队伍，人心落定，喜上眉梢。接着传来咸阳大捷，我军一举消灭了马继援的骑兵主力。

7月下旬，又取得了扶郿战役大捷，消灭了胡宗南主力四个军43000多人，西北战场从此大局已定。

赴朝慰问访彭总

1951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为了筹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动员新闻记者参加。当时我新婚

不久,妻子又怀孕在身,但在抗美援朝大义激励下,毅然报名参加。西北五省区各族各界代表27人组成慰问团西北分团,团长李敷仁、副团长亚马、曾震伍。西北分团出发前,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找我谈话,对赴朝慰问应注意事项作了亲切的指示。还亲笔给彭总写了慰问致敬信,要我赴朝时面呈彭总。到天津集合后,总团廖承志团长从各分团抽调成员组成总团部,我被分配担任总团的宣传组组长。

“五·一”前夕,慰问团抵达志愿军司令部成川驻地——一个废弃的大铜矿,洞内滴水很多,非常潮湿,地铺下垫着坑木,常有积水,可是包括彭总在内的志司的同志都长期生活战斗在这里。

“五一”节晚上,志愿军总部为慰问团举行欢迎晚会。会上,彭总和廖承志团长分别致词,在军乐声中献旗献礼;我给彭总面呈了习仲勋书记给他的慰问致敬信,彭总让我带回口信,对老战友习书记表示感谢。在朝鲜期间,慰问团团员和文艺工作者分别到各战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各部队,以及朝鲜各工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工青妇各界分别举行各种座谈会。中朝人民满含热泪相互拥抱等等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5月下旬,慰问团即将离开朝鲜,彭总应我的请求,进行了单独的访问,就在矿洞内一间简朴的指挥厅里,详细阐述了前四次战役的巨大胜利和第五次战役的战略部署。我迅速地作了笔记。访问毕,彭总又愉快地应我所请为他摄影。

人们心目中的彭总可能是威武、粗犷、严肃、少露笑容,特别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及其现代化装备,如何战而胜之?确实使彭总费尽心机。那次彭总谈的是第五次战役部署,这次谈话,也是打算利用公开的新闻报道,有意微露战机,声东击西,佯装在西线渡汉江南进

姿态,实际我主力部队已东移,达到了围歼敌主力的目的。所以那次彭总的访谈录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遗憾的是当时我在天津所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访问记”送到新华社总社后,编辑认为:文章虽未提名彭德怀,但从谈话的气魄、风度、口气、特点,也会被敌人猜到是彭总。唯恐泄密,未被采用。

当彭总在百忙中和我畅谈第五次战役部署时,当我们共同回忆起西安之战彭总笑谈“空城计”的往事时,我们又都忍不住会心地笑了。那笑容,从那张照片上深刻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不知庐山真面目

1959年6月间,我正随习仲勋副总理等一行,在河南、陕西调查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存在的问题。6月27日晚,陕西省委给习仲勋转来一份急电,要求习仲勋赶快返回北京转去庐山开会。当我们回到北京,国务院秘书厅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中,提

出不少意见:认为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规律看,现在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太急太猛;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全民炼钢”的口号不对,“小土群”可以不搞,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以不提,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的规定。要算政治账,也应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赔的钱可以买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政治也会影响不好。“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这些观点正好和我们豫陕调查所得观点基本一致。因此就让秘书厅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材料,由习仲勋带上了庐山。

6月30日,我随同习仲勋从九江乘车登上庐山。上到半山,在一个转弯的开阔处,前边的汽车戛然而停,下车的正是彭总。习仲勋也跟着下了车,这两位老战友又相聚了,他们了望江汉平原一片鱼米之乡,共发感慨。由于1958年秋季那次西北考察,彭、习虽未同行,但一前一后所到之处大体相同,所持观点基本一致。这次虽是中途相见,自然都有



△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时彭总在前线



共同语言。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想起当年陕北战场青化砭山头上，习仲勋把我亲切地介绍给彭总，彭总热情地表示欢迎后，他俩又忙着观察敌情、指挥战斗，那劲头和今天多相似呵，我心里倍觉亲切。

上得山来，按分配各住各处，夜晚观看毛泽东所点的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扇》，与会人员看得皆大欢喜。

7月2日上午举行政治局常委会后，传达毛泽东所说的：现在天下太平，四方无事，这次请大家上庐山来开个神仙会，半天开会，半天游山玩水，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还传达了毛泽东早有准备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宣传、综合平衡、体制、协作关系、公共食堂、学会过日子、三定政策、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团结等19个问题，以及他所概括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本估计，更使大家思想落实、心情舒畅。会议开始，按大区分组讨论那19个问题。彭总和习仲勋同在西北小组。我们当秘书的轮流担任小组会的记录。会议开得轻松活泼，问题

讨论得广泛深入，并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大跃进等等的经验教训。中央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在各小组会上发了言。彭总在西北小组会也讲了几次。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习海瑞精神受到鼓舞，坦率地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但是脑子也发热了一点。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忽视了‘工作方法60条’中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他还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些，农业产量有浮夸成份，全民办工业值得怀疑，大炼钢铁出了不少问题。他指出：对待错误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责任人人都有，包括毛泽东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他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要让人敢于讲话，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不能由个人决定。不搞集体领导，只由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这些话当时在我们看来也都是正常的，远比平时随便议论温和的多。习仲勋带来的国务院秘书厅所

写的材料，经报送周总理转报毛泽东后不久便印发了庐山会议简报。当我把这个消息通过长途电话告诉了国务院秘书厅的同志后，大家很受鼓舞。的确，当时会内外都认为这次庐山会议可以认真彻底地纠正“左”的错误了。

这样美好的日子大约过了十七、八天。会议原定召开半个月，但还没有要闭幕的样子。一天早饭后我去看望顾明（当时任周恩来的秘书）。他沉重地告诉我，说昨晚上总理讲：“现在庐山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么多中央委员竟身在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还在那里游山玩水！”我把这个消息向习仲勋透露后，他也开始感觉到某些不正常的气氛，从而倍加小心了。

原来彭总因鉴于会议将要结束，对于如何用综合平衡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还没有提出根本措施，他心中十分忧虑。他想如果由主席再强调一下，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但7月13日他往访毛泽东时，因毛刚刚睡下而未能晤谈，于是改为写信，不料毛泽东收到彭总信后十分震怒。当然，这时仅在政治局常委中表露，大多数人还蒙在鼓里。会议按各大区混合编组进行讨论，从会议的简报中陆续看到彭总意见书中提到的“得不偿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刺激人的话。但有的同志认为这些话虽则重了些，但整个意见还是积极的。以后又传闻毛泽东要大家好好读读战国楚宋玉所作的《风赋》，好像当前的形势已经从“青萍之末”刮到了“土囊之口”。总之，整个空气已显现紧张，再也没有人去游山玩水了。特别是7月21日张闻天的长篇发言，他以鲜明的态度，极言直谏，完全支持彭德怀的意见，甚至提到了“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样尖锐而敏感的话，这就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于7月23日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甚至提出了“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那样一类过去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敌对性的话语。从此，过去支持彭总意见的人，也人人禁若寒蝉了。随着7月26日毛泽东批发了对李云仲信（这是一封很有见解和代表性的信）的批示，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党内党外右倾活动有组织的猖狂进攻之势。这一来，庐山形势急转直下，会议的讨论又转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人表态和彭德怀、张闻天等划清界限。

这时，习仲勋曾要我帮助他起草一篇批判彭德怀的发言稿。但是，不仅我根本无从着笔，习仲勋也没有任何根据来批彭，因为好多观点他们本来都是基本一致的。最后习说：“算了，我随便讲几句吧！”

8月2日宣布正式召开中央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张闻天一封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的信。还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文章，介绍那位文学侍臣以骚赋名篇为楚太子

治病的方法为张闻天“治病”。林彪、康生等人就乘机上纲上线。林彪把彭德怀定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康生把彭德怀、张闻天比作布哈林，说他们企图改换中央委员会、想改换主席。会议的高温升到了大爆炸的程度。经过几次紧张的集中批判，定下了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军事俱乐部成员的种种罪行。8月13日下午彭德怀在全体大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但他最后仍明确表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8月14日的大会由黄克诚作了检讨，至此，彭、黄、张、周定为反党集团，受到全国公开的批判。8月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通过了全会公报和两个决议后，总算“圆满闭幕”！

从此，把原定以反“左”作为庐山会议的主调，推向了它们反面——“全党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倾”

斗争席卷祖国大地。从此，越反越“左”，一步一步地终于导致了那场历时10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

8月17日，全体与会人员下山到九江飞机场，以15分钟为一次航班飞返北京。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在微山西侧高空，一场暴风雨迎面袭来，全部飞机中途临时改降济南机场。中午在济南一个宾馆里就餐，整个食堂桌桌满座，唯独彭总孤零零的一人一桌吃饭，没有一人和他同桌共餐。上山下山，此一时，彼一时，有如隔世。从此，1952年3月《解放军画报》上那张彭总的照片就完全消失了。

令人欣慰的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彭德怀的冤案也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彭总在全党全军中的崇高地位。威而不猛的彭大将军永远在微笑！刚正不阿的彭总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责任编辑 方实）

神之谜

○李冰封

韶山树起的毛泽东雕像底下，如今供品罗列，有人点蜡烛，烧香，化纸钱，磕头。跪拜者大都是求财，求官，求子，求平安……一个世纪的巨人，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彻底的无神论者，竟然变成了一群有神论信徒膜拜的对象，这情景，固然有趣，却也引人深思。

早几个月，在我住处附近的公园，举办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灯展，公园的一角，竟出现了用塑料制的约三米高的赵公元帅神像和一对金童玉女，神像下设有祭祀用的香炉烛台跪垫。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大钱箱，那是供祈求者捐款用的。每天我都要到公园去散步，只见在烟火袅袅中，一些服饰入时的青年男女，在那里伏地膜拜。磕头之后，神色颇为自得。此情此景，我想起鲁迅曾在《两地书》中写的：闽南佛学院宴请太虚法师，有乡下女人见到太虚，“跪下大磕其头，得意之状可掬而去。”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乡下人诚敬的是一个名闻遐迩的大法师，而今天是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人，跪拜的则是塑料神像，而且这神像竟是和纪念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的。

年初，在一张报上，看到一位名演员的访谈录。他谈到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是个神”，因为“他做了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我们十几亿人都爱他，真心实意地爱他，自己在心里也不敢反对他，所以我说毛泽东是神。”他还说，“我们的错误在于总强调他是人。”哦，原来如此！神绝对不同于人，芸芸众生，对于神的旨意当然只能赞同，不容存疑，“诚则灵”，独立思考者就该倒霉。趋奉神的旨意，求神的人才能得福。强调毛泽东是人，无疑是错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也必错无疑。

法国一位著名思想家丰特奈尔说过：“人以自己的模样创造了神。”读了这位著名演员对人们的告诫，想到上述一切，我好像懂了一点历史为什么经常会对中国开玩笑的原因了。

（李冰封：原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我的军事外交官

生涯

●朱开印

整理者前言

朱开印同志,1917生,1949年底,由人民解放军某师政委岗位上奉调至中央外交人员训练班学习,次年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馆首席武官,1956年奉调回国任国防部办公厅外事处长,后改任军委总参外事局常务副局长,直至1980年调四川省军区担任领导工作。朱老现住四川省军区干休所,闲时常与我谈起他在长达30年的军事外交生涯中的故事,颇多鲜为人知的要闻趣事,也颇多朱老回顾时的感慨与思索,兹摘记其中几章向世人道及。

(整理者:丁隆炎,四川作协副主席,军队作家。)

解放战争刚结束，我调到外交部训练班学习。

训练班设在北京西郊一座幽静的院子里。同学有一百多人，大多是从部队调来的师团干部。

开学典礼上，总理来了，他鼓励我们说：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是战将，有的还是英雄模范，又都有些文化，更有利的条件是，你们忠诚党和人民的事业，懂马列，懂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原则。现在最重要的你们要安心学，虚心学，……

训练班的主要学习科目，是我国对外的方针政策，此外是世界历史、地理与当前形势，要学外语和一些外交场合的礼节礼仪，要学穿西装，吃西餐，跳交谊舞等等。

几个月后，我们这些赳赳武夫都西装革履地“打扮”了起来，一个个斯斯文文的迈步、握手、鞠躬，吃饭用刀叉……总之，衣食住行都开始适应外交场合。

结业时，我被任命为驻印度使馆武官处海陆空首席武官，并参加筹建使馆的工作。

在印度任上的几个故事

印度受外国侵略的历史长达400年，和我国有相似的历史，故对在自己近邻出现一个彻底赶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新中国还是高兴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宣布和我们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印度。

这个国家受英国的影响很深，外国资本家控制着许多经济部门。人民贫富悬殊很大，政治的宗教的种姓间的斗争很激烈，上层人物普遍对于新中国奉行的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对总理尼赫鲁先生采取的对华亲善政策不是一概支持，有的人还寻机挑起事端。

如何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除总理给我们的多次指示外，使馆人员临赴任前，毛主席又亲自接见了我们。明确指示，你们是作为友好使者去的，要学习人家，尊重人家，不干涉人家的事，但也要坦诚相告，我们两国各自当好自家的家，……毛主席还说，我们是个好邻居，和不同制度的国家能相处好，不打别人的算盘，对所有友好的朋友我们会回敬十分的友好……

我到印度不久，遇到的第一个笑话和麻烦是我的名字，“朱开印”三个字。

印度陆军部一个官员问我：“你怎么叫这样一个名字？”我说：“我从小就叫这个名字。”我没在意。

后来一位记者又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开始警觉了，反问道：“是不是你觉得我这名字有什么问题？”这记者还算友好，他说：“朱，在中国就是红色的意思，对吗？‘朱开印’，就是你要来开创一个红色的印度，对吗？”

我大笑：“哪有这个意思？”接着我很认真向他作了解释：“这名字是在我初小读书时，老师给我起的。希望我将来当官掌大印。”他又问：“真的不是你来当武官前才用这个名字？”我说：“朋友，假若我真想来开创一个红色的印度，岂不是一个名字就把‘秘密’全泄露了？”

这位记者才又告诉我，为我的这名字一些人在我来之前就讨论研究了好一阵。

不久，他把我的解释公布在他们的报纸上。

后来，我和袁仲贤大使回国述职，把这个笑话说给了总理听。总理也好笑一阵，笑后很郑重地说：朱开印，你作得对，遇到误解要坦诚相见，公开解释。以后听到什么，都要动脑子，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误解。

在印度，我们是严格遵照国内指示，一言一行都着眼于加强中印友好，真诚热情，广交朋友，不搞人家的鬼。曾有人找上门来要向我提供情报，我坦诚告诉他，我们没有这个任务。那时我们和苏联友好，是“一边倒”，自然我们把苏联人当“老大哥”，没有什么不对他们说。苏联武官对我们“不搞人家的鬼”这种原则很不以为然，曾说过“不搞鬼哪来的情报，不搞鬼要武官干什么？”

但我们那时对有人可能搞我们的鬼估计不足，警惕不够。

印度国防部有几个人对我说，他们没有中国地图，有也是很久以前的，要我帮忙在国内代购几份新出版的。我请示了袁仲贤大使。大使也以为他们真没有，说：地图也不是保密的，这个忙可以帮。

我把在国内购来的地图送去了。

没想到，印度一些报纸很快登出了这份地图，还说是中国首席武官向他们国防部“正式”提供的。“中国居然将印度领土划入了它的版图，这是对印度领土主权的公然侵犯……”等等。

国内知道了，立刻发来电报查询，有没有这回事？谁送去的地图？为什么要这样作？

我写了报告，说明了送地图的原委。

后来根据总理指示，我和袁大使向尼赫鲁先生及友好人士如实说明：地图不是我们主动提供，是某人某人再三托我们代购的。也说明：中印两国确有一些边境线界限未定，我们的地图沿用的是历史上的习惯划法，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两国可在今后适当时候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这件事也就暂时平息了。

总理为此很生气，对我的批评很严厉：“简直是幼稚无知，甚至是一种卖国行为！”幸好袁仲贤大使揽过了主要责任，我才免受处分。

我们回国述职时，总理又一次批评我：“如果不是你朱开印送地图给人家，是他自己买的，我们很好回答人家嘛，哪费得了那么多的口舌？”袁大使再次检讨：怪

我们知识不够,经验不够,只想对人家友好,没想某些人心怀叵测。我在一旁实在憋不住了,说:“总理,你批评我什么都可以,说我是卖国行为,我想不通!”我委屈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总理笑了笑:“朱开印,我不这样批评你,你能记得住这个教训么?我再三说过,你们出去,一言一行不是代表你个人,是代表我们国家,我们军队,你懂吗?”总理见我还是不抬头,又说:“当然,你的意见我还是要接受的,气头上的话,说过了,请你原谅吧!”

我抬起了头,久久望着总理,心里的千斤重负也就释然了。

从那以后,我确实事事不敢马虎,总是思前想后,考虑每件事该如何应付,每句话该如何说,如何使自己的言行与国内相应的政策立场对上口径,凡事都向国内请示报告,避免犯错误。

1953年夏天,我因事回国,乘的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先到香港。赶上香港上空浓云密布,飞机转了几圈也无法降落。机上宣布,要改降台北。

随行的还有我们使馆一位司机,他是回国休假的。我一听,要改降台北,那还得了!跳起来向机上人员抗议。他们再三解释,说按国际航空协议你们的安全不成问题。我们还是不依,争执不下,我们提出给我们降落伞,请机上的人打开舱门把我们扔到我们国家的陆地或海洋上。他们问,你们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我说:没有!我们只为不去台北,宁愿死!机上人看我们如此坚决,大概也害怕一个中国武官(争吵中我们当然要告知

对方我们的身份)在他们机上出了问题脱不了责任,只好又提出改降马尼拉。

马尼拉是菲律宾的首都,当年的菲律宾是美国在东亚的亲密伙伴。有个以反共反华为主旨的东南亚条约,总部就在马尼拉。我们还是不愿意去,提出能否改降缅甸首都仰光,机组人员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再没有商量余地啦,改降马尼拉的油料也只是勉强够,全靠上帝保佑啦!

好吧,那就飞马尼拉!我们又提出处理一下我们随带的文件,得到同意。在我们点燃大把文件塞进厕所马桶时,没想到马桶底部是可燃的油质,“蓬”一声窜起老高的火焰,幸好被机上人及时扑灭。当我们走出浓烟滚滚的厕所,机上的乘客全都一脸惊恐失色,对着我们直摇头: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命都难保的时候,你们还管什么文件呢?

我打定主意,到达马尼拉后,我们坚决不下飞机。

时值炎夏,马尼拉又是酷热地带,乘客们都下了飞机后,机舱内骤然变得像蒸笼一般燥热,我们身上的汗水像水泼似地往下流,机组人员和菲律宾的CID人员,都来劝说过我们下机歇息,我们都回绝了。一会,就见机舱外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把飞机团团包围了,然后又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发动机声,机舱内的温度有所下降,原来是人家弄来了几台鼓风机对着飞机吹。

我正思忖着可能遇到的凶险该如何对付时,从舷梯上来几个政府官员,他们都会说中国话,很有礼貌地自称代表本地海关前来看望武官先生,对我们的到来



马尼拉时,随董仲贤大使检阅仪仗队(右1是朱开印)

表示欢迎。“如武官先生觉得方便的话,希望你们下机到宾馆住宿,更欢迎你们到市区游览,我们很乐于为武官先生效劳……”见我们执意不受,他们又提出“请允许我们在机上为武官先生的到来略尽地主之谊。”

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他们将怎样尽地主之谊时,又上来一群人,在机舱尾部收拾出一个地方,摆上长条桌,侍者们立刻从下面鱼贯地端上了各种饮料食物,摆了琳琳琅琅的一大桌。

入夜,机舱内更凉爽了些。几个官员频频邀请我们入席,轮番着说,他们都是华侨,大家其实是一家人,都是炎黄子孙,很高兴见到武官先生,希望武官先生转达他们对祖国最诚挚的祝愿问候……

我们也真饿了,也感到人家的盛情难却,于是入了席,但我只是笑,点头,应和着举杯,只说“谢谢!”在我偶尔转头向机舱外看时,他们立刻会意地指着舱外的士兵说:“这是出于对武官先生的安全考虑,请千万不要多心。”

吃喝之后,他们又再次邀我下机,我只好说:“下次再来,这次就不打搅啦。”他们又希望我留下联系地址,说一定向我发出邀请……我仍只是点点头:“以后再说,再说……”

第二天,飞机飞回香港。我刚下机,就被一群记者围住了,直对我拍照、提问,我只好从候机楼后门坐车到新华社驻香港分社。

后来,我才得知,原来昨天有几家菲律宾晚报登出了消息,说什么“中国驻新德里首席武官秘密抵达马尼拉……”还称我是什么游击专家,“可能有与非共丛林武装会合的意图,但在机场受阻”等等。

报上还登上了我在飞机上的照片,可能是一些曾在机舱门口探头探脑的记者偷拍的。

当天香港有几家报纸也转载了。没想到我一夜之间成了个新闻人物。

回到北京,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在机场接我,说总理也知道了消息,要我立刻去见他。

总理见面就问:“朱开印,怎么回事,你跑马尼拉去啦?”

我说:“我也不想去呀……”

总理说,情况他都清楚了,“我不是不放心你,是怕你被绑架了。”总理先表扬了我,不下飞机是对的,否则就更说不清你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去的,报纸还不知会制造出什么新闻来。看来总理急着要我去是要了解到机上来的几个官员对我的态度和说了什么。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过分谨慎,表示大为遗憾:“朱开印,你失去了一个多好的机会呀!我不说我们要广交朋友吗?这么热情好客的主人,又是同祖宗的亲戚,你应当更热情

些嘛,他祝愿你的国家,问候你的人民,你怎能不有所表示呢?人家邀请你下次去作客,你应当说,好,我一定来,什么时候接到邀请我什么时候来!你可以留下地址,等人家的邀请嘛!”总理认为,那几个人热情表示的盛情款待,是一个重要信息。“朱开印,你这趟没白去,你让我看到了我们的邻居还是很希望和我们交往接触、友好相处的。”总理还感慨良深地说:“本来嘛,大家都生活在亚洲,在一个地球上,何必老是互相提防、害怕,搞得很紧张呢?”

我心里说,我哪不知道应当礼尚往来,哪不想对人家表现得更热情亲切些呢?怕的是说错了或被人歪曲了呀!

总理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朱开印,不怪你,怪我对你们限制过死,有时批评多了过了。”我想,总理可能又记起了上次为送地图批评我的事。我说:“总理,不怪你,怪我学习不够,灵活性不够……”

对尼赫鲁先生的印象

在随袁仲贤大使递交国书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尼赫鲁先生。不久,适值我国国庆一周年,尼赫鲁亲自来参加了我们使馆的盛大招待会,袁大使拉着我走到他跟前专门作了介绍:这是我们首席武官,他过去是我们解放军一位指挥员,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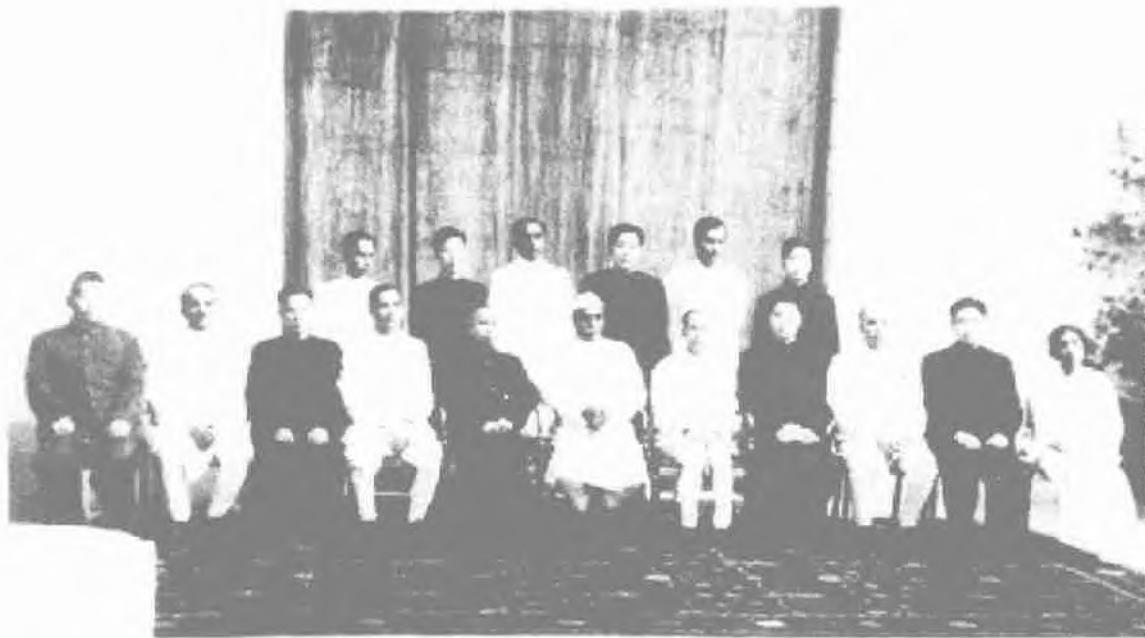
尼赫鲁亲切地握着我的手:“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希望你多与我们军队交往,介绍你们伟大军队的历史和经验,希望我们两国军队也建立很好的友谊。”

后来,我多次见到尼赫鲁,或随袁大使拜会他,或受他召见。1954年,我们总理访问印度与尼赫鲁先生商定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一直跟随在总理身边,每一次遇见他,他都要和我说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亲切、随和、平易。中印两国宣布建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好关系后。是中印两国友好情谊日益热烈发展的黄金时代,尼赫鲁先生对我们大使馆的工作备加赞扬,曾说:“你们是在喜马拉雅上空架起了中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金色桥梁的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主席倡议的,周总理将这些原则具体化了。五项原则是我国领导人对当今世界所作的最杰出的贡献之一。

尼赫鲁先生还和我们周总理共同制定了宣言。这一文献在全球得到了更为深远广泛的影响,至今仍是许多国家呼唤和平与友谊的伟大旗帜。尼赫鲁先生的功绩是永远不容抹煞与否定的。

那次会谈中,两国历史上遗留的分歧与争端,包括



《尼赫鲁接见袁大使（左五）和朱开印（左一）》

后来发展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问题，也曾时有流露，但两国总理仍能彼此宽容谅解，达成了“求大同，存小异”的共识。

会谈中，印度方面提出请我们总理去克什米尔参观游览。这使我们感到很为难，去吧，那里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一直有争议的地区；不去吧，印度方面在与我们商定日程时坚持这一建议，尼赫鲁也敦促总理成行。但总理表示，这次就不去参观游览了。他对尼赫鲁说：我们商定了五项原则，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国家遵循它，信赖它。为此，我想请你以此为契机，主动向巴基斯坦伸出手，请他们就克什米尔问题和其它争议坐下来商谈，好吗？为了不在这之前给你们会谈造成不利的气氛，克什米尔我这次就不去了……尼赫鲁只好点头同意了。

总理为此严厉批评了我们：我们订立五项原则不是为了拉起一个小圈子，而是要拉起一个反帝反殖的世界大团结的大圈子。如果我们为了结交一个朋友去伤害另一个朋友，那岂不是一面写上五项原则，一面背离了这些原则？

几年后，中印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以致引发了激烈的边境武装冲突。出人意外的是，尼赫鲁先生最终未能抵住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和压力，他的态度的变化不能不是加剧这种恶化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尼赫鲁先生是把与我国友好作为他们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可谓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在抵制他国内右

翼反华势力一次次猖狂攻势中，我知道他是很顽强的，排除了很多次艰难局面，也承担过不小的政治风险，最终才实现中印两国共同向世界高举和平共处旗帜的美好日子。1954年，他和他的女儿英·甘地访华归去后，更是对新中国的成就由衷敬佩，大力宣扬。他说他在中国每一块土地上，每个人脸上都看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了这个国家万众一心的团结，看到她光辉无限的前景。我在那里的朋友们见到我就说，尼赫鲁访问中国后有如朝圣归来的圣徒，三句话不离“伟大的中国！”

尼赫鲁生活简朴，总是穿布料衣裤，小白帽，白大鞋，据说他的夫人是在他40几岁的盛年时过世的，以后一直没再娶，一直和他的独生女儿英·甘地一家生活在一起，这在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中，尤其在尚存多妻制的印度上层中是少见的。

我多次见他每在群众集会上出现，便是万众欢腾，欢呼入云。无论对上层还是对衣不掩体的人都恭敬致意，亲切询问，一群群人争着亲吻他的衣角，亲吻他踩过的土地，对他敬如神灵。我了解到，他有如此崇高威望还是来自他为印度争取独立长期艰苦奋斗的经历，更来自他的高尚品德，绝大多数人从内心认为他是印度各民族的骄傲与团结的象征。

尼赫鲁和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也有他的局限性。当时的印度上层较普遍受英国绅士的影响，自视甚高，对别人再羡慕也觉得总比不上自己。我见过他们军方有个文件，那上面以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来判断，对比各国的军力。这方面它认为中国是最不行的，宣称印度士

兵对中国士兵足可以一当十,甚至更多。后来他们的军事代表参加了朝鲜停战监督,对这种估计作了修订,认为中国士兵能吃苦耐劳,但即使加上这个因素,印中两军的单兵战斗力仍是一个能抵六个。军方的这种乐观估计,在尼赫鲁本人一次讲话中(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前报上公布的)也居然认可。大概是基于这种估计,更由于中苏分歧,苏联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对我国横加指责,给印度加油打气,才使得印度上层原本激烈反华的某些派别占了上风,在原本存在的中印两国争端尤其是西藏主权与边境线等问题上大肆兴风作浪,促成了尼赫鲁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接着才有印度向我国发起一连串的政治攻击与武装挑衅,其结果则是我国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

尼赫鲁是1964年去世的,活了76岁。在此十年前,我所见到的60多岁的他非常健康,也常看到他晨起锻炼,能倒立行走,能将他一个七八岁的外孙(后来的拉·甘地总理)一手高高举起。我推测,他后来健康状况恶化可能与他发动中印战争有关,他过高估计印度的力量,结果一败涂地。他很可能是气死的,悔恨死的!

但是,尼赫鲁先生在我的心目中,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品德高尚的领导人。我欣慰地看到,中印两国目前正日益发展着友好往来与兄弟情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伟大精神再次在更广泛坚实的基础上实现。

巴卢库和许世友的友情

巴卢库是当年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当苏联和我国的关系开始恶化时,阿尔巴尼亚就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由此阿尔巴尼亚也受到周围其他国家的很大压力,处境很孤立很困难,但它很坚定。所以毛主席称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我国在各方面给予支持,物资上的支援更是有求必应,慷慨无私,无论我们自己多么困难,总是把好的东西首先大量地供应给他们。据我所知,仅枪支就两倍于阿尔巴尼亚的人口总数,就是说每个阿尔巴尼亚人能得到两支枪。为什么要那么多?他们的理由是,一旦战争打起来,我们两国远隔万里重洋,运输可能受阻,需得事先有大量储备,方可有备无患。可以想象,在其它物资方面也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们援助的数量有多大!

阿尔巴尼亚经常派来的使者就是巴卢库,和我们最友好的代表人物也是这位巴卢库。

这人是個很真诚很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对全世界

未来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具有充分的信心,但也有他自己的思考。常常向我谈起,他根据苏联的发展历史,认为社会主义的旗帜被盗用,最后只留下一个名号,而实际上把历史引向倒退,使人民重新堕入黑暗深渊也不是不可能的。应当怎么办?这方面的道理他也讲过不少,但我对他的敬佩不是听他的道理。我几次去他们国家,看到他生活很简朴,每到一处与人民、士兵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娱乐。阿尔巴尼亚人口不多;当时不过百万,地方也不过我们一个县那么大,几乎人人都熟悉他,谁都可以和他说上话,他对每座军营、每个山洞武器库、每个阵地的火力配置都了如指掌。

巴卢库和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都有深厚的友谊。毛主席对这个人也很赞许,“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一些话,就是最先对巴卢库说的。周总理每次见到他都很高兴,两人说话都很随便,而且一直都在开怀大笑,没有一般外交场合的那些礼仪。自然,每次来要东西,尤其是要重要的东西,阿尔巴尼亚总是派来这位巴卢库。他了解我们国家的情况,在提出要求时还是看得出他有些难于张口的窘促之态,但他每次都达到目的。我想,除了别的因素外,我们国家领导人对巴卢库很有好感、很信任大概也是因素之一。

巴卢库和许世友可以说是一对“铁哥们”,两人的友情很深厚,很特别,也很有趣!

巴卢库每次来中国,都要和许世友见面,总是没完没了的话说。两个性格豪放、感情丰富的人在一起,总是那么心灵融和、撞击而生发着火花。

巴卢库和许世友一样,青少年时代都历尽艰辛,后来都当过工人,又长期在战火中出生入死,两人都是传奇式的英雄。

巴卢库说,你是一员虎将,我在你身上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原由,看到世界无产者必然摧毁这个旧世界的巨大力量。许世友说,我只会猛打猛冲,你才是一个文武全能的帅才。巴卢库说,有一天我请你到我们那里去指挥战争。许世友说,指挥战争不能靠哪个人,靠的民心,靠一个党的路线正确,在张国焘手下,再多的精兵强将最后也只能走向败亡。巴卢库不只一次说过:是呀,是呀!无产者最怕的不是敌人,而是各种各样的张国焘……

巴卢库不大能喝酒,但和许世友在一起时,总是开怀畅饮,也有酩酊大醉的时候。醉了,他也在对着许世友笑:老兄,你要再年轻些,身体再好些,我向毛主席再不要别的支援,只要一个许世友。

只要一见面,他们就难分开,有次在江河里打野鸭子。许世友每发必中,巴卢库则几枪才能打着,他对许说:你是神枪手,常胜将军。许世友说:当统帅的不能与



▲随李德生出访罗马尼亚

士兵以枪法论高低。打上的野鸭子就在船上烤来吃。许世友亲自掌火，巴卢库吃了不少，连声叫好。许高兴得大笑：北京的烤鸭师傅教给我的手艺，但他烤的鸭也不如我的鲜嫩。他把亲手烤的鸭装了一大包，送给巴卢库，要他带回家给他家里人尝尝。

这两个人纯属朋友交往，并没有规定的公务要商谈。但有次许听说巴卢库想要一台精密的测绘仪器，问我中国有没有？我说有，只两台，从国外高价买来的。许立刻说，给他一台。我说恐怕不行吧，话没说完，许火了！谁说不行，我是国防部副部长，我说行就行！我说回京再请示一下吧！许说，朱开印，你别给我打官腔，扒了你的皮我也认识你！许世友是我的老上级，喝酒也常给我下命令：你敢不喝，我拧了你的脑袋。有一次我们每人都喝了两瓶茅台。

最后一次巴卢库来，来前他在国内地位已下降，他对许说：“老哥，我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中国，最后一次见你了！”我们都没听出他话里有话。忠厚率直的许世友说：我知道，你们那里局势紧张，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万一你一时来不了，我来看你，拼老命我也来。

巴卢库回国不久，就被霍查撤职，接着被关，最后

被处死。给他加的罪名是投靠希修反，出卖祖国，向敌人提供军事秘密等等。当然不是因为他投靠苏联，他对苏很不满是阿尔巴尼亚人所共知的。霍查搞掉他，是因为霍查一伙忘恩负义，要大肆反华，怕巴卢库成为无法对付的反对派。事实上，巴卢库在抗击法西斯的游击战争中地位不比霍查低，功劳影响比他大，后来在国内人民与军队中威望很高。他也确实是坚定主张与中国友好，积极宣传中国的无私援助，努力为巩固发展阿中友谊奔走呼号的人。巴卢库对我国领导人，尤其对许世友确实无所不谈，但从未谈过他们党内的分歧。至于所谓的军事秘密，他阿尔巴尼亚的军事装备包括武器、车辆、穿的吃的什么不是中国无偿提供，他的一切军事设施什么不是我们派去的专家帮助建立，他的国家每一寸地面哪有我们没有去过并了解得一清二楚的，他对我们有什么军事秘密可言？

巴卢库被处死后，我们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很生气！据说，许世友气得几天没吃饭，气出一场大病来。后来许世友见了我们，气得喘作一团，不断声的呼唤：巴卢库，巴卢库！两眼泪汪汪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霍查还杀掉了包括谢胡在内的他所怀疑的“中国的人”。随巴卢库来过中国的许多人都被搞掉了！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想起巴卢库的一句话：无产者怕的不是敌人，而是各种各样的张国焘！

“文革”中我们在 对外军援上的失误

“文革”中，我们总参外事局又担负了对外军援方面的具体工作，我又是具体承办人，对这方面情况了解比较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许多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国家纷纷争取独立解放，我们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援是理所当然的；一些国家独立了，百废待兴，有的建设上有困难，人民生活很苦，出现政治上不稳定，他们找到我们要求援助，而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大国来说，做一些雪里送炭这样的国际主义义务也是应该的。

但到了“文革”期间，我们在这方面口子开得太大，有的国家的要求有增无减，什么都要，没完没了，于是在供求上出现了很多问题，闹得我们难以应付，落得最后出力不讨好。

如像阿尔巴尼亚。他的国家已转入正常建设，军队也没有仗打，也没有很过不去的困难，可是有那么几年，他们代表团一个接一个来，一来就是长串“帐”单，且是一副不容讨价还价非给不可的架势，好像我们这儿是金山银山，取之不尽。仅在1972年这一年期间，我

们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偿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5000元人民币之多,毛主席说过,我们把他们包下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他们全国都饱了!可哪里只是包他们吃饱饭?各种军事装备,各项建设器材,医药,日用品,还有他们需要而你中国没有只有到外国去弄的外国钞票……他们都把手伸到你鼻子跟前:拿来吧!

越南也如此!我们否定,越南赶走美帝主要靠他的人民英勇善战,但全世界谁不知道,这个仗没有我们中国在背后支援,他能打出个什么样的结果来?前后我们给了他们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各种援助,光各种枪支、火炮、车辆大约够越南人口总数,几乎能铺满他整个国土,先进的军事装备,我们刚研制出来,自己军队还没装备上,先给了他们!刚装备上的,从我们部队撤下来给他们!我几次到越南,亲眼见到,越南每个军人从头到脚都是中国的供给。穿的衣衫、吃的粮食、用的武器不说了,连吃的药、抽的烟也是中国的。当时的越南军人见了我都说这个,武元甲不止一次对我说,没有中国,这个仗我们一天也打不下来。到后来,越南漫山遍野的山洞、仓库都堆的中国的援助物资,火炮枪支弹药、汽车、被服、医药……什么都有,好多都发锈霉烂了,越南人后来打在中国国土上的炮弹,射向中国人的枪弹不知有多少就是中国制造的!

我们当时还有一项义务,就是帮这些友好国家到外国购买先进的装备、技术与器材。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将我们高价买来的“无偿”援助卖给了别人,价钱低于我们买进的一半甚至更少!出于“友谊”,我们有苦说不出!阿尔巴尼亚曾将我们进口来的用于制造某种精密机器的不锈钢材,制作成门窗挂勾出口。其他国家也干过这类事,反正来得轻易,“崽卖爷田不心疼!”

还有,这些国家派来的留学生都由我们包干,学习吃用费包了不说,还得请他们到处去参观游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仅越南每年派来的留学生数以万计,还有他们的飞行员也是每年成千的送来培养,后者的培训费更高,简直是与他们体重同等的金子堆出来的!我们当时根本不曾把他们当外国人,更没想到他们有的还会变成敌对的外国人,认为他们都是同志加兄弟!

我具体负责这些事情的联络与落实工作,说实在话,我不是看不清我干的事是在填无底洞,我也不是看不到我们国家很困难,这样的打肿脸充胖子给我们的人民增加了多大的负担。每接到一项“帐单”我就挠头,就痛心,每看到一次援助协议的签署后外国人的笑脸时,我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对人民犯了罪的沉痛之感!我听说过,有一次向越南运送粮食的车辆在四川境内被一群饥民拦截,他们爬上车割开粮袋,捧起生米就大嚼大咽,一饥民看到粮袋上写有“援越”字样,立刻大喊:

这米吃不得,这是给越南兄弟的!所有的人都连忙住手住口,连吃进嘴的都吐了出来,还把口袋缝合好……当时听了这故事的人,包括我,都落了泪!今天,我还在想,当越南人也听到这故事时,他们心里有何等感想!

当时,这些情况和我的这种情绪不是没向总理流露过,他也说:是呀,我们太慷慨无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也很清楚,这些情况总理比我了解还多,他心里比我更难受,但却无力改变这些作法,因为,当时对外援助的原则是主席定的,有些“账单”是主席答应下的。

主席的想法也有道理。他说过,不能在别人放弃反帝反殖的大旗时,一些坚持革命斗争的国家成了没娘的孩子,我们宁可勒紧裤腰带,也不能让人家认为中国只是口头上支持他们。所以主席多次对一些要东西的外国人表示,我们与你们风雨同舟,中国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们是说话算话的。主席也很明确,我们并不富裕,困难也不少,但我们宁愿作出牺牲。“我们的援助是无条件的,我们决不作军火商。”主席有了这个原则与许诺,总理只好勉强照办了。

主席后来也发觉了一些外国人的口袋填不满,深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想也有总理的建议促使他改变了想法。在1972年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变化后,他曾几次对来要东西人说:我们现在也是困难重重呀,我们靠的自力更生这几个字,世界上能救自己也只有这几个字!此后主席也对我说过:朱开印,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过去太天真太热情了?我不知所答,主席又说,是的,我们要精心细算,量入为出,以后要卡紧点,要留有余地,假若我能帮人家十分忙,只能答应七分,不然人家要失望,失望多了就要翻脸呵!

为彭老总“里通外国 罪行”辨诬

1956年3月,我从印度奉调回国任国防部办公厅外事处处长,由于军队外事方面的工作都是彭总直接抓,总理特地交代我:你的任务就是在外事上给彭老总当好参谋,凡事都请示他。故那三年多的时间内我和彭总接触频繁。庐山会议前夕,我又随他访问东欧诸国和苏联,跑了一个多月,每时每刻都和他形影不离;他本来是个藏不住话的人,对我更是毫无顾忌,遇有什么观感,好的赖的都随时说出来,从无隐讳。今天,我要如实地说:彭总在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冒死直“谏”,和他在此之前的东欧各国的访问是有关系的!

记得,我上任后第一次到国防部五楼上去晋见彭总,在门外喊了几声报告也无应声,正想转身离去,门开了,彭总站在门口,我立即举手敬礼,念了一串报告



▲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巴卢库手挽许世友。

前排左1是巴卢库夫人，右2是张才千将军

词，他“嗯”了一声，没叫我进去，我犹豫片刻，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毕挺挺站在他面前。他看也不看我，只问：“朱开印，你在国民党军队干过？”

我吓了一跳，嗫嚅地回答：“没，没有呀！”

他这才抬头，裂嘴笑了一下：“没当过国民党军官来这套干什么？”

我奇怪：不是命令规定正规化要来这一套的吗？同时我轻松了，知道他不是对我的历史有什么误解，而是不要我来这一套。我也很快看清，他手里翻阅的，正是我要来请示的问题的一份报告。

他示意我坐下后说：“朱开印，我们以后要常打交道，免了这套从外国人、国民党那里学来的过场戏吧！”接着开始回答文件上请示的问题。

又使我骇然的是，他用红粗铅笔在文件上“一边倒”字样下划了一杠，说“不要凡事一边倒嘛！”他略为思索后又说，“我不是说这句话不对，帝国主义和我们过不去，搞我们的封锁，我们只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不是什么都靠人家，都倒一边，倒久了，你自己的两条腿干什么，还站得起来么？”

我们外事处主要的工作是和苏联军事专家顾问打

交道，为他们服务，反映他们的意见要求，处理好他们和我们部队的关系等问题。

彭总对此多次指示。我至今记得他的几次批示的原文：“热情，但不要天真，谦虚，但不是唯命是从！”“一，不能允许他们（指苏联专家）随意接触我们的军队机密；二，对他们的要求必要时不表态；三，对他们搞了些什么我们要心里有数……”

各部队对一些苏联专家盛气凌人，动辄训斥我们的干部，十分反感，彭总听了这类汇报时也很生气，他说：“这不怪人家，只怪我们自己软骨头。谁敢训我，我就告诉他：这儿我是主人，我当家，请你站远点。你们当顾问的，有意见等我顾得着我问你的时候你再说话！”

有个干部谈到一位苏联专家在大雪地罚我们一个营长的站。彭总问那汇报的干部：当时你在哪里？你为什么罚他（苏联专家）的站，你应该叫他脱了裤子罚，让他也挨一下冻！

毛主席曾有过话，我们干部和苏联专家发生矛盾顶撞，只能对我们自己人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所以我们只能在心里气，不敢表示，怕犯错误。彭总说：“毛主席是怕我们不向人家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老摆你过五关斩六将的老皇历，不是叫你看着他胡来也不吭气呀！”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广播电台什么的，彭总反对最力，他说过“赫鲁晓夫屁股太大了，扇屎也不看个地方！”

彭总那时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已经很反感了，也预感到中苏分歧不可避免的扩大趋势。他不只一次明确指示我：“不要什么都给人家看，什么都给人家说，老公老婆还有翻脸的时候，我们要多长个脑子！”

你不要以为他有这样一些看法：和苏联专家或外国人打交道必定粗暴无礼，不，所有他会见过的外国人都对彭总的谦恭有礼留下深刻印象。1956年，他会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问他哪个学校毕业，是不是黄埔，他说：“我是打柴棍子出身，我的学校是战场，是中国人民用千万人头给我交的学费，代价很大很高，可是我的根底太差，学得不好。”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彭总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享有当之无愧的盛名。在东西，彭总每到一地，人民都倾城出动，夹道欢迎，高呼：“英雄，英雄，彭德怀！”我无数次听他对欢呼的人群含泪高呼：“不，我不是英雄，受欢迎的应该不是我，应该是在战场上献出生命和鲜血的我的同志，是我的这些同志的母亲、妻子以及他们所有的亲人！”

苏联专家讲解他们的卫国战争史时，彭总像小学生似的埋头作着笔记。每问必详，听到好意见或使他动情的地方，他会站起来拍手叫好，甚至和人家拥抱。有几次，他参观的先进武器，对它的兵器性能、使用方法

问了又问，一副流连忘返的神情，过后，一再念叨：今天我算开眼界了！又叮嘱：朱开印，以后再有这样的好东西看，别忘了通知我！

我以为，彭总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这个姿态，对我们今天怎样搞好对外开放仍很有指导意义。这个姿态基于他的一个思想，也就是他的那句话：“我是这里的主人！”你来，我欢迎，但你不要对我指手划脚；我有礼貌，但更有我的尊严，我向你学习，但我不能唯命是从！彭总这个人呀，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太多，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硬骨头精神。

去东欧访问，彭总是访问团长，成员有王树声、肖华、杨得志，张宗逊、陈伯钧等我军著名将领。我也是成员，其实是一名跑腿的联络员。

这次出访的背景是，一些东欧国家和苏联关系搞得很紧张，这些国家有的领导人对苏联的“关卡压”很不满，很有怨气；有的地方出现群众闹事，也常常表现为强烈的反苏情绪。我们这次出访其实是苏联要求我们去给东欧作些工作，东欧国家也希望我们去安定一下人心，临行前毛主席和党中央给彭总交代的任务也是去作团结的工作，强调团结才有力量，要团结还是得有一个“头”，这个“头”还是苏联……毛主席也说了，作这个团结的最好人选是彭老总。

彭总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作的。他广泛接触各国领导和群众，大会小会，发表演说，反复讲的都是团结，都是合作，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

在向东欧国家一些领导如实介绍了我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付出的巨大牺牲与代价之后，他说：“决不是我们要打这场战争，更不是我们作好了准备去打的，我们才站起来，才几万吨钢，气还没喘过来呢！是迫不得已，我们才打了这场我们本来打不起、不愿打的战争的！我们是用人头去抵挡人家的武器优势的。可是万千人头给我们换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还有一屁股的债！苏联人给了我们一些武器，大量是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准备化铁的，可是算的价钱并不低，乘机捞了我们一把，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我们忍痛了，没有说话，为的是这个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团结！……”他还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与愤怒，表示：“不平等就没有团结，不公平就没有合作！手伸得很长的人是可怕的，谈何团结！”

访问团有人劝过彭总，是不是多从正面谈？不要涉及苏联的是非，不然会火上加油。彭总说：“早晚也得说，我们不能叫兄弟国家感到我们傻冒，来日又奇怪我们怎么突然变了调！”

很遗憾，有人竟在这以后不久的庐山会议上，将“里通外国”的罪名加在彭总的头上。

强加给彭总的罪名还有一条，是说“他和赫鲁晓夫

眉目传情”“在赫鲁晓夫那里取了经”等等！访问团的人无人不知。我们到达阿尔巴尼亚后，赫鲁晓夫也来了。阿尔巴尼亚开大会欢迎赫鲁晓夫，邀请我们参加。彭总委婉又坚决地拒绝，我们是中国军事代表团，不便参加。阿反复邀请，巴卢库来请几次，彭总还是不同意，霍查也来劝说，为不使主人为难，我们最后还是参加了。但坐在主席台正中的彭总不等会完便退席了。回来后，他当着我们好多人大声说：“我看不惯赫鲁晓夫，张牙舞爪的！”

在阿尔巴尼亚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主人把彭总安排在主宾席上与赫鲁晓夫同席。赫鲁晓夫主动向彭总敬了酒，也表示了对中国军事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欢迎之意。彭总只是点了点头，说了“要去要去”，过后便侧头一直与谢胡等人说话。事后有人说彭总，你也应和人家寒暄几句嘛！彭总说：“我才不听他吹大牛！”

凭这些话，看得出彭总当时左的“倾向”。我不是说，“左”比右好，而是说，彭总当时与我们党中央是很保持了一致的，当时我们的党在整体上不都是这样的倾向么？

我们出访东欧之前，脑子里都有个框框：似乎东欧所有国家经济上都很紧张，人民对生活不满意，所以更加剧了这些国家政治风波。到那里一看，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生活是非常优裕的，比我们中国老百姓生活强多了！

当时在我国，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破坏，大灾大难已经在许多地方开始露头，各地市场供应紧张，人民吃不饱肚子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却很少出现像东欧一些国家的群众闹事和政治动荡局面，这是为什么呢？这不能不叫我们代表团各个同志都思考一番。

每到一地，彭总都不忘去看看农村，大概怕人家作假，彭总常常要求中途停车，去参观不是预定我们要去的地方，直接问主人家的人口、耕地、收入等情况，还看人家仓里的粮，柜中的衣。当他看到有的农舍就像一座座漂亮的别墅，农民开着自己汽车下地，节假日去旅游时，便大声赞叹：“可以了，很可以了！”激动时，还会张臂呼喊：“共产主义在哪里呢？就在这里！”

为什么一些地方的人民还闹事呢？我们很快便了解到，原因在西欧一些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更大些，对比之下，东欧国家就显得落后了。于是，有人往西方跑。这和我们国家目前一些人往海外跑多少有些相似，但那时的东欧确实又有西方国家借机煽动捣鬼的问题，加上自己一些政策的失误，历史上还存在对俄国人的反感情绪，搞得人民与政府间的矛盾十分错综复杂。

彭总在看到、听到这些情况之后，表情十分严肃，常常独自沉思，一声声长吁短叹。我现在想，其时其地，

他怎能不想起此前不久他在自己国家许多地方视察的所见所闻？他怎能不想起禾苗枯干的原野上映天的炼钢炉火？不想起专列车厢外一群群乞儿伸出的干瘦手臂？不想起他的故乡人抱着孩子向他嗷嗷哭泣的情景？

开始，我当然揣摸不到他的心思，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是呵，我病了，病得不轻呢！朱开印，我得了大病，恐惧病，担心中国老百姓打我们扁担的恐惧病呵！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在陪同我们察看东西柏林分界线时，曾向彭总谈到，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的“优越”。最近他们提出一个指标，要把每个西德人每年的肉食消费量提高到平均 80 公斤，乌布利希感到这是一个挑战，给他们很大的压力。接着他话题一转，说近日他感到很欣慰，因为从报纸上得知，中国在粮食肉类的生产上取得特大丰收，有大量节余，希望中国能帮助东德在肉食供应上也接近这个水平。彭总听了，久久沉默后才说：“我不管生产上的事，对这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据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的调查，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这是实话，没有拒绝帮助你们的意思。回去后我将反映你们的要求，也希望你不要抱过大希望。”

这之后，彭总问过我：“朱开印，你一年吃多少斤肉？”我说没计算过。他又问，有“有 80 公斤么？”我想了想说：80 公斤？撑死我？彭总苦笑后叹息一声：“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 80 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

“我们吹得太过分了！”这种感想，这种结论是我们代表团几乎每个人都得出的。一些人说：听到人家的颂扬，我们心里真不是滋味。

但也有个人说：我们中国人生活虽艰苦，但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说明了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的无比威力。彭总听到这种议论突然停步仰头插话：“是呀，中国老百姓好呵，他们苦惯了，穷惯了！”接着便抑制不住提高了声音：“……什么政治思想工作好？应当想想，我们的工作哪些方面不好，对不对得起中国老百姓？”又说：“竞争不仅仅是东西德，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人家吃 80 公斤肉，你吃 20 公斤，吃十年八年可以，久了，你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也填不满他的肚子，拴不住他的心！何况，我们三月不知肉味的百姓还多哩！”

这便是后来有人栽诬的：彭德怀庐山上书是“他从外国取来的经”这个罪名的由来。

庐山会后，中南海继续开军委扩大会批判揭发彭总，他们不会放过我，问得很细。两个多月里彭德怀哪天到哪，干什么，什么人在场，谈了什么，什么样的表情……总想从我这儿找出什么破绽来。

审查者问：“彭德怀和张闻天在飞机上谈了什么？”

张闻天同志是作为观察员去列席华沙条约会议，与我们同机去波兰的。他和彭总都坐在一等舱，两人确实谈过话。“我怎么知道他们谈什么？我离得远，再说我也不会注意两位领导人的谈话，我没这个任务嘛！”我又把挖材料的人顶了回去。

“彭德怀在华沙条约招待会上风头十足，有人喊‘彭德怀乌拉’，他笑眯眯的，是不？”

“他在那里很受欢迎，大家都找他说话，争着向他问候，敬酒，他成了那次招待会中心。我没听到人家喊‘彭德怀乌拉’，只听到‘毛泽东乌拉，中国乌拉！’”

“彭德怀和外国女人拥抱，还接吻，有没有？”

“有！不是女人，是女孩，几岁，喊彭德怀爷爷，向他献花，要他抱，吻他。大点的姑娘，几十岁的女人也有要拥抱他亲吻他的，他总是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中国人没有这个规矩！’”

每次的盘问都要归结到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官那次宴会上与赫鲁晓夫同席的每个细微末节，这无疑是盘问者认定的关键要害所在。

“彭德怀和赫鲁晓夫递过眼色没有？”

“我没看出来，只看出彭德怀很冷淡。”

“他们笑过没有？”

“我没特别留心。我想彭德怀笑总是要笑一下吧，招待会上，大家都乐乐哈哈的，他总不会哭吧？”

“朱开印，你就没感到彭德怀这次访问起了什么坏作用？”

“没感到，只感到他起了好作用，但这作用不归功于他，归功于中国受爱戴，毛主席受敬仰，当然他也是受欢迎的……”

“朱开印，你是一个彭德怀的顽固追随者！”这是他们最后对我的评语。

虽然我什么也没说，但人家还是安排我在大会上揭发。

我总得说点什么呀，总得过那一关呀！于是我“揭发”了：彭德怀很小气，人家送给他的礼品，如像一些粗劣茶壶茶杯都收罗了一大筐，说一件都不能丢，都得给我装好箱运回来；彭德怀还爱给服务人员送礼，最后我们的东西都送完了，他还叫我们记上人家的名字，以后寄去。我最后说，那些茶壶茶杯怎么运，那么多服务人员怎么寄送礼品？……

我还没“揭发”完，身处受审席上的彭总居然拍起桌子向我发起大火来：“朱开印，你没说全，那些茶壶茶杯是老百姓送的，是人民的心意……你事后不寄礼品是不对的，你不执行我的指示，也是失信于民……”

他的威风不倒！他始终不倒，不是么，他现在还堂堂正正地立在亿万人民心中！（责任编辑：刘家驹）

冯玉祥 征婚 记

●述而作

冯玉祥将军的前妻刘德贞病故后，给他撇下了两男三女。冯将军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十分伤感，两年不娶。1924年初春，冯将军在北京发动举世闻名的北京政变前，他的友人为他发了一则征婚广告，不少漂亮的姑娘纷至沓来，冯玉祥决定用考试的方法当面选择。他问：“你们为什么要和我结婚？”有不少人直说：“因为冯将军官大，名气大，能享福。”可有一位应征的小学女教师的回答与众不同。她说：“老天怕你在人间做坏事，特意让我来管着你。”这句话使冯玉祥的心为之震动。在这之前，冯曾见过这位女教师在群众聚会上讲话，语言激烈，口才出众，心中已萌生过爱慕之情，现在正在眼前，于是便托友人做媒。就这样二人结为夫妻了。

婚后，这位女教师问冯将军：“你怎么会



冯玉祥偕夫人李德全

喜欢上我呢？”因为她肤色黑，粗壮，不讲衣着，实在说不上是一个容易打动男人的漂亮女子。冯将军听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看你天真烂漫。”

这位姑娘便是人民中国的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她政治头脑清醒，性格坚韧不拔，为人宽宏大量，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事实证明，他们的结合，使冯玉祥后来得益非浅。

邮购启事

本刊1993年合订本(总第10期至21期)已出版，精装每册定价44元，求购者请与本刊办公室邮渝联系。

本刊1991年——1992年合订本早已售完，但仍有大量读者来函求购，为满足读者需求，现决定收购已脱销的总第三期、总第九期，有这两期存书者，请速与本刊联系。

《炎黄春秋》杂志社

有谁统计过？文革中审理数以百万计的“走资派”“叛徒”“反革命”，究竟有多少人惨遭监禁刑讯？多少人失去身家性命？多少人受到株连牵累？本文掀开这段历史的一角，记叙一位曾审过半个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专案组长，他与狼共舞，但人性未泯，给我们真实而痛心地披露了他们那一伙人对人性是怎样摧残的……

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

●张嵩山

暮色渐浓，一位形容枯瘦如干姜般的老人，散完步，沿着条碎石甬道，赶着点回家去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其实他怕看“新闻联播”。更准确地说，他怕看到“新闻联播”里不时出现的，我国党政军领导人参加国事活动的场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年或是作为阶下囚，被他提审盘问过；或是作为监护对象，受过他的询问调查。名单细细开列出来，几乎有半个中央委员会。

那是他的一段畸形荣耀的历史，病态风流的岁月。

如今他已缄默不语，即便在老伴和儿女们面前，也绝口不谈那段经历。他祈求着时间流动的冲刷和稀释，以期忘却，求得晚年心境的平和。可是，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个隐形物扯拽着他，强使他去承受精神炼狱的煎熬之苦。一到晚上七点钟，他就神差鬼使地坐到电视机前，摸出副老式玳瑁边圆镜，戴到他那已见浑浊的眼睛上。每当屏幕上出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的神情便骤然专注。这时，沉淀已久的“文革”碱水浸泡透的脑细胞，会变得异常活跃，将历史的片断接连叠映在脑子里。

他想象不出，历史竟是一条神

秘的因果之链，非人力可以改变的多种契因的组合。即便是他曾亲身参与的那场我们党半个多世纪历史上最龌龊、最浩大的阴谋活动，也未能破坏它的形态。而他自己却在时代列车的急转弯中，被甩了出去。他还不到52岁，就因“所犯严重错误”，被命令退出现役，提前结束了他素以为荣的军人生涯，安顿到这个营建粗糙的干休所里苟安晚年。

想到此，他不由痛如彻骨地长叹一声：“报应啊！”

无需再提起他的尊姓大名，便于记叙，我们只好称呼他A。

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是陷阱，让你稀里糊涂地就掉进去了。当初调A去中央搞专案，A哪里会想到那是往一个阴谋圈子里去，是为文化大革命陪葬的？

说起来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和诗人的浪漫气质，交媾孕生出的怪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开始降世，在时间的河床里一路扬起红卫兵运动的风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粉碎“二月逆流”，上海“一月风暴”的全面夺权

……一股股汹涌恶浪，涌进了1968年。

这年三月，坦荡无砥的北方大平原上，依旧是寒风枯草，积雪残冰，一望望不断的萧瑟惨淡。

当时，A在航空兵某师政治部任职。一天突然接到军区空军发来的电报，要调A去参加专案工作。A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军区空军催得很急，要A速去报到。A连夜打点行李。

在军区空军机关大院，政治部主任亲自和A谈话，这时A才知道，原来是去军委搞专案。但那位主任显然也不知道更多的情况，交代了A一些注意事项，就催A立即上路。

这天午夜，A踏上了进京的特快列车。

几年前，A在北京住过学，可眼下的北京，恍如一座战场。劲道的北风，正横扫京都，扬起满天黄尘，A置身在一片骚动和纷乱中，游行的队伍，批判的人群，浊流般涌出短巷，漫向长街，他有种难以言状的激动。面前一辆辆宣传车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掷出一串串“打倒……”、“火烧……”的呼号。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贴不下了，就

在街道两旁扎起苇席，糊上白纸，用酣墨淋漓的大排笔往上刷：“炮打……”、“血战……”，斗大人高，怵目惊心。

A 先到空军报到。接待 A 的是空军干部部的一个副部长。他告诉 A 说：“这次调你来京，是经过组织上慎重研究，反复挑选的。我们派出的都是空军优秀干部，去对党内、军内的三反分子进行审查定案。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努力为党工作，为我们空军争光。”

说罢，副部长就让人为 A 开好空军党委的介绍信，还专门派了辆“北京”吉普，将 A 送到“二办”所在地——翠微路总参第二招待所。

“二办”办公室的人似乎早知道 A 要来，A 进了办公室没放下行李，他们就把 A 直接送到北楼第三单元的“贺龙专案组”。

A 像根接力棒，被一程程从师里传递过来。至此，A 总算明白自己究竟在哪里工作了。然而好几天以后，A 才将这个庞大而秘密的专案体系，看出个大概眉目。

二

1967 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其领导成员，即“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

文化大革命开展不到一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李富春靠边站。十一个常委，只剩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五个人。政治局委员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等人，或打倒，或靠边，亦所剩无几。中央政治局已是名存实亡。

于是，毛泽东决定用这个“碰头会”的形式，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它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为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谢富治、汪东兴、温玉成等人列席。

江青操纵着“碰头会”，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实权，则控制在康生手上。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第一办公室、第二办公室、第三办公室。通常简称“一办”、“二办”、“三办”。

“一办”负责中央机关和各省、市委领导人的专案，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牵头。

“二办”主管军队系统高级将领的专案，由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

“三办”统抓公检法系统的专案，由公安部长谢富治兼管。

“二办”系统辖有九个主案组。其中“罗瑞卿专案组”、“饶漱石专案组”、“谭震林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设在京西宾馆。“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肖华专案组”、“马明方专案组”、“无线电专案组”，以及负责协调、处理日常事务的“二办”办公室，设在翠微路总参二招。

各主案组均配备有二三十个专案人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层层把关，反复政审，政治上绝对忠诚可靠，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文字表述能力，而抽调自陆海空三军的正营级以上干部。

“二办”系统中，最重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案，均为元帅级专案。但是，彭德怀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

之后就被罢官免职，夺了帅印。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贺龙专案是唯一的一元帅级案子，为军队第一要案。

如果说此时的北京，已是波涛汹涌的海洋，那么总参二招倒称得上是个难得的平静港湾。掩映在高大冬青树丛中的两幢红色楼房，南北对峙，静寂得一无声响。每幢楼房均为三层，一式的三单元构造。“二办”办公室和五个主案组，各占据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就是一方天地，组与组之间的专案人员严格禁止往来和交谈。军装严整的专案人员匆匆进出就餐、打开水，不苟言笑。见多了彼此面熟，也只是点个头就算打招呼了。倘有材料须送别的组，要严格按照手续办理，由办公室负责联系，约定时间交接。

A 到“贺龙专案组”一切都是悄然进行的。跟他们只一墙之隔的“无线电专案组”，工作三年了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圈子里的人尚且如此，局外人就更想不到这个寂如古井的院落里，竟有一百多名军队中下级军官，从事打倒他们的将军元帅的勾当。

三

历史，实际上由一连串的事件之谜组成的。所谓澄清历史，无非就是揭开一个又一个事件之谜。

贺龙一案当追溯到 1966 年的

▽1952 年八·一建军节，贺龙陪朱德、邓小平观看军事体育表演



8月。正当康生抓住北京市委经军委批准组建一支地方武装团队,以担负首都民兵训练和维持社会治安一事,到处散布彭真阴谋组织“二月兵变”的谣言之时,林彪集团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写信,告贺龙的黑御状,诬陷贺龙插手空军、海军与总后勤部,推行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那时的中国流行诬陷,像四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以任意无端的猜疑、告密、指控、陷害为政治时髦。

康生趁机将“二月兵变”的主谋嫁接到贺龙身上,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危言耸听,痛斥贺龙私自调动军队进京,要搞兵变;并在体育口组织政变队伍,在海空军建立他的国防俱乐部……

几乎一夜间,全国上百个大中城市的墙头、电线杆上,都贴出了“贺龙二月兵变”的急电传单。举国为之震惊。

在这谣言四起,林彪又一份接一份地将吴、邱等人的揭发信呈送上去的时候,向来敏感兵权的毛泽东,不能不作出反应。但他却单独召见安抚贺龙。

9月14日,秋阳和煦。贺龙只身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时,毛泽东已经在客厅等候他了。他微笑着伸出宽大绵厚的手,贺龙忙紧走几步上前,恭敬地双手捧握住。

贺龙面对毛泽东,恍若面对一座你永远无法逾越的大山。那巨人般的伟岸身躯,似乎辐射出慑人臣伏的圣灵之气,让人不由微微颤栗,肃然起敬。

他和贺龙闲聊了几句,便从肘边的茶几上拈起份材料,“嘿嘿”地朗声笑道:“你不要紧张嘛。对你我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说着,将材料递给贺龙。

贺龙一看,是吴法宪等人的告状信。他请示毛泽东:“我是否找吴

法宪他们谈谈?”

毛泽东摆摆手:“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要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

贺龙说:“我想找他们解释一下。”

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那也可以嘛。”随之,他话锋一转,心境愉快地与贺龙谈起贞观之治;谈起庄子“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谈起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的唯物主义立场的转变和人类解放思想的确立……思路随兴所至,一无羁绊。

不觉竟谈到正午,毛泽东挽留用餐,贺龙谢辞。

又过了5天,还是在游泳池,毛泽东再度召见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于是,贺龙出了新华门便直奔人民大会堂,先去找林彪。

那时邱会作正调动总后的人力物力,为林彪修缮毛家湾大院,林彪夫妇暂住人民大会堂。

林彪客厅里所有的窗帘竞相垂放,光线晦暗如暮。贺龙走进好一会儿才适应过来,看见对面暗处显出一张苍白面孔,吃了一惊。过去他就多次耳闻林彪怕光怕水怕风,可没想到竟怕成这样。

贺龙专为释嫌而来,话说得很诚恳。林彪先倒也谦和,连连说:“没什么嘛,没什么。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当即半说半吼起来:“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半个月后,军委关于“贺龙有问题”的打招呼范围,便进一步扩大到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

12月28日,贺龙也还照常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见他走进来时,还满面笑容地扬起大手

向他打招呼,叫他坐到前排来。

但三天后,北京街头宣传车上的大喇叭,就公开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一批批红卫兵冲进贺龙住宅抄家。

1967年1月9日,贺龙夫妇偕往中南海找周恩来。周恩来得知红卫兵还占据着贺宅,生气地立即拿起电话,要通贺宅:“我是周恩来,叫你们负责人听电话……你叫什么名字?小陆同志,你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办事,立刻把人撤出去。唔,先撤出去,有什么问题,今晚七点钟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你们全体同志。”放下电话,他对贺龙夫妇说:“他们走了,还会有其他的组织去。你们就先住在我这里。”

贺龙夫妇在周恩来的西花厅后院避了十天的难。1月18日周恩来约了李富春一起,与贺龙谈了一次话。他对贺龙说:“本来还约了江青一起谈的,但她没有来。”

这天江青跑到空军机关大院接见吴法宪他们去了,并在会上振臂领呼:“打倒大土匪、大军阀贺龙!”

周恩来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我本想让你就住在中南海的,但现在中南海里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人撬了。我还是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吧。你去休息一段,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练练写字。要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有什么缺点错误,要严格要求自己。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谈完话,李富春先走一步,周恩来又问贺龙:“××向林彪反映,说你讲了林彪长征中的坏话。有这事吗?”

××是文革初期的中央要人。

贺龙想了想,说:“我只是在延安时曾问过××,知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积蓄多年的党内矛盾的总爆发。其中不仅有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还掺杂进了个人的历

史恩怨,这就使得这场斗争更加错综复杂。周恩来叹了口气:“这就够了。”

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派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杨德中带着杨青成,用他的黑色“吉姆”轿车,将贺龙夫妇秘密护送到杨成武为他们找的山一座平房小院住下。山下沟口,驻有中央警卫师的一个连队。

1967年9月中旬,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作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9月13日正式成立了“贺龙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贺龙便由受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监管。康生亲自抓这一案子。任命空军政委余立金为“贺龙专案组”组长;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朱铁铮为第一副组长;北京军区某团政委芦凤歧为第二副组长。

这个专案组像根结了一串瓜蛋的藤蔓,下坠十几个分案组——

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

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

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

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

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

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

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

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

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

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专案组”;

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

……

这些分案对象,都曾是中国革命的某个历史时期里贺龙的老部下。其中绝大部分是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〇师、晋绥军区的干部。

还有一个与贺龙一案有牵连的将领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秦基伟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四方面军的人;抗战时指挥太行军区部队;解放战争那会儿是“二野”的纵队司令员。后来率十五军入朝参战,打出一个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成为一代名将。虽说归国后,他在贺龙主持的西南军区当过云南军区司令员,可他上任没几个月,贺龙便离川进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去了。两人基本上没在一起共过事,怎么把他也划到贺龙线上去了?

原来秦基伟的夫人曾是西南军区的保卫干事,据说是贺龙为他们牵线做媒的。秦基伟却因此而被关押到湖南一个部队农场达7年之久。

各分案组分别归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党委领导。但“贺龙专案组”作为主案组,对各分案组负有联系指导的责任。主案与分案互为补充,互为因果。

四

A到“贺龙专案组”的头5天里,除了由芦凤歧带着转了转在京的几个分案组,熟悉熟悉情况,便于下一步开展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就是闷在屋里看案情宗卷。3月8日这天,芦凤歧带他去装甲兵大院的“许光达专案组”,分析研究案情进展,并指导制定审查方案。

“许光达专案组”就设在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的家里。

▽贺龙和邓小平同志



十几天前，许光达一家刚被撵出这幢居住多年的小楼。许光达的夫人邹靖华还记得那是1968年2月25日：“就在我孙女出生的第十天，在冰天雪地的半夜赶我们搬家。并限定两小时之内搬完。以致使我儿媳妇的手臂麻木，至今不能痊愈；年纪轻轻的经常头痛。”

小楼腾出后，“许光达专案组”的20多人马上住了进去。

案情分析会就是在二楼原许光达的卧室里进行的。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攻下许光达“里通外国”的问题。讨论到傍晚的时候，有人进来附在芦凤歧耳边低语几句。只见芦凤歧像被开水烫了似的“噌”地站起，一边收拾钢笔和本子，一边匆匆宣布：“今天的研究暂时就到这里吧，‘二办’通知我们赶到京西宾馆开个重要会议。”

A和另外一个同志不够格入内，便在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等候。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芦凤歧不停地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样子很狼狈地第一个钻出来，向他们招招手，便惶惶地跑下楼去。

上了车，芦凤歧余悸未消地告诉A：“首长发脾气了，好大的火啊。把我叫起来站着，当众狠克了我一顿。说我们专案组案情没有什么大进展，对贺龙的很多问题都钻得不够，对许光达的分案也抓得不力。还批我们的工作不是大刀阔斧，而是小手小脚。哎呀，你看吓得这一身汗。”

芦凤歧这人没眼色，专案组的工作刚挨过批，回到二招他又向另一位首长汇报在许光达的囚室里发现刮胡刀片的事。那位首长恼透了，劈头盖脑地把他训了一顿：“你们干什么吃的！总参和空军的案子，你们都不要过问了，集中精力抓好许光达的案子。我已经打电话给黄志勇（装甲兵政委）了，叫他们抓紧。你们也去几个人帮助他们。”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位发脾

气的首长，后来也被林彪视为异己而戡之，惨遭撤职监禁。

第二天，芦凤歧就带上几个人，一头扎进“许光达专案组”坐镇指挥，加速案情的进程。

许光达被连续提审。每审完一次，他们就分析研究一回，以确定再审的主攻方向。

许光达耿直不阿，曾多次触犯林彪、江青。

1966年8月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小组讨论会上，江青发言：“文化大革命很有必要，我和林彪商量过，早就想要用这么一个革命来解放人民的思想。孔夫子是很坏的，独断专行，搞调和，搞折中，我从小就和他作斗争，争取妇女解放。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自己不革命还不准人家革命，而且是高级干部。他们危害很大。”

“林彪讲，你们要做革命的动力，而更重要的是要作为革命的对象。你们官当大了，有暮气和惰性。我是主席的学生，我体会到主席的思想别人是学不到的。我这么多年来有进步，最大的长处是不耻下问，和那些当官做老爷的人有本质的区别……”

这女人张嘴就专横跋扈，许光达越听越来气，老师傅们都在场，你江青算什么东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教训人？他实在忍不住了，便顶了她一句：“‘不耻下问’是孔夫子的话。”

江青当众受此奚落，气得脸皮茄紫，尖声怪叫起来：“孔夫子的话我是可以用的，用来为革命需要服务。”

许光达亦怒不可遏，刚要反驳，徐向前发言将话题叉开了，缓和了一下会场的气氛。

可血性刚烈的许光达愤犹未消，遂将余怒统统发泄在笔记本上：“什么江青的‘座谈会纪要’、叶群的‘部队蹲点调查报告’，×××的‘××××’，小题大作，作风不正……”

这个要命的塑料皮儿笔记本，在被抄家时落到了专案组手里，成为反林彪、江青的重要“罪证”。

1967年8月14日，当专案人员涌进门来抓他，说要带他去作检查时，许光达握别邹靖华说：“他们不要我的检查，是要我的命。”

大将此去，果然风萧萧，易水寒……

五

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政坛烟云迷乱，一旦卷入上层斗争的漩涡，A的灵性就迷失了。只能按权势者所企望的历史，去论证，去完善一系列与之相吻合的伪事件。更何况军人素以服从为天职呢。

3月11日开始的案情分析会已经三天，A不能再发言了。等他开口时，已经是是个十足的阶级斗士了：“大家对许光达是个大坏蛋、大特务的认识是一致的。思想统一，这仗就好打了。但许光达的案情是个硬仗，重点在于他里通外国，而不是其它问题。这与他伙同贺龙搞‘兵变’有必然联系。斗争的前提条件，先要他承认自己是特务。当然，他是不会老实交代出来的，这中间涉及到许多东西。但会有矛盾，会露出马脚，我们可以利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要一直追出他和那个姓郭的不是正常关系，而是两个相互勾结的里通外国分子。然后再要他们交代活动的内容。这样层层推进，重点展开，仗就好往下打了。”

第二天，A主持提审了涉嫌许光达一案的几个人。为了显示干练，提审结束不久，A就拿出了审讯报告。

在当晚的案情分析会上，他以上级专案人员的身份，毫不客气地指出“许光达专案组”工作存在的漏洞：“当前斗争这样复杂，我们睡觉都不该两眼一块闭。可我们的专案工作太多疏忽。星期天许光达吃面包就吃出了一张纸条，这分明是外

面的人在向许光达通风报信嘛。第二,许光达的门口发现了两瓶安眠药,这是怎么回事?要迅速查清它的来龙去脉。不能排除贺龙‘国防俱乐部’的人企图杀人灭口,以防许光达供认出他们‘兵变’的内幕情况的可能。三嘛,我这几天晚上起来各处转了转,就发现看守许光达的同志,钻在被窝里值班。这怎么行呢?睡着了怎么办?许光达如果乘机潜逃,我们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同志们,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哩……”

A的这番话说完,“许光达专案组”的人脸上都露出不胜钦佩的神色。也给芦凤歧留下了“看问题很敏锐”的好印象。

几天之后,“贺龙专案组”临时党支部就增补A为支部委员,分工他负责指导“许光达专案组”的工作。

专案工作正向纵深发展,3月24日晚爆出了震惊全国的“杨、余、傅事件”。“二办”所属各主、分案组的所有专案一律停办,材料全部封存,专案人员悉数投入揭批杨、余、傅在专案工作上的流毒。

与此同时,“二办”系统也有了较大的人事变动——

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接手“二办”;任命海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张秀川为“贺龙专案组”组长。

第一副组长朱铁铮调到“罗瑞卿专案组”。走前,他与全组的人一一握手告别,踌躇满志地说:“让我们两个组来个工作竞赛。”

可是,隔组如隔山。他这一走,A就再也没见过他。“九·一三事件”后A才知道,他上了林立果“小舰队”的船,被提升为空军司令部二处处长,参与策划执行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他留下的空缺,由总参调来一位叫李国西的处长填补。

四月中旬,“二办”系统重新开始运转。“许光达专案组”里充满了

急剧加温、骤然升级的恐怖气氛。那些挑选来的看守,其实就是打手,恣意凌辱许光达。他们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叱逼许光达趴下舔吃,放肆地呵斥道:“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

在押期间,许光达的伙食一直是战士灶标准,每天四角五分钱。专案组进驻后,芦凤歧指示专案人员:“许光达每月伙食标准按犯人待遇,不得超过十二块。”

半个月后又降至每月八块钱。

过去批斗审讯基本上是文斗。自从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在审讯中攥拢五指,朝许光达当胸一拳后,打风顿开,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在场的医生简单处理一下,将他弄醒转来再接着打。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他们又从装甲兵医院找了几个身体强壮的医生护士来打。他们很在行地专向许光达身体要害部位出拳踢脚,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

可没血毕竟缺少刺激,专案组的打手们更愿意自己上阵。打得许光达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次,一个熊般壮实的伙计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上。血,浸透了许光达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一股股红印在椅子的白布罩上。

A看过许光达的自传,知道这是许光达第三次抛洒热血。

第一次是1927年8月,他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打算占领广州再图北伐。进至广东三河坝时,与国民党部队遭遇。激战中他身负重伤。

▽1950年贺龙在北京



1932年秋天,他率红二军第十七师攻打湖北应城,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距死亡仅一步之遥。

许光达曾两次用鲜血浇灌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花,可谁又能说这第三次不是呢?如今反思这段历史时,只要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愚昧之根不曾刨尽,共产党人的鲜血还得继续流下去。

伤痕叠加的同时,疾病也在侵蚀许光达的肌体。这位大耳隆准,面相富态,平时总戴副浅边圆镜,颇有儒将之风的司令员,此时已被折磨得眼皮浮肿,两腮凹陷,脸色幽青。

这天一大早他就向看守反映胸闷头痛得厉害。专案组接到报告就将他训了一顿:“你又要施展那套阴谋诡计了,妄想逃避对你的审查吗?”随后,又将作为“许光达的反革命动向”,报告给装甲兵的一位领导。

那位领导恶狠狠地指示:“分两组给他来个连续作战,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此人曾和许光达在晋绥军区的同一个马勺里喝过吕梁山的糜子,最了解许光达的忠勇无私。可文化大革命竟使他邪劲大发,昧着良心把战友当敌人,凶狠地将许光达往死里整。粉碎“四人帮”后,此人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历史太轻饶了他。

秉承那位领导的旨意,4月17日上午,专案组开始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A和芦凤歧坐在一边监审,目睹了军队“文革”史上最残暴的一幕——

两个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腰摺弯九十度。

这两个打手因姓氏生僻,二十多年后A还记得他们一个姓党,一个姓都。

下面就是那天的审讯记录。它一直保存在中央军委——

主审人:说,你是什么时候被内定为

贺龙兵变总参谋长的?

许光达:我是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大将,党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还要冒杀头的风险兵变,而且才捞个总长,太不划算了么。我不干。

主审人:你老实交代,贺龙是如何指使你私自调动坦克参与兵变的?

许光达:不要说贺龙和我,就是国防部长林彪也不可能私自调动坦克部队。

主审人:诡辩。到这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低头认罪。

许光达:我工作中会有错误,但是没有罪。

……

审不下去了,记录中断。

那个姓党的打手吼了声:“顽固不化。”一把揪住许光达的头发,问:“你说不说?”

许光达怒视着他,一言不发。

姓党的恼怒万分,一拳接一拳往他腹部打,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算了。”

他打乏了,姓都的上,也是边打边叫骂:“过去你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贝利亚。”

许光达咬紧牙关,顶着一记记重击不松口,可血却顺着他那条刚毅的嘴角,抵不住地往外流。后来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他就一个劲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时A才注意到还不满60岁的许光达,已是灰发霜鬓,苍老不堪了。

姓都的累得牛喘,浑身是汗地主动退下来。这个打手就因反许有功,几年之后竟当上了兰州军区某军副军长。

对他不加掩饰地发泄私愤,在场的人尽都麻木不仁。当时即使有人一丝恻隐尚存,谁又敢站出来伸张正义?吴法宪就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对这些专案对象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他们不能有任

何同情,不能有丝毫犹豫。专案工作一定要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因此,专案人员唯恐斗争不坚决,一个个赛着“左”。倘若有一点不忍之情萌生,也马上被以革命的名义悄悄扼杀在心里。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迫使人们充分扬厉动物自我保护的本能。

文化大革命将人性扭曲了。而扭曲的人性又反作用于文化大革命更为畸形的发展。

刑讯持续两个昼夜。隔了一天,又在一楼对许光达进行了连续三个昼夜的刑逼拷打。楼下不断传来的喝叱和呻吟声中,A和芦凤歧曾多次召集分组的组长、副组长们,若无其事地在二楼开会研究审讯的进展。

5月16日,这个因《五·一六通知》和“五·一六分子”的历史文件与事件而著名的日子,使A和一个大人物的命运不期而遇;成为A后半生盛衰荣枯的起始线……

当天晚上,“二办”指定A为“贺龙专案组”第三副组长、党支部副书记兼“×××专案组”组长。

……

六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所属各专案组如一群野马在狂奔。康生是使劲地鞭打“贺龙专案组”这匹“二办”的头马。他多次在案情汇报会上催促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问题。而历史上叛变问题的关键是1927年8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发过四封乞降电报,和1933年国民党反动政客熊贡卿到红三军招降贺龙。这些问题是你们的主攻方向。”

于是,“贺龙专案组”将上述两个问题,列为贺龙“叛变通敌”的核心问题,详细制定审查方案,倾全力进行突击。

所谓的四封电报问题,初始是

红卫兵从北平《晨报》上发现的一则消息。专案组曾以此为线索,派出多批调查组赴苏、皖、赣、湘等省查找敌伪时期的报刊、档案,以图印证《晨报》消息。然而,数月无果。

调查组的人都纳闷:当时贺龙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驻扎在江西九江一带,可他乞降的事本地报纸无任何透露,却登到几千里地之外的北平去了?案情分析会上,大家都开动脑筋,推测谁有可能知晓个中内情。最后想到唐生智和陈浴新。

唐生智是湖南东安人,15岁从军,后节节升迁,26岁时便成为湘军名将。1926年他率军参加北伐,颇有战绩。次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1937年他主动担任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率十多万官兵保卫南京。可是跟日本人打了三天,丢了南京,从此退出军界,回老家闲居。1949年解放军逼近长沙,他组织湖南人民自救会,支持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解放后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

专案组推断第二十军属唐生智第四集团军所辖,他又是收报人,应该知道此事。而陈浴新是第二十军参谋长,贺龙发电报一定会与他商量,并由他去具体办理。他更应该是知情人了。

“专案组”的几个副组长都认为这个推断有道理。当下就决定派人去长沙和南昌,就地组织专门班子,办他们两人的学习班,要他们坦白交代。

唐生智已是80多岁的老人,40多年前的事虽已模糊,但人不糊涂。说起贺龙给他发过电报,他一口回绝:决无此事。

可是,架不住专案人员个把月一斗,这位老将领像当年南京保卫战中一样,顶不住了。他被迫承认:是发过电报,可能部下忘记告诉他



△八路军第120师领导在前线观察地形(左起:甘泗淇、关向应、周士弟、贺龙)

了;或者告诉,他自己给忘了。抓住他这句话,专案人员步步紧逼,穷追不舍,弄得他招供又悔供,悔了又招。反复多次,最后还是写出了材料。

一年多之后,这位老人就去世了。

材料拿回北京,A看出多处破绽。可是李国西坚持说它“可信”。大家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刚进学习班时,陈浴新也肯定他不知道有乞降电报的事,斗得受不了了,就说:“发过,但内容记不清了。”专案人员不顾他年高体弱,再斗,终将他的意志摧垮。他不仅承认此事,还“一字不落”地默写出40多年前四封电报的全部电文。那谱儿离得连李国西也不能不承认:“这电文有水份。”可他又说:“陈浴新承认发过这样的电报应该是真的。”

因此,在给贺龙定案的依据中,

没敢用陈浴新默写的电文,只用他交代材料中,关于电报的大致内容。

关于蒋介石派人劝降贺龙,倒是确有其事。

1933年,在蒋介石多路重兵进剿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下,洪湖根据地大部失陷,贺龙被迫率部退出洪湖,绕道豫西、陕东,转战七千余里,苦战于湘鄂川黔边,艰苦备尝。是年十一月,蒋介石以为贺龙已是英雄末路,遂派贺龙早年友好、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二厅特工熊贡卿,前往湘鄂川黔边游说,企图招降收编贺龙部队。

贺龙当即将此情况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专门就此事经过给中央写了个报告:

“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

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贺龙这桩历史的忠诚被康生一伙反诬为“通敌”的起因,是1967年2月武汉第二十中学青年教师晏章炎给中央写信,诬告贺龙1933年向蒋介石乞降,并与国民党特工熊贡卿接头,商谈叛变活动。

1933年的事,可能是晏章炎听他父亲所说的。其父晏勋甫,是熊贡卿的上司,当时担任南昌行辕公署二厅厅长;抗战时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台儿庄会战后,此人为蒋介石谋划,并亲自督战促成了震惊世界的黄河决堤事件。解放后此人曾在武汉政协工作,文革前已去世。

但这年10月,专案人员又在查阅敌伪报刊时,发现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内部刊物《军政旬刊》上的一则消息,其中说到关于熊贡卿招降贺龙,“一切办法均已议妥”。

晏章炎的诬告信和这则消息的发现,使得康生一伙大喜过望,开始拼七巧板似地重新拼装这段历史。在一次专案会议上,康生欣喜若狂地宣称:“这些材料使贺龙通敌板上钉钉了。”

李国西也断言:“就凭‘一切办法均已议妥’这句话,就可以给贺龙定罪。”

但康生毕竟老辣。他指点专案组:要设法解决“议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解决既已“议妥”,贺龙为何又杀了熊贡卿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自圆其说。

李国西和芦凤歧等全力以赴,先拿分案对象开刀。

一时间,各分案组天光惨淡,阴

风凄厉,有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被默许,诱供受赏识,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

一间小黑屋里,专案人员在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床头吊支300瓦的大灯泡,床边还横眉立目地站着个士兵。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

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小便,逼他交代贺龙的“罪行”。

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因拒绝参与诬陷,被专案人员一拳打瞎了一只眼睛。

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遭通宵罚跪,半边脸被打打得酸青乌紫。这位只认真理,不畏权势的老将军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流血便脓。

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遭连续几昼夜突击审讯,险些死在狱中。

迫害最残忍的还要数“许光达专案组”。

据审讯记录所载:许光达1968年11月20日至1969年1月19日入治疗的60天里,受审讯79次;逼写交代材料25份。折磨得他三次病重住院。病重期间仍未中断对他的审问。他第一次住院81天,受审29次,逼写交代材料29份。出院后的21天里,受审8次,逼写交代7次。第二次住院33天,受审6次,逼其交代2次。

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即许光达去世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请罪。

邹靖华悲愤地说:“许光达同志这哪里是在住院治疗?他是在医院里度过了一百一十四天的牢房生活,含冤去世的。”

在专案组突击刑讯的淫威之下,一位将军疼得受不了了,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叛变条文。

几天之后,“×××专案组”再

传“捷报”:贺龙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屈打成招,证明贺龙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贺龙才杀了熊贡卿。

它打开了贺龙“历史上搞叛变”的最后一个症结。这使得贺龙决熊贡卿的性质,一下就变了。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的。

与此同时,在贺龙的所谓“现行问题”上,专案组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专案人员在李国西的带领下,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推断出贺龙“兵变”,一定会倚重××。因为此人既是他的老部下,又把持军队某个要害部门,“兵变”计划的制定,非他莫属。然后就极不人道地折磨××。

××未能熬住,开始信口胡诌,供认:贺龙为研究兵变,先后八次召开黑会。有如下人员参加了会议……(略)。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安插亲信,夺领导权,以及掌握控制住部队等问题。并将兵变时间定在10月1日。

可是,隔了一天××就翻供。专案组便痛加批斗。用搞专案的行话说,叫“打他的态度”。××的几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

接着,专案组按他的交代,提审另外两个参加“黑会”的人,以取得旁证。酷刑之下,这两人也承认到会了,但参加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都与××的交代对不上茬儿。

专案组分析:这两个人的交代有假,但可以肯定开过会。这么大规模的兵变,不开会各军区、军兵种,怎么统一行动?李国西要求所属各分案组,一律以××的交代为准,兵变时间统一在10月1日。

在此前提下,各组竞相打破专案规定,只求目的,不择手段。

“贺龙专案组”的李玉清到“×××专案组”取材料,曾亲眼目睹这个分案组是怎样刑讯,诱供到旁证材料的。



他到这个组时，×××已被罚站了23个小时了。这位将军身体原本就瘦小文弱，站久了撑不住，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儿很足的家伙走上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起来。可手一松，他又泥似的瘫软下去。几个专案人员上去用翻毛大皮鞋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嗷嗷地叫唤。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疾雨般踢来的脚才收住。

专案人员将笔往他手里一塞，暗示他说：“好好想想，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是八·一？八·一建军节嘛，我们军队的重大节日。”

“还是不对。差得不远了，再给

你三十秒考虑。”

“难道是十·一？”

“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李玉清回来将这个情况向李国西报告，他根本不当回事。

李国西他们将各分案组报上来的所谓的旁证材料挑检一番，凡是与××“交代”的兵变日期相近的，都剪裁下来拼贴在一起，美其名曰：“节录”。再加上前言后语，拍成照片，作为原始材料上报到“二办”去。

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几份旁证的交代有矛盾。李国西就别出心裁地只用其中一人的供词，后面再注明还有哪些人也交代了这个问题。

组里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干合适吗？按规定一个问题要有两个以上的证明人才能成立的。”

李国西很不以为然：“唉，斗争需要嘛。他们几个人交代的可以说大同小异，都提到兵变问题。我看可以用人头的多少，来证明它的可靠性。”

李先念同志曾在与中央文革抗争的怀仁堂会议上，愤怒指控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而“贺龙专案组”则在18个主案和分案组的小环境里，创造了一个“大逼供信”的典型气候。

七

当“贺龙专案组”的各分案组都沉浸在一片迫害的狂热中，作为主案对象的贺龙，此时在西山幽禁的处境，更是难以想象的艰难。

1977年2月，唯一知道当时全部情形的薛明同志曾向中央写了份材料，详细汇报了贺龙的境遇——

他们借口有人来揪贺龙,说是怕人发现我们在这里住,竟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迫使我们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夏天借口水源困难,曾有四十五天断了水。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其它的生活用水完全靠积水凑合着用……当时贺龙同志已经七十一岁,身体又有病。有一次和我一起抬一大盆雨水,扭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也不能大便。当时,营部有一个好心肠的沈医生给弄了点草药。为了使贺龙同志大便通畅,我又设法用早已用光的氧气筒的导管,自己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来给他灌肠。由于这种肥皂水刺激性大,我的口腔黏膜广泛烧坏,吃饭、讲话都受到影响。

从这以后,我们的环境就越来越困难。做饭的战士用很短的时间就草草做出一顿饭,基本的营养也失去了保证。原来营部的那个沈医生对我们很好,经常设法给我们买来必须的药品,有时甚至还帮我们买一些食物。但不久这个同志就被调走了。这时真是缺医少药,连每天三片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

这时,他们几次在暗中搜寻贺龙同志的药品,均未找到,就以“照顾”为名派来了一个王医生……这个王医生一来就恶狠狠地说:“不是组织决定,就单凭你们俩,我是不会来的。”他们不但不予必要的治疗和照顾,反而说是组织决定,强令我把自己想方设法为贺龙同志保存下来的很少一点必需的常备药品交出来,全部拿走。说是由他们保管。

这个姓王的不是医生,是个男护士。

A记得是1968年年底,黄永胜把他们三个副组长都找去,说中央对一些重要审查对象的吃药问题要加以控制,不能叫他们自己保存药物随便吃。说有的已出了问题。

他问大家: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得管理控制一下,不然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中央决定给他派个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你们回去写个报告送来我们批。

这样,他们回来写了个报告,黄永胜批转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从天津医院派来一个叫王贺志的男护士。A见过这人几面。

薛明同志的材料上接着写到;

当时室内温度只有六度,他们借口暖气管破裂了,无法修理,要我们搬家。贺龙同志坚决不同意搬,私下对我说:“这个房子是总理安排我们住的,我住着放心。如果换一个地方,那就要出鬼了。”可是几经交涉无效,在一个夜里他们强迫我们搬到了山下的一个房间里。

搬家以后,各方面的条件就更差了,连吃顿饱饭都不可能。经常是白水煮白菜、糠萝卜,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有一次甚至竟把饭倒在地上,让我们拣起来吃。在这种非法的折磨下,贺龙同志的身体越来越坏,经常感到饥饿。这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在湘鄂西,湘鄂边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情景。他还风趣地说:“咱们家乡的糍粑可好吃啦!在总理家住的时候,邓大姐问我们吃什么饭,告诉厨房的同志做,现在说说画饼充饥也很有意思。”有时,我们还偷偷到院子里挖点野菜。过年过节他们杀猪会餐,我们吃忆苦饭。每顿饭后,都是医生看着吃他拿来的药。到底是什么药我们也搞不清楚。因此对这些情况我非常担心。过去保健医生曾多次提醒降糖药长期不间断地服用和饮食治疗,是防止各种严重并发症发生的保证。他的生活、医疗条件发生了变化,贺龙同志的健康状况逐日下降……

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惨剧终于发生了。

其中两起都发生在解放军三〇一总医院的第14病区。

这是总医院的一个普通外科病区。紧挨着它的那座凹状灰楼,是大将级和元帅级的第六病区。但它当时被军内一伙新贵们所把持,拒收蒙难将帅。难中患病的将帅,统统被赶到条件简陋的14病区。

1969年6月3日晚上10时20分,一颗眩目的将星在这个病区猝然陨落——

病危中的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突然惨死在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六天之后,还是在那个普通的14号病区,又一面帅旗砰然折断。

A记得是1969年6月8日的上午,“贺龙专案组”的一个会议快结束时,芦凤歧通报了个情况,说:“警卫×师的黄参谋刚才来了个电话,要再去两个同志。小孙和小景同志去吧。”

他们赶到玉泉山西边沟口的那个警卫连,在连部听取连干部和护士王贺志的汇报,了解到贺龙最近一段时间心情比较烦躁,精神状态和饮食都不佳;有时心率跳动急速,病情见重,需要抓紧治疗。

听后,芦凤歧交代说:“生活上照顾点,要随时掌握病情变化,及时报告。黄参谋,让卫戍区医院派医生来会诊,把病情搞准。会诊结果立刻报告专案组。”

黄参谋答应马上办理此事,芦凤歧一行便回来了。

当天晚上,A和芦凤歧等人正在办公室打扑克牌,突然玉泉山沟口的警卫连来电话,报告贺龙病重。A说:“报告总理吧!”

芦凤歧扔下扑克说:“不用,我要个车先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三〇一医院派姓黄的女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带了辆救护车去接贺龙住院。躺在床上的贺龙听说要送他去三〇一医院,马上表示不去,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

方。”

但黄医生坚持：“要去，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贺龙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望望黄医生和护士，她们都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她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里等你。”

贺龙深深地叹息一声，没再说什么。医生护士便将贺龙抬上救护车。薛明紧跟在后面想一块上车，她们理也不理，用膀子一抗将她挤到一边儿，关上车门就开走了。元帅夫妇离别的苦涩情景，让铁石之人见了也为之心碎。

救护车慢速开出沟口，芦凤歧的北京吉普跟在后面保持50米的车距。开到玉泉山东南角公路上时，救护车停了下来。芦凤歧叫小景跑上去问问怎么回事。黄医生半开车门，轻声说：“正在输氧抢救，你回去告诉芦同志，车一会儿就开。”

大约是早上八点钟将贺龙送到三〇一医院的，下午两点钟他就去世了。从他神志清醒地入院到去世，拢共六个小时。

八

闻贺龙已逝，“贺龙专案组”的大部分人，都匆匆赶到三〇一医院。A到这个专案组一年多，始终没能见过贺龙。这一次见到他了，却是元帅的遗容。

那间长方形的病房阴森空旷，墙角摆着还没来得及收走的抢救器材。贺龙同志的遗体，仰卧在屋当中的单人钢丝床上，身上覆盖着医院的白床单；一块有皱褶的纱布，蒙在他那至死仍魅力无穷的脸上，蓬乱的长发从纱布下披散出来，使得满屋弥漫着一片无可名状的凄凉。

就在病房门口的过道上，“二办”办公室主任秦道馨与三个副主任会议了一下，然后分头去承办：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起草书面报告，

▽1956年，国家体委主任贺龙陪同周总理接见田径运动员



请示如何处理贺龙后事；去玉泉山接薛明以及找贺龙子女来向遗体告别。

八年后，薛明同志向中央报告说：

（九日）下午三点多钟来了一个卫戍区的参谋，说是要我跟他去医院核实一个材料。到医院后他们向我宣布说：“人已经死了。”并恶狠狠地说：“在他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一个医生简单地叙述了住院检查的经过。我只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应为两点）死亡。

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单凭这个数字本身就能说明他们对贺龙同志健康进行无情摧残、折磨的程度。从他这次发生新的症状到入院整整二十四小时，人还是清醒的，为什么入院后，在一切治疗和抢救都具备的条件下，反而只过了六小时便引起死亡？！恰恰这六小时正是他们没允许我在贺龙同志身边。我也没听说他们给用过什么抢救的药品。连派在我们驻地的医生对这样突然的死亡也表示奇怪……

三〇一的医生讲究以后，有人告诉我要我在那里等着，他们要去

接贺鹏飞他们来，一同去看贺龙同志的遗体。当时我坚决反对，担心他们又要耍什么花招。他们告诉我，是请示了中央首长（听说是黄永胜），是命令，非看不可。孩子们来了以后，他们把我们带到14病室，看了一下贺龙同志的遗体，接着就把我和孩子分别带走了。我仍旧回到了原来和贺龙同志一起住的地方。

A在一旁看到薛明在这向贺龙遗体告别的整个过程中，没掉一滴眼泪，也没说一句话，表现出令人不安的沉默和异常的平静。只是在芦凤歧征询她对处理贺龙遗体的意见时，坚毅的元帅夫人说了句唯一的一句话：“由组织决定吧。”

当天晚上，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送到八宝山。与五个月之后死于合肥某部队医院的陶铸被化名王河，与五年之后也是死于三〇一总医院第14病区的彭德怀被化名王川一样，贺龙被强安以“王玉”的名字火化了。火化时，没让他一个亲属在场。

贺帅走得很孤独。

“贺龙专案组”买了只中等质量的骨灰盒，装殓贺龙骨灰，秘密存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每年的6月9日，派个人去交纳保管费。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贺龙去世这天的《人民日报》上，很醒目地登载着一篇报道：

新沙皇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 今日苏联冤狱遍于国中

周总理审阅了“贺龙专案组”和三〇一总医院的两份“关于贺龙死亡原因的报告”，用红铅笔仔细修正报告上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未作任何批示便退回“贺龙专案组”。对这个专案组呈送的报告一言不发，这在总理还是第一次。

听说正在读书的毛泽东得知贺龙的噩耗，手中那卷线装书哗然落地，怅然若失。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对待贺龙同志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心里始终是矛盾的。

1965年夏天，他曾高度评价贺龙“是一个方面军的领袖”。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默许打倒的第一位元帅就是贺龙。

1967年7月，他在杨成武代总长面前盛赞“贺龙同志是二方面军的旗子”，并有意让贺龙出来工作。然而，仅过半年，他又亲笔圈阅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这个批示上第一句话就是“刘、邓、陶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蔽在党内，窃据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

这是贺龙第一次被在中央文件上点名定性。

又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上朱批：“照办”。

批示中说：“两年来，辽宁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

小平、陶铸、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以及他们在辽宁的代理人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此后四天，毛泽东再次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布的命令：“国家体育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为此，特决定全国体育运动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地承认：“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但他接着又补了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喜欢珍藏、把玩小手枪的，决不只是贺龙一个人。可毛泽东怎么唯独警惕贺龙的这一癖好呢？

我们永远也无法准确透视毛泽

东的复杂心态。这位生前受亿万人民衷心拥戴，被捧上神坛的湖南汉子，思想意识太活跃，太超前，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因而，他是孤独的，连心思也是无以倾吐的孑然。他只好悄悄将它们带往另一个世界，任其风化剥蚀。但却给今天认识和研究这位旷古罕见的伟人，留下了无数的遗憾和谜面。

贺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元帅，而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但整死贺龙恐怕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1980年夏天，邓小平和胡耀邦、胡乔木等同志谈论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曾这样说过：“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越整越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不能全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这是对造成贺龙之死责任的界定。

（责任编辑：刘家驹）

△贺龙和关向应在前线



张闻天的最后十个月

●朱 亮

张闻天的最后岁月,是在江南水乡无锡度过的,虽然只有10个月,却光辉而又悲凉。

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列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给撤销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剥夺了公开发表言论的权利,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文革”一开始,张闻天拒绝康生诬陷刘少奇应对“61人出狱案”负责一事作证,被遣送至广东肇庆。

解除监护后,他多次向中央毛主席写信,要求回北京,他现在除了“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没有其他要求了”。此信经王震转呈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沉默片刻,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换一地方居住。”12月2日,张闻天又提出回自己的家乡上海养老。但“四人帮”不能容忍张闻天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安居,于1975年4月28日,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如果上海去不成,去苏州或无锡也可。

张闻天抵达无锡,先暂住太湖饭店。他远眺太湖,烟波浩淼,不由感慨万千:青年时代,他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时,曾随高班同学须恺到无锡北乡王庄须家度过暑假;于是在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旅途中》,就有多处是直接描写无锡。

张闻天身居无锡,重病缠身,却密切关注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继续著述他未完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他还凭借有限的文件材料和周围同志的介绍,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示自己的看法,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正直品格和一个革命家的敏锐洞察力。

由于遭受长期迫害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张闻天患有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肺结核、老年性白内障等多种疾病,在无锡他先后发病7次,均经全力抢救脱险。为了治疗需要,中医处方上开了点人参,他如数交款。1976年4月,张闻天连续几次发病,十分危险,他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对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



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为此,张闻天还和刘英写了合约: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的党费。

张 刘

1976年4月

后来,刘英为张闻天一次上交党费4000元。1981年6月29日,刘英又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献储蓄40169.6元。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清晨,张闻天默默打开收音机,听完新闻节目。下午,他听黄关祥读了一会儿《参考消息》,4点45分,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当场昏倒在警卫员张敏群身上。在场的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无效,下午7时30分,张闻天在无锡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之旅。

张闻天逝世后,江苏省委立即向中央报告,请示丧事处理事宜,并请中央来人主持。因“四人帮”的阻挠,未获同意。由于“规定”,仅有的几只花圈只能写上“张普”这个化名。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献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

中央报刊一概保持缄默。7月13日《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方式刊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6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平反。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追悼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中肯定:“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责任编辑:仲 文)

揭开甲午历

百岁老人杜渐离,他的父亲杜仲,是当年北洋水师中的一名军官,先在广乙舰上当枪炮二副,后又调到致远、来远上当二副。更为宝贵的是,老人不仅赠送给我他的百年记忆,而且还赠送给我他父亲留下的一本日记。虽所记的文字寥寥,但给我的启示却是极大的,仿佛是从黄海深处的沉船里捞上来一只历史的黑匣子。我选择其中几页,请渐离老人加以注释和补叙,如实公诸于世。

一

甲午八月初二(西历 1894 年 9 月 1 日),阴有小雨。丁军门统率定、镇、靖、经、来、济、平诸舰到北洋海面巡查,由海洋岛、大鹿岛、小鹿岛至大同江口。予乘小船往见,得允被收留,编入致远舰,仍任专管枪炮之二副。

在 7 月 23 日丰岛之战中,广乙舰被毁,二副杜仲被气浪从甲板上掀到大海里,溺水到孤岛上,后被朝鲜渔民救出,并护送到平壤驻朝清军营地,北洋水师巡海到了大同江口,他立即乘小船归队。

在外淹留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杜仲恍若隔世,回到了北洋水师,那种亲切感是用言语说不出来的。看船船亲,看炮炮亲,他见到的官兵、校弁,个个脸上却挂着愁容,他的心为之一沉。

现在,朝野上下对北洋水师却是一片毁誉之声,丰岛之战中国吃了大亏,都想要给予野蛮强盗以应有的惩罚和报复。谁能够尽早地伸出这种报复之手呢?要诉诸国际公法或列强调处,只能是一种梦想,连光绪皇帝都说:“不得倚仗俄人!”

北洋大臣李鸿章迫于舆论,不得不连忙向朝廷禀报,说:“已飭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带铁快各船,驰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丁军们给李中堂电报却一再申明不去的理由:“彼暗设地雷,猝出雷艇四面抄袭,我少快船,行较迟,恐坠奸计,若驰逐大洋,彼以船快炮速,我以炮大甲坚,明战可冀获胜。”一个月来,丁汝昌总是向朝廷禀告说“未遇”,敌人好像总是同他捉迷藏似的,气得皇帝急急忿忿地责问:“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出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步?”

于是,言讨诛伐丁汝昌的呼声便在朝野内外沸沸扬扬起来。什么“畏葸之徒”、“只会见敌望风而遁”,“不敢远离刘公岛一步”,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以珍妃的老师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和她的两位胞兄志锐、志琦最为尖刻,奏章连篇累牍,他们要求“不重治丁汝昌之罪,何足伸国法以快人心?”

在这种情势下,作为花费 20 余年心血惨淡经营水师的李鸿章,便不能不替丁汝昌说话了。他了解丁汝昌。丁原是湘军里被裁减下来的一个记名提督,1879 年始创北洋水

师时,李鸿章将他推选到海防署待命差遣,年底从英国购进镇东等 4 艘炮艇后他才接受实差,当了炮艇督操。那年他已经 43 岁了,因此可以说他是半路出家,对于海事基本上不大懂行。

李鸿章是袒护丁汝昌的,因为他不能不珍惜北洋水师这份缔造艰难的家业。不得不顶着舆论压力毫不避嫌地向朝廷申诉自己的意见:“(丁)曾经大敌,迭著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藉资阅历。创办海军,特蒙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这些上层的人事关系,是杜仲到致远舰任二副后,从大副陈金揆那里了解到的。

二

甲午八月十六日(西历 9 月 15 日)阴转小雨。前日接北洋来电,令水师全队出发去大连,护送运兵商船至鸭绿江口。昨日傍晚整队出发,离开威海直奔旅顺,拂晓前到达。致远、来远尾炮有损,原已在旅顺船坞修理,今晨一同从旅顺起航,午时到大连湾,泊于老虎滩外。

一连十几天,北洋水师各舰,一

史的黑匣子

直泊在威海港里没有出海，无论舆论怎样呼唤和责难，希望水师能够主动出击夺回朝鲜海面主动权。在此期间，日军已运送二万多人在大同江口和元山港登陆，对平壤已形成合围之势，而且还切断了平壤至义州、安东之间的通道。驻朝清军陷入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险境，当前最紧要的是，将援兵运送到平壤。

中国军队虽有十几万人，但要在仓促中整顿起来调往平壤，殊非易事。李鸿章思谋良久，只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先将守旅顺的4千人运去，然后再调他军来接防。但是，他又不敢走海路直接将兵运至大同江口，怕复蹈丰岛之战中仁字营全军覆没的厄运，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循着中国海岸直奔大东沟上陆，由安东过鸭绿江再至平壤。

三

甲午八月十八日(西历9月17日)晴。上午八时，主舰挂出龙旗准备返航。十一时许，忽然发现西南方向升起黑烟，有倭舰迎面驶来。主舰挂出“三七九九”旗，命令各舰升火备战。一个钟头后，一场震惊中外的黄海大战终于爆发了。炮火弥天，黑烟障日，大海倾覆，血肉横飞，北洋水师被迫面向敌人迎战。激战中邓管带、林管带、陈大副等为国壮烈捐躯，一颗颗中华英雄魂永奠于黄海波涛之内。

由于连夜赶着卸船，天明时4

千人马都已在大东沟登陆，丁汝昌看到护航使命已经顺利完成，轻松地舒了口气，当即命主舰挂出龙旗，舰队准备返航。

10点多钟，杜仲忽见西南方向水平线下降起簇簇黑烟，从烟势的情况来看，这样大的舰队来此中国近海，不会是别人，定然是日本强盗！此时，主舰发出了信号，命令各舰准备战斗。杜仲心中明白：战争又来临了，不报仇雪恨，对不住广乙舰殉职的官兵。他急忙地奔跑于各个炮位之间，仔细地认真地检查炮身和炮弹，并向各炮手叮嘱着注意的事项。舰上那急促的喇叭声、铜号声，像战鼓在激励他做好冲锋准备。

11时左右，杜仲已经清楚地看到迎面驰来的12艘日本舰了。他们先前挂的是美国旗帜，待到接近后，改换成了刺眼的膏药旗。站在船头上拿着望远镜的大副陈金揆告诉杜说，最前面的是日本当前航速最快、火力最强的吉野。

中国的舰艇是16只，4艘炮艇留在港内正帮助卸船，平远和广丙在鸭绿江口守卫，眼前只有10只。主舰挂出信号：分成5个小队排成“二”字形前进。致远离主舰定远最近，杜仲已影影绰绰地看到了丁军门、汉纳根和刘总兵并肩站到飞桥上，举起手中的望远镜，紧紧地盯住迎面扑过来的日本舰队。

在此紧急关头，中国舰队不知为什么忽然临时改变了主意，主舰挂出旗号要将现行的两列纵队阵改为雁行小队阵。这样一来，走在后边

的诸舰则要各以45度角向左右两翼散开。致远、靖远、济远、广甲为左翼；来远、经远、超勇、扬威为右翼。队伍变成扇面形。后来，亲自来大东沟战场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在评价这次改换阵形时说，这实是聚五洲之铁都难以铸成的大错。因临敌前突然改变阵形，队伍自身就已慌乱。本来应变成个半月形的阵式，但现在却拉了个狭长的“人”字形。这就为敌舰包抄后路造成有利机会。

12点50分。海上轰然一声巨响，杜仲抬头远远地望去，走在最前边的定远已发射出一枚30.5公分口径的重炮，火球腾空而起。这是甲午海战的第一声炮响，是打破战前沉寂的一捶重鼓。遗憾的是，这一发炮弹落到吉野左舷侧100公尺的水中，顿时溅起百尺高的水柱。接着，从后面赶上来的镇远也发射出一枚重炮。

这两发炮弹虽然没有打中敌舰，但却使敌人感受到一种不可抵御的巨大威力。

不久，敌方主舰松岛，在相距定远舰3000公尺处开始向我射击。一时间双方万炮齐发，天鼓齐鸣，冲天水柱一个接一个从海面升起。

正当敌我双方主舰直接相向对攻时，突然一发炮弹飞来，将定远舰上的了望塔击碎坠落水中，塔中7人尽都丧命，挂在塔上的号令旗也被击毁，从此北洋水师无号令指挥，各船只能是各自为战了。更为不幸的是，丁军门因炮声震塌飞桥，从几

米高处跌到铁甲板上,同时一根铁柱子砸在他腿上。一个水兵赶紧移开铁柱,准备送他到舱里将养,谁知刚刚走了几步,一发炮弹在身边爆炸,水兵赶忙将丁军门按倒,以自己身躯覆在其上,等到气浪冲击过去,丁军门发现护在自己身上的水兵已经血肉模糊了。他激动地说:“我今活下来,你却为我而死去。我这条命是将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下来的。我不能去舱底将息,否则无颜见全军将士!”说罢,挣扎地站起来,坐到甲板上的罩架(当时人称为三官厅)里,忍着伤痛继续指挥作战。

就在这时,吉野和它身后的高千穗等舰,绕到了我军的背后。狡猾的吉野知道,在它面前的是已有13年舰龄的老船超勇、扬威,于是便集中火力向两舰发起攻击。

强弱对比太悬殊了,吉野等4舰从12点55分开始进攻,炮弹如同雨点般倾泻下来。超、扬奋力以炮火还击,仅过13分钟(1点零8分)就有一弹击中吉野,打死敌之官兵2人,伤9人,并引起了火灾。不久,高千穗和秋津洲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超、扬二舰已经是伤痕累累,水火满船,滚滚浓烟已将全船笼罩住。2点20分,超勇右舷倾斜,海水灌进船舱,漫过甲板,管带黄建勋见船已经无法挽救了,便像一位堂堂正正的船长所做的那样,投水殉职。一鱼雷艇急驰过来抛绳子给他,他拒绝接受,将身子沉入了海底。它的姊妹舰扬威亦受重伤,首尾舰炮都已不能转动,火势熊熊无法扑救,管带林履中急命将船驶出战场,但行至浅水处又搁浅。林管带登到高处望了望眼前的形势,知道已走进无可挽回的绝境了,决定追随黄管带而去。他毫不犹豫地奋身一跃,便没入波涛中。

这是甲午海战中最先捐躯的两位管带。

军门负伤后依然危坐在甲板上

的罩架下,镇定自若地指挥作战,其精神使船上官兵深受感动,士气为之振奋激扬,大家同仇敌忾,猛烈地向敌舰进行还击。不久,就有一颗炮弹击中到松岛舰上32公分口径大炮的炮塔上。这是松岛唯一的一尊大口徑火炮,当即旋转失灵无法继续使用,旁边的两名炮手也受了重伤。

北洋水师的优势是船大而坚,船首重炮多;日方的优势是船龄新,船速快,速射炮多。为了发挥我之优势,就要始终保持船首直对敌人。

杜仲同船上的炮手们一样,情绪激昂振奋,忘记一切地拼命往炮膛里填弹,点发炮。日舰比睿的右舷仰角计被击中了,轰然一声,弹片横飞,几名炮手都被击毙。比睿知道形势危急,不敢停留,忙升起“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信号,掉头逃跑了。

比睿逃逸,它身后的赤城却暴露在我炮火之下。杜仲指挥的火炮连珠似的打过去。一枚15公分口径的炮弹落在赤城左舷的一尊速射炮上,正在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少佐,被一块弹片穿破头部,脑浆迸裂倒在船上。

坂元死后,定远、致远、靖远,继续对赤城发动攻击。赤城的人,十有八九非死即伤,失去了战斗力,只好退出战斗。

另外一艘日舰西京丸,在我定、镇二舰重炮猛轰下,左舷后部被击中,海水从裂缝哗哗地冲进仓底。

吉野等4舰击沉超、扬之后,很快就绕到我方左翼,与此同时,松岛、千代田等5舰进入了 my 右后方。我腹背受敌,形势十分不利。

3点零4分,吉野击中定远,甲板上炸开了一个大洞,火焰从洞口猛烈窜出,霎时烈焰腾空,日舰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少将抓住了这个机会,命令各舰立即向定远猛扑过去。在这万分危急时刻,致远管带邓世昌毫不迟疑地指挥致远舰迎上去,

挡住了日军对定远攻击的道路。他命令杜仲,将全部炮火都对准最凶猛的吉野。

致远像鹰隼一般闯到阵前,用船体掩护定远的这一英勇果断行动,使坪井大吃一惊,他马上集中火力轰击致远舰。已有好几发炮弹击中目标,致远甲板上起火了。邓管带带头抢救火险,火势稍转弱后,他又到各炮位上去指挥发炮。炮手们临阵不慌,同心协力,打得又快又准。最使杜仲感到高兴的是,打在吉野左舷上的那一炮,那是他从左舷3号炮位打出的,炮弹穿过吉野的甲板落到了机器房里。遗憾的是,炮弹没有爆炸,否则敌舰顷刻间即瘫痪。杜仲气得狠狠地跺了一脚,怒骂道:“真他娘的,又是一颗臭弹!”这次海战中,仅仅在致远一条船上就发现臭弹7枚。北洋水师受创如此之惨,弹药就是它吃亏的一大原因,那个军械局张士珩道员的卑劣形迹,事过多少年也没能从杜仲对他仇恨的记忆中消逝。

由于致远横在前边独挡群敌,身上中的弹越来越多。3点20分,有数弹同时击了他的水线,右舷旁边鱼雷发射管中的一枚鱼雷被引爆。这是来自内部的打击,伤害就更为沉重,右舷马上发生倾斜,而且越来越加剧。这时,立在船头上的邓管带知道大势已去,沉船已无可挽回了。他睁裂双眦,回身对陈大副说:“全揆,事已至此,我们只有以身报国了!你开足马力,向那个最凶蛮的吉野冲过去。倘能与他同归于尽,敌人失去巨擘,力量就消失大半。吾等虽死,我水师尤有获胜希望!”

说完走过去要亲操舵柄,陈大副推开他说:“邓管带,你站在旁边为我指示方向就行了,我一定会全速开进,至死也要追随你!”说罢,把方向对准吉野,像一头愤怒的狮子直冲过去。

邓管带走下驾驶楼又奔到各炮位上,与杜仲一起督促各炮手奋力



丁汝昌

向敌舰发炮。杜仲这时清楚地感觉到，全舰官兵都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如同田横岛上五百壮士走向最悲壮的时刻那样，这时的致远就如同一支离弦的箭（虽然已身负重伤，船体严重倾斜），连珠的炮火，一路风风火火地射向吉野。

当吉野慌张向四处躲避时，其余数舰也给冲得阵式一片混乱。令人痛心的是，致远友邻舰船并没有主动配合，趁机向散乱的敌舰发起攻击。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却令挂出“本舰已受重伤”信号，它虽中弹数十发，但无致命处，却自行离队到阵外观望，后来，看到致远被击沉，它便掉头向旅顺方向遁去。在慌忙逃走时，又将本已搁浅的扬威舰拦腰撞了一下，使其水线震裂而沉没海底。与它一队的广甲见此情形，也跟着在它后面逃跑了。黑夜里慌不择路，竟然搁浅在大连湾三山岛外。在这种情况下，致远遭受到何等沉重的打击就可想而知了。最后，有一颗鱼雷击中了致远，舰首朝天，滚滚浪涛很快淹没了它。

舰沉之时，全船的人尽都坠落水中，大副陈金揆、二副居阶等因不会水很快就被波涛卷走。杜仲水性好，落水后赶紧去寻邓管带，可惜在浪花飞溅、烟雾迷蒙的海面上哪里能寻得到呢？直到后来他被炮艇左



林永升

一号救上来时才知道，邓管带已舍身于水，将一颗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华英魂，祭奠在黄海的无际波涛里。

原来，当邓世昌坠入水中时，舰上有一水兵主动将身上所带救生圈送给他，他坚决不受，说：“我身为管带，理应与舰同没，怎肯接受你的救命工具？”说毕决心沉没于水中，不让人们再寻见他。因之，左一炮艇在沉船附近搜索再三，也没有见到管带的踪影。

而正当管带决心下沉时，他的两只爱犬“阿雪”和“阿花”扑奔过来，一只衔着发辮，一只钻到他的腹下用身子将他托起，一前一后将他拖到浅滩上。邓管带当时已经昏迷过去，当他清醒过来发现两只爱犬守在身边，他激动地搂住了阿雪的脖子，用手抚摩着双犬身上抖落着水珠的脊背，仰天望了良久之后毅然站起身来，撵走两犬说：“从军报国是人类的事，与你们犬类无关，上岸活命去吧！”说毕，便投身于万顷波涛之中。“阿雪”“阿花”像是明白了主人的一腔忠义，在主人捐躯之处，双双沉没于水中。

当邓世昌魂奠波涛之际，另一位英烈又血染黄海。原来，位于右翼的经远、来远，在超、扬被毁后势单力薄，但仍然是毫无畏惧地与包抄过来的松岛五舰激战，而经远首当



邓世昌

其冲。舰上已中弹数十处，管带林永升一面抽人扑火，一面继续与敌舰厮杀拼搏。

3点20分，吉野4舰击沉致远后，转过头来投到围攻经远的战斗。经远形势危如垒卵。在此生死存亡时刻，林管带镇定自若，又继续奋战了半个多小时。4点零5分，一声霹雳震于天庭，炮弹在身边爆炸，林永升管带被弹片击中，血流如注，当场壮烈牺牲。

林管带牺牲后，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也相继血洒船头。但是，舰上官兵仍如致远一样，敌忾同仇，视死如归地顽强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被击沉。

当杜仲被救上炮艇又回到主战场时，中国舰队已经是七零八落，只剩下定、镇、靖、来4条船了（致、经、超、扬沉没，济远、广甲远逃，平远、广丙避敌于大鹿岛，镇南、镇中二炮艇和左二、左三二鱼雷艇还在港内未出）。而敌人却还有9舰，他们仍将战舰划分为两个部分：松岛5舰围攻定、镇，吉野4舰包抄靖、来。

靖远管带叶祖珪、来远管带邱宝仁有勇有谋，临时结队紧密地配合。

这一仗打得够艰苦的。敌舰的速射炮连珠似地打来多少弹已无法统计了，两船皆都弹痕累累，满目疮

艇,靖远中弹百余发,来远则不下二百。烈焰飞腾,空气灼人,人像置身于烤箱里。靖远除了火灾以外,水线又为敌弹所穿,海水汨汨不停地涌进船舱。在此危急关头,叶管带临机应变,在桅杆上挂出“西驰”的信号。于是二舰一前一后冲出敌人包围,向着大鹿岛方向退去。大鹿岛距海岸很近,二船停靠在那里,其尾部已藏在浅水中,只将船首朝外。这就如同短刀格斗时背靠了墙,免去了敌人抄袭后路之忧,且能充分发挥船首重炮的威力。这就为他们腾出人力去扑灭船上大火创造了条件。

战场的另一端,更为激烈:松岛5舰将我定、镇两舰团团围住,身边可作卫护的只有福龙鱼雷艇和炮艇左一。杜仲看得清楚,丁军门仍端坐在三官厅里,用他的病躯来鼓舞士气。舰上的管、帮带和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常过来同他商量应急对策。在另一条船上,镇远管带林泰曾和大副杨用霖打得很顽强,调度也得法,他们用巧妙的变速和变位,有力地掩护了定远,使两条船虽在重围之中依旧岿然矗立,使敌人不但奈何不得,且不时受到我重炮的轰击。

松岛不断受到打击后,不得不收敛锋芒转身向后退去。定、镇二舰当即乘胜追赶过去。由于盯得太紧,敌退二三里后复又回过头来再战,而且反扑的后劲很猛,双方又处于胶着状态。不久,松岛复又中了两弹,其它4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这时天色已晚,海面已昏暗,敌人不敢恋战,且战且退地向西南方向驶去。

与此同时,靖远、来远也已经扑灭了火,恢复了战斗力,开始从浅海

处冲出,它们绕过吉野4舰,一边主动向定、镇方向靠拢,一面由靖远代主舰升旗行令,挂出“收队”信号。这时,避在大鹿岛附近的平远、广丙和尚在港口内的镇中、镇南2炮艇和左二、左三2鱼雷艇都赶来会合。此时,北洋水师复又列队向旅顺方向驶去。

四

甲午八月二十三日(西历9月24日)阴雨。天未明即起,与叶、林诸管带同去旅顺黄金山下大坞西之刑场,送别方伯谦管带。归来后去来远,留宿在邱宝仁管带处。

水师的人冒着细雨,默默来到大坞西时,济运管带方伯谦已被绑缚到刑场上,身穿褐色的号衣,辫子高高地盘在头顶上。脸色阴沉,眼神苍凉,毫无表情。忽然,他用一种奇异的声调高声呼喊着:“刘步蟾,林泰曾,两位总兵大人!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是的,水师里的人几乎全都来了,丁军门身受重伤,不能走动,没来送行。

刘步蟾、林泰曾的脸色,同刑场上的人一样铁青,他们目不转睛地瞞望着方伯谦没有吱声。

方伯谦:“你们不会忘记吧,我保护住了济远,在强敌八面袭来,中弹数十余处的情况下,我把它完好地保存下来,结果还落得个临阵脱逃的罪名。二位总兵,你们不觉得冤枉吗?”

“可你打乱了舰队阵式,涣散了军心,这罪责还轻吗?”刘步蟾终于还了口。

“可是战阵甫合,帅旗被毁,你

们又没有另以他舰代行,致使各舰无令可遵,各自为战,这又是谁之罪?”方伯谦说。

“既使没有帅旗,也还有主舰。各船都要围绕主舰作战!”刘步蟾说。

“可你总不能违背海军荣誉呀!你该想想世昌,永升,还有履中、建勋他们,我们福州船政学堂的其他同学!大家一样都是父母所生、祖国所育的吧?!”林泰曾曾含热泪地说。

方伯谦不言语了。他全身禁不住颤抖着,垂下了头,低声地叨念:“我今先走了,但我知道,你们这一天早晚会的,就像白天过去就是黑夜一般。北洋水师一定全要毁的,这是注定了的,而且,你们走得也不一定比我光彩……”

方伯谦做替死鬼,属于同一性质的,前有广乙管带林国祥,这次有广甲管带吴启荣,都没有作处理。李中堂呈报说:“广甲随济远逃至中途搁浅,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著革职留营,以观后效。”林国祥呢,奏给皇上的是“英勇善战”,还保举他做济远的管带哩。

杜仲与邱管带回到来远舰上。到这里来参观的人很多,连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也来了。当日来远烧得最为厉害,满船焦糊,面目皆非,但却能随着舰队安全地返航,这在世界海战史上也是罕见的,许多人都为之惊叹。

外报评价说,北洋水师“实战能力弱,应变能力不强。”“中国士兵是勇敢奋力的,军官们则勇与怯相差太远!”

(责任编辑:刘家驹)

(未完待续)

中日甲午战争反思录

●王戎笙

中日都不约而同地 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

中国和日本,都有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有相同的文化背景。
十九世界上半叶,中日两国都处在
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都面临落
后挨打的历史命运,也都遭遇到西
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都不约而同
地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当日本德
川幕府连续多次发布“锁国令”时,
中国也正在采取禁海政策,严峻时
甚至“无许片帆入海”。中日两国封
锁海疆的命令,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令》中明文规
定,“除特许船以外,不得派遣日本
人至外国。如有偷渡,应处死罪。偷
渡船及船主,一并扣留。”清政府规
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
移海岛、盖房居住耕种田地者,皆拿
问治罪。”中日两国的统治者妄自尊
大的心理和自我封闭的言论如出一
辙。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
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
无。”这句名言并非乾隆皇帝独创,
在东邻的日本,一位名叫山鹿素行
的思想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类
似的话:“以我天下之富,土地之广,
不需仰赖外夷之物即可自足。”

中日封闭的大门同样 是被欧美列强的炮舰政 策强行打开的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江户湾(东京湾),用武力威胁的口吻要求日本开放港口。1854年2月佩里再次率领舰队来到日本。日本在美国炮舰的威逼下,被迫于1854年5月31日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开放下田、函馆两港为通商口岸,允许美国在下田设领事馆。这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久,英、俄、法、荷等国沿美国先例,也胁迫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标志着日本锁国时代的结束。

由美国第一任驻日本总领事哈理斯与日本交涉,于1858年7月29日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除根据《神奈川条约》开放的港口外,日本再向美国开放5个港口,在这些港口居住的美国公民不受日本法律的管辖,美日两国互派外交代表,并缔结关税协定。接着,日本又被迫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了同样的条约。这些条约的基本内容,酷似欧美列强胁迫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在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商埠,丧权辱国已极。鸦片战争之后,执政当局依然苟且偷安,相信一张条约会带来“万年和平”。当然也有比较清醒的,比如魏源,鸦片战争一结束,他便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似很平

常,但在当时,要承认“夷”也有“长技”,要善于向一切有“长技”的“夷”学习,这是一次观念上的更新。可惜《海国图志》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正如左宗棠所说:“书成,魏子歿,廿餘载,事局如故。”真正受到重视的是在东邻的日本。日本人把《海国图志》看成是了解世界形势和加强海防的重要读物,看成是更新观念的重要读物,纷纷加以翻译或训点或摘要,广为传播。

“师夷之长技”,中日 两国处在同一条 起跑线上

清政府真正感到震惊的是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焚掠御苑,创伤深重,屈辱备至。船坚炮利的威力,引起认识上的变化,认识到“夷”确有“长技”可“师”。从“天朝无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个认识过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这个认识主要是从战败中得来的,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学习是从学造洋枪洋炮开始的。随着对西洋“长技”的知识增多,兴办洋务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从造枪炮到造轮船,从造枪炮轮船到开矿、采煤、炼铁、修建铁路、架设电线,从军用工业到民用工业,从兴办洋务企业到培养洋务人才、派人出国留学等等。三十年间,终于建立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

曾国藩、李鸿章兴办“洋务”,受

到当时守旧大臣的极力反对,幸亏得到执政大臣文祥及恭亲王等人的支持才得以顺利进行。但由于长时期的闭关锁国。人们的守旧思浓重,广大知识分子仍迷恋于八股取士,不仅守旧派人物敌视或蔑视西学,即使倡导“洋务”的领袖人物,对于西洋文明也是一知半解,并无足够的认识。因此,他们只知学习洋枪洋炮轮船铁路等技术,很少留心西洋的政治、法律及教育制度,以求根本的改革。

中国“师夷之长技”的“洋务运动”只着眼于技术,不求政治革新。虽然建立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政治上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洋务派是要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就是说,只允许在工业技术方面进行改革,不愿也不敢提出把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洋务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者是官商合办,官场上的种种恶习都带进了企业,使企业衙门化,缺乏生机和活力。企业里养了一批根本不懂经营管理和在科技上一无所长的官僚。官僚们的一大批亲朋好友也在企业里挂名分肥。积弊积弱的中国,并没有通过三十年的求富图强的运动真正富强起来。

日本向西方学习和中国“师夷之长技”,差不多是在同时和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的。以中下级武士为骨干的维新势力,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1868年4月6日,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宣布《五条誓文》,这实际上是明治政府政治改革的纲领。《五条誓文》的核心是,破除封建体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

明治政府十分重视人才培养,把教育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1872年实行教育改革,兴办近代国民教育。到1898年,学龄儿童的就学率97%,为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文明

开化”的口号下,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许多西方国家聘请学者、技术专家,派遣大批人员出国学习,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工、铁路、航运、电讯为中心的近代企业。同时在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实行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以促使日本的近代化和西方化。采用西洋武器,用西法训练军队,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富兵强的日本。由于日本国力日渐强盛,从1894年开始,要求修改西方列强胁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1911年终于全部废除。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同的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推进。1881年10月天皇发布诏书,宣布1890年召开国会并制定宪法。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6年开始制宪。1889年2月1日由天皇颁布日本宪法。1890年召开国会,举行第一次大选。宪法将各项改革成果从法律上肯定下来,标志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近代天皇制的最后确立。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用了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短短三四十年之间,由落后的被人欺侮的小国,奇迹般地变成令人刮目相看的强国。而中国呢,经过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之后,虽然建立了许多近代工矿企业和颇具规模的近代海军,依然是任人宰割的贫穷落后的国家。

“明治维新”使日本雄霸东亚并参与西方列强对远东地区的殖民

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政府借口1871年琉球船民在台湾南部被当地土著杀害,派侵略军三千在台湾登陆。谈判中,软弱无能的清

政府妥协,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竟把日本侵略台湾说成是“保民义举”,而且抚恤琉球难民白银40万两,补偿日本的修道建屋等费用白银10万两。这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更加助长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扩张野心。

日本蓄意侵略朝鲜,1875年派遣军舰“云扬号”制造事端。1876年2月,日本用武力胁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这是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朝鲜除釜山外,另开放元山、仁川两个港口;日本在汉城设立使馆,在各港口派驻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

1879年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1894年发动侵华战争,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勒索赔款。1905年年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使朝鲜变成日本的附属国。1910年又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

不久前还是饱受外国侵略的日本,一旦强大起来之后,马上就变成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到处伸出魔掌,攫取种种特权,强占别国领土,勒索巨额赔款。

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日本明治维新稍有所成,便积极对外扩张,制定了一个把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1874年侵犯台湾,1876年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否认中韩宗藩关系,1879年以武力吞并琉球,这些事件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正如恭亲王所说:“自台事就绪,而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所谓“豫为之备”,就是巩固海防,加速海军建设。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大清福建海军全

军覆没。清政府又一次受到战败的强烈的刺激,于是决心“大治水师”,并于1885年10月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日本为了加速海外扩张,非常重视海军建设。明治天皇就说过:“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日本建设海军的目标非常明确,以中国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作为假想敌。北洋舰队拥有巨型铁甲舰,是日本海军望而生畏的,日本海军就在炮火速射与舰艇航速上谋取优势。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又针对北洋舰队的特点,把扩充海军的重点放在购置速射炮和快速巡洋舰上。而这个时期,清政府却忙于为慈禧太后祝寿,把钱用于修筑颐和园,海军却没有购置一舰一炮。甲午战争爆发时,中日两国海军互有短长,综合力量不相上下,即使有差距也相去不远。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蓄谋已久,除了在军事上积极准备外,还加强了战前及战争期间在华的间谍活动。整个间谍活动是在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的指挥下进行的。他派遣大批间谍,以各种合法身份,商人、学生、游客、驻华使馆武官,肆无忌惮刺探军事及其他各种情报。甚至公然在上海英租界,成立培养和训练日本间谍的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战争爆发前一年,川上操六还以旅游为名亲自到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和中国的烟台、天津等地从事间谍活动三个多月。清政府对日本的间谍活动毫无戒备,战前驻日公使汪凤藻和清政府往来密电54件,《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和清政府往来密电22件,全部被日本人掌握。日本间谍机关是怎样破译这些密电的,至今还是一个谜。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军舰。中国海军运兵船队的机密,竟被日本间谍准确掌握,至使日本海军偷袭成功,挑起了对华

战争。

8月1日中日政府正式宣战。中国陆海军官兵浴血奋战,不幸在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中先后战败。10月,日本分陆海两路进攻中国东北,相继占领丹东、大连、旅顺。由于李鸿章采取消极防御战略,丧失了海上作战的机动能力。舰队官兵包括许多高级将领以死报国,表现了为国为民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1895年2月,日军攻占山东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如狼似虎的 《马关条约》

1895年3月,日军占领辽东半岛,清政府被迫接受日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1895年4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今下关)的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共十一款,依其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

一、中国承认朝鲜的“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控制。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台湾经过长期开发,特别是由于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努力,设邮局、电报、开矿、制糖、制樟脑、铺设铁路……等等一连串的工商活动,其近代化程度为全国之冠。台湾是日本垂涎已久的资源丰富的宝岛,又是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战略要地。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总共是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息银还未计算在内。这笔巨款可以修筑铁路一万一千公里,或建造福州船厂那样规模的造船厂六百多座,即使建造像江南制造局那样大型的综合性重工业企业也可以

建设十几座。日本帝国主义这次向中国勒索战争赔款,使中国更进一步贫穷,日本更进一步富强。

四、日本军队暂时占领威海卫,直到交清最后一次赔款为止,由中国政府每年支付占领费五十万两白银。每年的占领费,能建一座福建船厂有余。

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日本轮船可在长江及运河航行,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领事馆。

以妥协忍让办外交的李鸿章,接到日方提出的条约稿本时,也感到日方的要求过于苛刻,当即电告总理衙门请示,李鸿章在电文中说:“查日本所索兵费过奢,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法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中国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各局必不能成,两国唯有苦战到底。”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的往来电报,全被日本破译。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既不善战,也不善谈。在战场上保全实力采取消极防御战略,谈判桌上以妥协忍让为指导原则与日方代表讨价还价。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怯于日本的战争威胁,无力和日本对抗,被迫接受日方要求。乃于1895年1月14日致电李鸿章云:“……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订约。”李鸿章接到电文之后,于4月15日,仍与伊藤举行了第五次会谈,作最后一次的讨价还价。但由于总理衙门批准签署的电报已被日方破译,日方洞悉总理衙门的态度,断然拒绝作任何让步,伊藤博文说:“已让至尽头地步,主意已定,万不能改。”1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

这是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最贪婪的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泪水,铺筑了日本走向富强的道路。

甲午战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新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甲午战败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洋务派那种只在工业企业上向西方学习无补于大局,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图存。

1895年5月初,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维新派领袖康有力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等在北京联合1300余名各省进京赶考的举人,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愿,要求废约拒和、迁都抗战、变法图强。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第五书中,痛陈“瓜分豆剖”的危急,把不变法就不能救亡图存的道理说得惊心动魄:“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不可得矣。”

维新派以变法自强为宗旨,在京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旋改《中外纪闻》),开资产阶级政治性质的结社办报之先声。各地学会、学堂、报馆、书局纷起林立,至1898年达300多所。这些学会报刊宣传爱国救亡,提倡西学,倡言民权,要求立宪,鼓吹变法,抨击封建专制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变法维新思想异常活跃,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维新派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醉心于拥立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资本

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由于操纵朝廷实权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自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起,维新变法只进行了103天。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下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处死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先后罢免或遣戍参与新政的官员数十人,除京师大学堂外,废除全部新政诏令。一切都由年迈的慈禧太后一人说了算!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

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全台人民异常震惊,聚哭于市。民众以台湾绅民的名义电奏清廷,文曰:“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固亦无负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之养人心,正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朝弃之?全台非澎湖可比,何至不能一战?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列祖,下对兆民也。”清廷置之不理。台湾人民“义不臣倭”,乃成立“台湾民主国”。民主国的宣言说:“照得日本欺凌中国,大肆要求,此次马关议款,于赔偿之外,复索台湾一岛。台民忠义,不肯俯首事仇,……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缔造二百余年,今是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以台湾议院名义发表的布告也说得非常清楚:“闻讯之日,绅民愤恨,哭声震天。……敢战之士,一呼百应,又有防军四万人,岂甘俯首事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湾唯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处理。……”

台湾民主国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可敬可佩的一页。自康熙收复台湾以后,台湾人民曾多次举行反清起义以反抗清政府的剥削和压迫。但当日本侵略台湾时,却誓死和清朝站在一起,毫不动摇。尽管当时满汉矛盾还很尖锐,但当欧美和日本来侵犯中国,当中国抵抗外来侵略时,台湾人和大陆人一样,站在清朝政府一边。不论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台湾人都和清朝政府站在一起,不分满汉,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一致对外。最典型的、最令人感动的是简大狮临刑时的一段话。简大狮是台湾北部抗日义军的首领,曾聚众万余人,反抗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失败后潜返漳州。清政府不但不表彰、不保护,反而应日本的要求加以逮捕,押往厦门准备移送台湾。在厦门,简大狮供曰:“我简大狮,系台湾清国之民。……曾聚众万人以与日人为难。然仇者皆系日人,并未毒及清人;故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则应目我为义民。……唯我一介小民,犹能聚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去年大势既败,逃窜至漳,犹是归化清朝,愿为子民。漳州道、府既为清朝官员,理应保护清朝百姓。然今事已至此,空言无补!惟望开恩,将予杖毙,生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犹感大德!千万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丧尽天良的清政府,还是把他交给日本人押回台湾处以绞刑,真令英雄死不瞑目!

历史向中华民族展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不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不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中国就不可能抵御外侮,实现独立和富强。于是有孙中山领导的以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

(责任编辑:仲文)

白话诗人徐志摩

●王凡西

徐志摩才活了36岁，一个颇有诗意的死法结束了他的生命。他乘坐的飞机触山起火，壮烈地火化了。

许多人不喜欢他的诗，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不喜欢的理由，多半嫌它堆砌，太做作，像是废弃了词调的词。可是，这不妨碍它独具的风格，优美的旋律，陶醉人的情趣。

《志摩的诗》由他自己编，自己印行，线装，青色封面，用上等宣纸，聚珍仿宋，十分精致。印得不多，主要是为了赠送友好。

记不清志摩回国后第一首发表的是什么诗，不过，他在二十年代初发表在小说月刊上的那篇《哀曼殊斐尔》，即使不是第一首，也该算最早的几首之一吧。

这篇缠绵悱恻的诗，确实轰动一时，至今我还能不费力地写出一段来：

我昨夜梦入幽谷，
见杜鹃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岗，
见一颗光明泪从天坠落。

这就是“志摩体”。

在二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划分如下壁垒：上海有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对峙，北京有语丝和现代评论社的抗争。当时，双方对立是相当尖锐的。徐志摩在私下里叹气：“为什么门户要分得这样清楚？”

志摩家相当有钱，父亲是个颇为俗气的商人，连信都写不通。他一心巴望儿子做官，好为他累积财富，志摩留学是私费，父亲出钱的条件是让他谈政治经济。

志摩最初去的是美国，学的是

他爸爸所希望的一科，后转入英国剑桥。也许是“康桥景色”吧，更可能是拜伦的余风，终于使志摩改了志，志在摩诃，做了诗人。

诗人，将他的诗集“献给爸爸”，可是他的爸爸毫不领情。爸爸的失望远不止此，儿子竟然和有钱有势的原配张氏离了婚，讨了个不谙家务只会花钱的陆小曼。志摩不挣钱，死摆阔，挥金如土。譬如那年探望在意大利生病的泰戈尔，他横跨西伯利亚，又便道游览了巴黎。

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他在中国讲学，志摩总是陪同。泰戈尔是唯心论者，“不抵抗”诗人，当时国共两党对他的讲学发动了抗议。每到一处，都有人散发传单、写文章，叫泰戈尔回去。

其实，那时革命党人对这位诗人了解太片面了，他确是唯心论者，但非不抵抗的，印度年青一辈受过他的感召，中国抗日战争中，老诗人还寄来了同情信。

志摩治学不太认真，读书不求甚解，凭他的聪明，写作靠灵感，疏懒、冲动。他在北京大学讲英国维多利亚朝的诗并不成功。他教书像诵诗，随心所欲，象征地，不可捉摸地，时时说些不甚联系的概念，慕名去听课的学生很少不失望的。

他却是个好翻译，原作的神韵，他能用中文再创造出来，像是自己的文章，十分流畅。

志摩是诗人，可他的散文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句子长，句法带欧化，但灵活地配进了中国的、特别是北京的口语，非常美。志摩的散文和



鲁迅恰好是两极，一个是奔放，生动，绮丽；另一个是谨严、细密、深刻。前者诉之于感情，后者侧重在说理。

志摩是个资产阶级诗人，这是他生息时代决定了的。他对工人阶级没有明显敌对，有时还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有一次，驻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举行什么会，志摩去了。阳光中，一面鲜红的旗伴着宏伟的歌，升上了旗杆，人们的神情肃穆，眼睛里发射出神圣的光，在这中间，志摩看见了力，看见了虔诚，看见了不可克服的意志，看见了能摧折一切的理想。他感动，他落泪。

又一次，他到莫斯科，专诚去晋谒红场上的列宁墓。他看到了更大的力，更深的虔诚，更坚决的意志，更崇高的理想。

那回，他更感动了，礼赞了斯拉夫夫人无比的魄力。

志摩跟大多数近代中国的名人一样，不管他们宣扬什么主义和思想，而骨子里却还是个民族主义者。今天中国的场面实在是伟大，无论你反对或怀疑，您总无法不看见一头雄伟的狮子，睡眠惺忪，欠伸而起，对着东方的朝阳，引颈而吼，甚致张牙舞爪了！

(王凡西，93岁，学者，徐志摩同学，现旅居英国伦敦)
(责任编辑：刘文)

1930年春,中央任命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这位黄埔一期生以卓越的指挥才能,仅仅几个月,就把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了一大片,中央在给他的信中,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并把鄂豫皖苏区划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就其面积(25个县)和人口(250万人)来说,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

许继慎执行中央的指示,总是雷厉风行。金秋九月,左倾盲动主义者对鄂豫皖红军,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按照这一指示,许继慎率红一军沿京汉铁路,先袭击湖北的广水县,未克,随即越武胜关直取信阳城。

信阳,古称义阳,春秋时为中国,北宋太平兴国元年改为信阳。这里,是连接武汉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敌人的情况,许继慎是了解的,但为了攻占信阳,完成攻占中心城市任务,只有孤注一掷。

那天,他乘夜色指挥部队楔入了信阳火车站。如注的弹雨,打得墙壁、车皮、铁轨火星四溅。在熊熊的火光中,经过激烈的争夺,才占领了车站。翌日拂晓,城内守敌仗仗坚固的城壕,负隅顽抗。至中午,红军数次进攻均未能越城池一步,部队反而暴露于敌人的火力圈内。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眼看攻城无望,许继慎下令撤兵。

两次战斗的失利,使红一军将士们的情绪十分沮丧。敌我力量的悬殊,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搞得他们无所适从。一些干部战士当着许继慎的面说:“连广水、信阳都攻不下,哪还有力量去打武汉啊?是谁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让他去试试!”

战斗的失利使许继慎清醒地认识到,红军远离根据地,无群众支援,无后方供应,如果继续在铁路沿线作战,势必造成被动。他率部返回根据地,每到一地,即宣传党的政治

主张和土地革命纲领,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还乘势建立了正(阳)汝(阳)游击队,罗山、光山地方武装。革命的势力扩大到了豫东、皖北等地。

鄂豫皖红军力量在许继慎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壮大,苏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鄂豫皖红军的战斗力,使国民党政府十分惊恐。蒋介石派出数十万兵力,于11月上旬开赴鄂豫皖,对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围剿”。

关键时刻,中央派来曾中生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身体消瘦,说话直率热情,两人一见如故。

自从有了曾中生相助,许继慎马不停蹄,带领红军驰骋于数百里的大别山区。一会儿从东转到西,一会儿从南麓跳到北麓。他根据自己总结出的“赚钱就干,赔本不来”的作战经验,在鄂东北根据地,于黄陂、新洲、黄安、黄冈、麻城一带痛击敌军,以后又迂回豫东南、皖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等形式,解放了商城、金家寨、麻埠、独山、叶家集、苏家埠、六安等地,歼灭了大量“围剿”的敌军。特别是香火岭一战,歼敌三个整团,共毙俘敌3000余人。

1931年1月15日,活动在蕲(春)、黄(梅)、广(济)的红十五军在蔡申熙的率领下,来到豫东南根据地,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与红一军会师。根据中央的指示,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加强领导,中央派来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许继慎改任第十一师师长。

1931年,王明的党中央为了推行一整套“左”倾政策。派出了张国焘来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鄂豫皖军委主席。中央分局一成立,张国焘为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极力推行“左”倾新政策,大搞宗派主义,对待不同意见者,实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形成了日益尖锐的斗争。

5月,张国焘来到金家寨,见到许继慎,许认为他是党的元老,有理



论有水平有威望,耿直的许继慎把自己对建设军队和根据地的意见、建议,一古脑儿地向张国焘倾吐出来。

许继慎坦率地说:“有的领导一意巩固苏区,满足现状,我认为这比较保守,应该抓住一些有利时机向外扩大和发展。根据地毕竟就这么大块地方,人力物力是有限的,假如敌人再大规模进攻,我们就没多少回旋余地了。”

许继慎又说:“沈(沈泽民,中央分局委员)委员来皖西后,到处指责苏区党和红军这不对那不该,对许多有功的干部,不问青红皂白,只凭印象,打击较多,还说我们执行的是‘左’倾教条主义,现在是革命力量的发展时期,只有团结更多的人,我

们才有实力对付敌人的进攻。请张主席一定要协调好这些事情。”

对于这些忠诚、坦率的意见，张国焘作为党的负责人，本应认真听取，深入研究，但他采取了两面派做法。当着许继慎的面，他说：

“嗯，很好！我从鄂东北过来时已经看到了，皖西一带买卖兴旺，粮食充足，苏维埃建设和红军建设都很有成绩，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嘛！我也早就听说了，原特委和红四军负

皖苏区历史上有名的一次军事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红四军行动方针。

张国焘坐在一张雕花老式木椅上，面孔有些泛黄，他正患痢疾，带病工作。他慢吞吞地讲了一通国内外时局和鄂豫皖苏区面临的形势之后，语气陡然升高：

“现在，江西苏区正反第三次‘围剿’，我们要把支援他们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用进攻和威胁大城市、调动敌人的军队，以减轻他们的压力。所以，我决定四军先打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进入安庆，打下安庆后再继续东进，围困威逼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6月28日，中央分局在新集召开扩大会议时，张国焘又说出了这个主张。

曾中生首先发表了反对意见。紧接着，许继慎站了起来，粗门大嗓道：“我觉得，你说的计划是冒险主义的，那样做，四军必然要吃亏，根据敌人兵力分布和我军后勤供应，我的意见还是南下，先打英山，再去蕲（春）、黄（梅）、广（济），威胁长江，策应江西。这样，可以使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蕲、黄、广去，请张主席再认真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嗯？考虑我们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么？”张国焘对许继慎已经没有了好感，瞥了一眼曾中生，邓继勋和许继慎、徐向前，担心又出现上次会议的情景，赶紧先发制人，大声道：“就这样定了，四军一个月内完成这个任务！”

这是命令，代表党的命令；这也

是尊严，一个250万人口的苏区领袖的神圣尊严。你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

于是，许继慎同曾中生、徐向前等军事领导人被迫奉命东进。

红四军聚集了十、十一、十二师6个团共1万余人的兵力，在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的带领下，于7月28日从商城南部的新集出发，冒酷暑翻越连绵不断的大别山北麓，往南长途行军，过斑竹园、吴家店，直取英山城。

7月30日夜，部队到达英山城外，连夜作好了战斗准备。激战一天，傍晚就结束了战斗。全歼守敌一个团，并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军需仓库。

炎天酷暑，限制了人的活动。占领英山城后，部队休息了两天。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余笃三、周维炯、刘英等军事领导人乘这机会在一起开了个会，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研究决定：改变张国焘决定的行动方案。向南进击。从实际情况分析，这的确是一个明智之举。对于这个行动，徐向前元帅回忆说：

根据张国焘的决定，打下英山后要东出潜太，攻打安庆，威胁南京。对此，大家本来就想不通。在英山，我们认真分析了当时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觉得东进确实没有把握。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400多里白区，沿途有敌两个多旅把守，我们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我们3个师才5(6)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住英山守后方，东进只有4(5)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守，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之地呢？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一骑半爪知道点，也是题图照片：红一军战士(左)、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驻地——新集



贵人都很重视你的意见，这与你的能力和功绩分不开的，对鄂豫皖根据地军事上你有很大贡献，你要再接再厉。至于沈泽民嘛，他过去是个作家，书生气十足，对皖西苏区的要求是有些操之过急，对同志过于严厉，这应该改正，不过，他的本意你们也应该理解，为了工作嘛！他也是一个很能干的领导人。”

可是第二天，张国焘却对另一位领导干部说：“许继慎是一位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昨天他向我提了不少意见嘛，有些我不敢苟同，他那种说法，目中无人，有军阀主义倾向，我们要注意，我不会任其发展的。”

7月上旬，在商城县余家集，张国焘在一家祠堂里主持召开了鄂豫



▲红一军军长许继慎

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不可靠。……如果南下赣、黄、广地区，则有利得多。那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离英山又近，才200里路程，敌人兵力也空虚。

因此，在商量利弊之后，出于对红军对革命负责的考虑，军部最后决定乘势进据赣、黄、广，并将这一行动报告了中央分局。

8月19日，他们占领广济，又克黄梅，捷报频传。部队一面打仗，一面打土豪，没收官府财产，开仓分粮，开展党、苏维埃和群众工作。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红四军就歼敌7个多团，震动了九江、武汉，并牵制了敌军，声援了江西中央苏区。同时，还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蕲、黄、太大片根据地。而且这一带比较富庶，红四军的这次行动，除了大量的粮食、武器等军需物资外，仅收缴的黄金就有20余斤，银子1800余斤，大洋7万元，使部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保障。那20斤黄金，曾中生、徐向前根据许继慎的建议，派人直接送交到上海，以提供党中央作为工作经费之用。

红四军的胜利，本该表彰宣传，

事实已经证明和教育了当初的反对者。然而张国焘却不考虑你胜利不胜利，违背了他的意志，就是对他权力的侵犯，他连续写信到前线，指责红四军领导人擅自改变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并强令部队返回新集。

鉴于同张国焘斗争的严重发展，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申明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可是，考虑到中央分局的一再强令，红四军被

迫回返。

北返途中，性格刚直、眼中揉不得沙子的许继慎，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一直有火，积极提议召开干部会议，明辨是非。他胀红着脸，对曾中生说：“大路不平众人踩，全军干部都是这个意见，看他张国焘怎么办！”

曾中生、徐向前也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下，不然就这么到了新集，依然难以交代。

9月4日，部队行至英山县鸡鸣河驻扎了下来。红四军召开了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活动分子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行动和讨论张国焘的来信。

那天上午，在鸡鸣河镇西的一幢逃亡地主的宅院里，红四军政委曾中生主持了这次会议。

曾中生首先念了一通张国焘的两封信，对红四军南下以来的行动和战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表示激愤。接着，让大家发言。

身材魁梧的许继慎首先站了起来：

“张国焘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一来鄂豫皖我就感到不对劲。我们

费尽心血统一鄂豫皖苏区和红军队伍，接着以曾中生同志为主的鄂豫皖特委领导苏区军民又开创了这么大地盘，建立了几乎是百战百胜的红四军，他不但不肯定，反而硬说我们这不是那不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打败那么多国民党反动派？如果是路线错了，红军能得到这么大的发展？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再说，我们这次南下行动，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当初我力主南下，现在我更认为应该南下，事实是明摆着的。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我表示坚决反对！”

……

真是出乎意料。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周维炯、姜镜堂等将领和广大干部们，并不怕张国焘的压力，群情激愤，争相发言。这些久经战斗考验的指战员，对南下与东进的是与非，个个都非常明了。革命队伍的优良作风，锻炼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坦荡直言的性格。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张国焘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特别是许继慎、周维炯等人，更是慷慨激昂，直接驳斥张国焘的错误，并勇于坚持正义，勇于承担责任。

会议讨论到最后，干部们一致表示给中央分局和张国焘写一份反驳的申明书。《申明书》由曾中生起草，同时另抄了一份报中央军委。详细陈述了红四军连以上干部的共同意见。许继慎带头在《申明书》上签名，那“许继慎”三个字，足足占有5个人签名的地方，可见他一腔激愤。

红四军在鸡鸣河召开会议的消息传到新集后，张国焘火了。他宣称鸡鸣河会议是红四军中“改组派”的反党会议。刘士奇携《申明书》随行军部队先期到达新集，向张国焘当面汇报的当天，张国焘就火冒三丈地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

两张合并一起的宽大的红漆方桌旁边，围坐着10余位党和军事高

级干部。分局会议室内，充溢着紧张的气氛。会议错误地决定撤销了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并决定了开展“肃反”工作。

会后，张国焘当即派陈昌浩作为全权代表，乘“列宁号”飞机赶到麻埠，接任红四军政委一职，并授意陈昌浩相机处理许继慎。

同时，张国焘还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通告，说“严厉镇压反动派是党在目前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求红军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

陈昌浩一到麻埠，就奉命开始红四军中进行“肃反”。当天晚上，就逮捕了平日同许继慎比较亲密的几个团干部。

许继慎更避免不了这场厄难。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县余子店，他便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

张国焘称他掌握了许继慎详实的“反党依据”。

原来，早在8月初，红四军收复英山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和许继慎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遣特务任廉洁和钟梅桥带他的亲笔信到黄山找许继慎，妄图进行拉拢。许继慎是个有着坚如磐石革命信念的战士，两个特务找到师部后，许继慎接过信一看，勃然大怒道：“这不是要我与敌人勾结，倒戈投蒋么？策反竟策到我头上了。来人！”许继慎拍了下桌子喊来卫兵，“将他们捆起来，连同这封信一起送交军部。”

曾中生和徐向前也是了解许继慎的。

许继慎是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多少有点田地的中农家庭。父亲一生勤劳，才积攒点财产，因之多少能供他上学。“五四”运动后，他在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思想激进，社会活动十分活跃，于1921年4月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推选为学

生总会常委兼联络部长，是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正因如此，他被反动军阀通缉，被迫离开安徽，赴上海考入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春，他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参加第一期学习。在那里，他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坚分子，因此，周恩来担任中央两广区委军委负责人时，根据两广区委的决定，他由团转党，与陈赓两人同任黄埔军校支部委员会候补干事。北伐时期，党派他到叶挺独立团任营长，屡建战功，后任团长，在保卫武汉，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中，发挥了优秀的指挥才能。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他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负了伤，被党中央召回上海，一边治疗，一边在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3月被派来鄂豫皖苏区，担任红一军军长职务，为统一红军、建设红军和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经历了严峻考验的红军优秀将领，怎么会突然间与敌人勾结呢？

曾中生、徐向前很慎重，严肃地审问了蒋介石口谕曾扩情派来的这两个特务，知道是敌人的离间计后，遂决定送中央分局处理，并说明了他们的意见：许继慎个人英雄主义是有点，但倒戈投蒋是绝对不会的事。

可张国焘不顾事实，找到了这个借口十分高兴：“嗯！我说许继慎为啥拼命反对东进，原来有此因素，危险哟！他们一定有一个阴谋组织。”

其实，对于这样的信，张国焘不是不明白，国民党将领刘峙也曾给他送过同样内容的一封信。

不几天，在彭杨军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数百干部，张国焘别有用心地栽赃陷害道：“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组织了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9人，主席是许继慎，他们决定9月15日在武穴暴动，幸亏被我们破获了。”

10月6日，张国焘命刚返回新集的红四军和红七十三师团以上干部，到光山县的泼皮河开了个会，本意斗争曾中生、许继慎，却因干部们不积极表态而没有达到目的。于是，8日上午，张国焘骑着马，带着一排保卫人员，从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坐镇，主持军内“大肃反”。

屠杀之前，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还想最后做做许继慎等人的拉拢工作，只要他们听命于他的家长制，在会上认个错，他暂不想看到他们的血迹。

他让人把许继慎带了来：“同志们没给你苦吃吧？快坐快坐！”

一见面，张国焘挤出笑脸，假装关心地双手扶着许继慎的肩膀。

“如果我确实犯了错误，就是吃苦也应该！”

许继慎依然是那种磊落、坦荡的硬汉子性格，宁死不会拐弯。

“你这个人呀！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可党的决定无论如何是要服从的嘛！你不该在南下路线上固执己见嘛！你已经有了‘第三党’的嫌疑，你那样，人家能不怀疑你拼命南下为了啥？”

“那能为啥？为了红军，为了打敌人呗！我是个带兵的，总想打胜仗，不打败仗呗！”

许继慎一直昂首挺胸地站着，涨红着脸，两眼望着窗外。

“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合作得好么？我来鄂豫皖后，你一直跟我过不去，我们都是做党的工作嘛！我素来喜爱战将，你还是承认自己是第三党，交代你的组织，考虑一下如何立功赎罪为好，你说呢？”

“我没罪。我不是第三党。我没有啥交代的。四军行动路线上，明明是你错了，可你硬让我们东进，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送死？”

无畏强硬的口气，正义直率的语言，吓得张国焘心里发寒。他知道拉拢不过来了，同曾中生一样，不会向他认输的，便甩起杀手锏，一反温



▲赤卫队员在红一军扩军时留影(左)许继慎率红一军在双桥镇大捷中活捉敌34师师长岳维峻。此是红军战士的漫画。(右)

和的态度，怒声道：“那你为什么伙同他人搞一个组织？有什么目的？是不是想投靠国民党？是不是想反革命？有人供出你是第三党，你要如实向党交代！”

“那是有人陷害！对党对革命我问心无愧，从没有反革命行为，我要想反水，何等今日？”许继慎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告诉你，我们掌握了可靠的证据，中央也来信表过态。”张国焘怒冲冲地走了。

不欢的会面，更为许继慎的厄运下了注脚。

第二天傍晚，夕阳西下，河风习习，初冬的西北风，带着一股寒气，吹得人直打冷战。张国焘吃过晚饭，骑着马到白露河滩上散步。他再次让人带来许继慎。

他下了马，背着手慢慢踱到一片树林中，转身对许继慎说：“你是一个立有战功的人，党还是爱惜同志的嘛！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只要承认是第三党，分局还会重新考虑处置问题的。”

“不是就不是，让我凭空承认？不可能！我本来对你是很尊敬的，没

想到你是这种卑鄙小人！”许继慎已是怒火满腔了。

张国焘听了这话，倒没生气，阴冷地一笑，眯着眼睛看看许继慎，朝几个跟过来的保卫局人员示意一下，便背过身踱着方步远去，假装欣赏哗哗流淌的大河及树林上空的晚霞。

几个战士掂着马鞭，被迫对许继慎狠狠地抽打。

一位目睹此情此景的红军班长，悲愤地记下了这个场面：

渭家河（白露河）水流湍急，冲击着平浅的河滩。河滩上却出现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许继慎同志被捆在那里，遭受鞭打。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血流满面，皮开肉绽。为什么要打我们的老军长呢？他是打了败仗，还是违抗了军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应该军法从事，也不兴这么毒打呀……

翌日上午，天高云淡。田野里，农民们在自由自在犁田耕地，准备播种小麦。附近村庄，听得到一阵阵战士训练的喊操声。看去整个苏区十分祥和、安定。

而白雀园镇内，在张国焘主持

下，临时革命法庭正在火神庙召开“公审”大会。

会场很简单，两张方桌、几把椅子放在大厅上方。四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参加“公审”的，是各师团连以上代表。戒备森严的会场，也允许一些群众进来观看，以示公允。

许继慎头扎绷带，浑身血迹斑斑。灰土布军装被撕得一条条的挂在身上。他被两名战士用担架抬进会场。与他同时被带来的，还有十一师师长周维炯，其遭遇同许继慎一样。

大会开始后，张国焘当众宣布了许继慎、周维炯组织反革命9人委员会，企图暴动投敌和参加“第三党”、“改组派”等“罪状”，喝令许继慎交代。

许继慎怒火中烧，忍着巨痛，极力从担架上坐起来，两眼冒火地逼视着张国焘，大声说：“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许继慎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几十次大的战斗，大都取得胜利；在艰苦环境中，用鲜血和全部精力投入红一军建设中，统一和巩固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

于党、忠于革命的，苏区军民有目共睹。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作出公证结论的，你张国焘是代表不了党的！”

这些话，如地下冒出的那股清泉，清清凉凉，句句是实，字字在理。在场人无不暗自叹息。尽管在此之前，张国焘授意一些人，在中央分局机关报《列宁报》上发表了批判许继慎的文章，在墙壁上书写：“打倒第三党分子许继慎”等标语，制造舆论，但人们的心里是明白的。张国焘也感觉如此审问下去，不但问不出个名堂，还让人怀疑他的所谓“证据”，了解了个中奥秘，便赶紧敷衍几句，宣布将许继慎、周维炯以反革命罪逮捕。“公审”大会草草收场。

几天后，张国焘回到新集。他一直放不下心，遂令人将许继慎、周维炯等4名“罪犯”秘密移往新集。

为防其部下闹事，许继慎等人被捆在担架上抬着，上面盖着白布单子。几个战士发现后，有所怀疑，追上来问：“抬的什么人？抬哪儿

去？”

保卫局干部应付着说：“病号，抬到新集治病的。”

慑于许继慎、周维炯在红四军中的影响，张国焘不敢公开杀害他们。但这眼中钉、肉中刺，不予拔除，他浑身不自在。抬到新集还没三天，便迫不及待地令人将他们秘密勒死在保卫局禁闭室内。尸体被连夜抬到紧靠新集的西大山的一个山洼里埋掉了。

一个战功卓著、名扬鄂豫皖苏区，敌人曾重金悬赏而不得的红军将领，就这么命归黄泉。

1942年，陈毅元帅在延安时，对徐向前元帅说：“我在新四军的时候，有次与国民党谈判，特务冷欣对我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

1945年，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央为许继慎平反昭雪，把他的名字写在《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一册的第一名。

1972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上讲话时，带着深厚感情说：“鄂豫皖张国焘他们去了，曾钟圣（中生）、许继慎同志也就被批为路线错误，后被诬为敌人而被杀害了。许继慎当时就被杀害了。说他是‘改组派’‘第三党’，主要是‘第三党’。许继慎这个同志我了解，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与他有很大关系。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

1981年，中共六安县委为许继慎烈士建墓立碑。徐向前元帅知道后，亲自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同志之墓”的碑文。

1983年，中央特把许继慎功绩的文字图片调进毛主席纪念堂，以长期留展。

1989年，中央军委把许继慎同志定为中国革命史上33位军事家之一。

（责任编辑：仲文）

左倾盲动的飞行集会

丁

左倾盲动主义可笑可悲，作者是身受的。那时我们在上海的工作便是占领马路。起初是大马路，即是英租界的南京路，凡可调动的工人和一般同志，三三两两地散立在马路两侧，时间一到，就散传单，喊口号演说。过不多时，人高马大的大批巡捕坐车到来了，动手捉人，最积极最勇敢的人最先被捉，一个英国三道头用手卡住了我的后颈，我跌倒在地，几个工人同志从后袭击他，等我爬起，他们已打到几丈远。年青女工最勇敢，那时都留着发辮，被捕时给包打探一手拉住两个辮子，两手四个，捉进捕房去，大多判六个月监禁。示威次数越多，参加人数越少，地点也逐渐改变，最后只在北四川路短短一段路面举行，只要有一个人被捉，其他就悄然散去，那时接触的省委区委时时换人，他们大都已关在监狱里，所以领导也越来越薄弱，等于把革命者送给敌人去监禁。

中国现行哀乐的由来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将著名红军将领刘志丹的灵柩移葬他家乡陕西保安，并组织延安鲁艺音乐家马可、安波、张鲁、刘炽、关鹤童五人编写移灵乐曲。他们将一支民曲略加修改，放慢演奏速度，便成了今天一直沿用的哀乐。

（宁可）

瞿秋白英勇就义 30 多年后,竟因为他的一篇遗言《多余的话》,在文革中被“揪出打倒”,甚至砸碑掘墓。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恢复名誉。但《多余的话》仍然是个“谜”。虽然今天人们不再说它是什么“叛徒自白书”了,但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这至少是瞿秋白的一个污点,甚至是一个严重的污点罢?……至于《多余的话》本身究竟是什么意思?瞿秋白又为着什么目的而写?这桩近 60 年的谜案,我们请这位瞿秋白研究者来进行一次破译

他是在肯定自己

初读《多余的话》,总让人感到低沉的情绪比比皆是:“留恋文学”、

……”并且态度鲜明地肯定:“……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加着重号的这段话

那些确乎是“厌倦政治”、“否定一切”的话,究竟又指什么呢?很清楚,瞿秋白主要指的是 1931 年 1 月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最后这四年。

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多余

●林 勃

“厌倦政治”……简直自己全盘否定了自己!

然而,只要认真读下去,就不难发现,一涉及具体事实,瞿秋白不仅毫无否定自己的意思,某些地方反倒颇有自我辩解的成份了!譬如,他首先承认:“在 1928 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路线了。”且明确表示:“这时期当然我应为负主要的责任。”但他不仅并未因此否定自己,而且反驳了当时对这个时期笼统否定的错误看法,如“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

——显然是指 1927 年八七会议初期——虽仅仅一句,却包含有以下重要意思:一、八七会议初期,我党政策的主流是正确的。二、这一成绩是在党的集体领导之下取得的。三、并不排除与此同时也犯有个别错误或错误苗头。等等。这段话措词准确、认识全面,其中也明显包含着对自己工作的肯定。

总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回顾自己一生每一具体问题上的具体说法,都和上述例子情形类似,决无任何否定一切、自污自贬、强烈自责等意思。可以说是基本肯定了自己的一生。

他是在作最后的斗争

既然如此,那么《多余的话》中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一九三一年初……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地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了,大概

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了罢。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

这些话相当蹊跷：说是“留恋文学”，这里却一字不提文学；强调“厌倦政治”，这里却专谈政治；本来就连四个月的盲动主义也有个清楚分析，决不盲目否定。这里却将整整四年——其前三年还正是他生平文学

自然，这也就是“谜底”之所在。

他是为了揭露 中国的“祸害”

揭开了“谜底”，难点也就迎刃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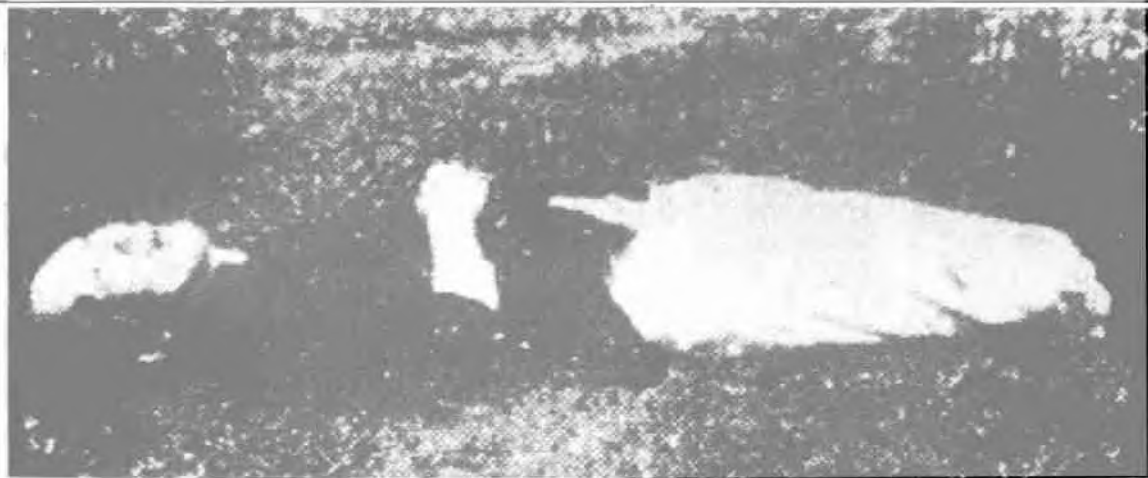
譬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竟将自己痛斥为“叛徒”、或“叛徒的一种”，这究竟如何解释呢？

“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

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一类措辞，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奇怪”的是：整个《多余的话》竟没有一句话是公开地直接批评王明中央和王明路线的。甚至，这篇相当完整地回顾和总结自己一生的文章，却恰恰缺少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来这最后四年！也就是说，你想坚持看具体事实，真到关键处，它干脆空白，一句没有！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很简单，他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汀州就义

活动的主要时期——一古脑全否定了！

那么，他究竟在否定与谴责自己最后四年的是什么问题、什么错误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没有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

二、是违心地否定自己；

三、是错误地屈从了王明路线。

这固然确实只是自我谴责，但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否定对自己的否定，实际就是对自己重新肯定。

这就是瞿秋白《多余的话》强调指出的他“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

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

什么叫“结束了政治生活”？什么时候“结束了政治生活”？瞿秋白下面这段话，就是清楚的说明：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

显然，瞿秋白正是将最后四年没有“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看作是结束了“政治生活”或“政治生命”，从而将自己谴责为“叛徒的一种”的。这和前面提到的——由于没有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就将自己痛斥为“十足的市侩”，“最坏

不能在敌人狱中反对自己的中央，所以，《多余的话》中所有对王明中央和王明路线的尖锐的批评，全部是通过自我否定和自我谴责的曲折形式来间接表达的。他只能谈谈过去，谈谈自己，一切都到自己为止，至多到“瞿秋白主义——的逻辑发展”——立三路线为止。但是，我们知道，在立三路线问题上，米夫、王明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和瞿秋白同志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基本处于一种对立的观点，所以，瞿秋白无论怎么谈立三路线，都不可能不涉及王明路线的是非。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瞿秋白“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这句话，一语就打中了王明路线的要害。在共产国际工作两年，并和米夫、王明进



幼年的瞿秋白和他的父亲瞿稚彬、母亲金衡玉

行过长期斗争的瞿秋白内心当然一清二楚；如果说立三路线已然是照搬苏联教条和苏联经验的话，那么王明路线就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它干脆连牌子也一起搬过来，自称为“国际路线”了；所谓“国际路线”，才是当时王明路线的原名。瞿秋白采用“的确没有认出”“根本不同”等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王明路线实质上 and 立三路线一样犯着性质相同的弊病！

第二，在反倾向斗争这个当时党内路线是非的重大问题上，《多余的话》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六大决议案》在反倾向斗争这个问题上的提法是“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这和王明所谓国际路线的“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等提法恰恰针锋相对。

第三，再如王明抄袭斯大林关

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理论分析，夸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而造成了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的过分估量。瞿秋白就将“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作为自己认识上的错误来批评。

第四，王明所标榜的“国际路线”把苏联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责令中国革命也要按照这套公式进行——“准备大工业城市的武装起义”以“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瞿秋白则将“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个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也已经潜伏着或有所表示”作为错误来检查。

所以，《多余的话》虽然婉转曲折，但它确实揭露并批评了王明路线的严重问题，甚至将王明路线痛斥为中国革命的“祸害”。

“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

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这期间，是指瞿秋白“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那段时间，即六届四中全会以前，“从1925年到1931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最后三年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的那个“期间”。既然这样，那事关“历史功罪”的“后来”，不是指王明路线时期是什么！“祸害”——不是指王明路线是什么！此文恰恰写于由于王明路线、中国革命又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这决不可能是“偶然”为之。

陆定一说得对：他“心忧”的是什么呢？

那时，红军正在长征，还没有安定下来。蒋介石调集所有兵力，要消灭红军。敌众我寡，随时有被消灭或打散的危险。如果王明路线的统治继续存在，革命的失败就不可避免。这就是他“心忧”的所在。

显然，这也就是《多余的话》的

写作目的和中心主旨。

他用了魔术家的扇子

从《多余的话》那曲折隐晦、形同迷宫的文字中,切实把握了揭露王明路线这一中心主旨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这篇文章,就会有境界一新的感觉:

首先,题目“多余的话”不正是掩盖内容中“紧要的话”的吗!文章开头引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诗句,不正是启示同志理解自己“心忧”之所在,告诫同志切莫误入迷宫的重要暗语吗!

二、由于瞿秋白身处狱中,他只能通过谴责与否定自己和分析总结立三路线以前中央路线问题上的是非得失来间接揭露王明路线这一“祸害”。所以《多余的话》出现许多过头的自责与难解的暗语,需要一具体分析,才能把握其真意。

三、既然是揭露王明路线这十万火急的重大内容,故动笔之初作者就考虑了通过敌伪报刊公开发表去与同志见面的问题,作者亲手将《多余的话》交给来访记者,并两次要求代为发表,就是确证。因此,《多余的话》不仅没有任何可能触痛敌人的尖锐词句,并特意采用了“最后谈天”、“死前忏悔”之类的形式以便使敌人感到有点宣传之利的油水可捞……。所以整篇文章呈现出一种“低调”格局。

四、为了上述重大目标,作者几乎使出了自己文学修炼上的浑身解数,极力在开头、结尾加暗语、标题和关键词语上加引号,真假上捉迷藏,内容上绕圈子等办法,来极力掩护,又准确表达自己这篇最后遗言中揭露王明路线的中心主旨!

国外一位学者也有所觉察,他写道:“这是瞿秋白一篇令人惊异的文章;话既属‘多余’,又何必要说?话既说出了,那就不会是‘多余’。而

话说出来了之后还认为‘多余’,即岂不是说明,作者在当时也是晓得了,说了那样的话是不应该的吗!然而终于忍不住把明知不应当说的话也说了出来,则所谓‘多余’只是魔术家手里的一把扇子罢了。”

他真诚地做了“自我解剖”

自然,瞿秋白同时也深刻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与责任。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主要错误不仅是“早就埋伏了”王明路线这个后来的“祸害”;而且在这一“祸害”为害全党整整四年期间,他个人不但没有“为党的正确路线”与之“奋斗”,反而对其违心屈从、随波逐流,成了“十足的市侩”!……

首先,所谓“早就埋伏”从道理上讲,自然是指他的盲动主义是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发轫和开端,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自然也是王明路线这一“祸害”的最早由来。

其二,尽管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米夫、王明拉共产国际之旗做虎皮,一时间几乎镇唬了全党,但对六大以来一直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瞿秋白来说,则可谓知根知底,并无多少“神秘”可言。因为,当时他就团结与领导中共在莫斯科的党员不止一次粉碎过米夫、王明的阴谋发难,并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过撤换米夫中山大学校长职务的严正要求,直到1930年11月25日《政治局关于最近来信的决议》中,以瞿秋白为首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央,仍坚持批评了王明等人“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的严重错误。但是,从1931年1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华操纵六届四中全会、扶植王明宗派上台以后,瞿秋白见大势已去,态度就确实转变。在六四全会上,他不仅就“调和主义”作了检查,而且在1931年1月先后两个“声明”中,一再就王明中央对他的申斥,表示“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六四全会决议案的全部,是完完全

▽本文作者和瞿秋白的女儿独伊



全的拥护”。即使王明中央加予他任何莫须有的罪名，他也“尽量检讨，再也不敢有任何反抗了”。别的不说，仅就——六四全会上王明宗派正是通过批调和主义，打倒以瞿秋白为首的六三全会的中央，才得以夺权上台为害四年的！——这一点来说，瞿秋白就无可推卸地负有第一位的责任！因此，瞿秋白的上述检讨不是仅是真诚的，也是属实的。

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旧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至于政治方面，则明显留下了一个空白。瞿秋白的上述检讨，就算是对这个空白的一个坦诚的补充罢。

他留下了
靠得住的手迹

《多余的话》至今还没有找到瞿秋白的亲笔手迹……如上的“研究”、“论述”……靠得住吗？

靠得住的。

首先,《多余的话》的确凿存在并无疑义;它的亲笔原件,也先后有多人见过。尽管现存的敌伪抄件,不能完全排除没有任何讹误或篡改;但我们仍然不难证实《多余的话》就

是这样的写作目的和中心主旨。因为还有瞿秋白的另一亲笔手迹可以作为确证。

这就是《瞿秋白致郭沫若信》。

此信同样强调：使他“惭愧”不安的是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并将这一错误置于坐牢杀头个人生死之上的重要位置，作为“历史功罪”的大事……

《致郭沫若信》短短二百多字引文，简直就是《多余的话》那两万余言的准确缩影！

此信就写在《多余的话》完成之后的第六天——“一九三五、五、八”，同样写于“汀州狱中”；不仅和写《多余的话》是同一条件、同一时间，而且是同一内容、同一目的，就郭沫若与党的关系而言，还是同一对象！这不仅和《多余的话》是一样的中心主旨，一样的曲折手法，而且一样地采用重于个人生死和事关历史功罪来强调自己揭露王明路线的中心主旨！这许多“同一”和“一样”充分证明：我们给《多余的话》所做的结论，不仅符合《多余的话》原文是正确的，而且符合瞿秋白《致郭沫若信》、符合客观事实，是真实可靠的。况且，他在这封信中也明确暗示：“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大量

披露出来”，即暗示他在《多余的话》中大量披露了这封信里所强调的揭露王明路线的中心主旨呢！

这是瞿秋白同志亲笔手迹的确凿事实，是无可置辩的铁证！

为此,揭露王明路线——不仅应作为《多余的话》的中心主旨和写作目的确定下来,而且也应当作为瞿秋白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事实或历史行为而确定下来。

瞿秋白能够如此清醒地披露隐患，评断自己，预见未来，并正确坚信这个“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当死，则毅然赴死！该做，则死也要作！的确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耿耿赤诚和英雄气概！

瞿秋白烈士就义以来，中央曾多次了解他被捕以后的这段历史，党史工作者也曾先后写过一些文章，介绍他被捕以后的英勇斗争，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力争获释、粉碎劝降、英勇就义——十二个字。

其中就是《多余的话》有些疙瘩、矛盾。难以理解。现在这个疑团冰释，只要再加四个字，——力争获释、揭露隐患、粉碎劝降、英勇就义——就不仅事实清楚，道理也明白了。

（责任编辑：刘家驹）

胡作秋與周恩來於十五年1.在
他生前，許多人不要到他的家或
看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
是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
的年月裏，堅持了英確的獨立
立場，領導的創子手的屠刀光
亮，不顧威服。他的這種為人民
的方針，這種臨難不屈的
意志和他為革命中保存下來
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化
去。胡作秋同志是有用的。想
問題的，他是有意識的。他的
遺著和出版，將有益於青
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
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



这位瞿秋白的战友，给我们找到了“钥匙”

《多余的话》的历史真实

●陆立之

从《诗经·黍离》说起。

中国古代的西周末年，周幽王姬宫涅这个昏君度过了11年的荒淫生活，结束了西周王朝。周平王宜臼东迁洛阳，周朝就式微了。《诗经·王风·黍离》以比兴手法记叙了这段故事。

《黍离》以种庄稼比喻政治上的忧患。原诗意译是：

那沉甸甸的谷子、粟子吐露黑黝黝的苗苗，

我徘徊其间觉得心神摇摇；

知我者，说我心忧宗庙被颠覆，

不知我者，以为我有所求。

遥远的苍天呀，

这是些什么人啊！

那垂垂的谷子、粟子绽放出秀穗，

我徘徊其间觉得迷醉；

知我者，说我心忧宗庙被颠覆，

不知我者，以为我有所求。

遥远的苍天呀，

这是些什么人啊！

那垂垂的谷子、粟子结成果实，

我徘徊其间心噎气窒；

知我者，说我心忧宗庙被颠覆，

不知我者，以为我有所求。

遥远的苍天呀，

这是些什么人啊！

瞿秋白在就义前夕忽然想到这首诗，这不是一个“文人”的顺理成章的癖好，恰恰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的哀思。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显露了国家的危机,外侮频仍,人民苦难,革命受挫,苏区被毁,红军被迫“长征”。从某些现象上比拟,“彼黍离离”,倒像国民党反共势力的肆虐,“长征”也许类似“宜臼奔申”,欲觅一栖息之地。而后,是否能借“犬戎”之力杀“幽王”,^①或东迁加入“春秋战国”行列,这是后话。当时瞿秋白在缱绻中是难以推断的,但他的确忧心忡忡,为整体安危着急,而并不以个人生死为念。他之所以选用《黍离》诗篇为引子,意在惕励人们记取历史教训,不仅如此,而且暗示有更大的忧患隐伏着,危害至大,但又不能明言,所以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来导读《多余的话》。这最后绝笔是呕心沥血之作,用心良苦也。为了客观地公正地促使人们理解和信服《多余的话》的内涵,作者先坦直地自承过错,期望读者举一反三去思考问题。他用“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与立三路线”等主题作负疚的检讨,通过自检作历史的反思,其结论是:“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他忧心的米夫、王明、博古、张国焘这帮野心家。

长征甩下了瞿秋白,这是王明博古一伙人有意借刀杀人的阴谋暴露。表面上,当时是所谓“三人小组”(博古、李德、周恩来)的高层决定,由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其实是“二十八个”宗派秉承其上峰意旨、及其扈从们的卑鄙就义前的瞿秋白



劣心态所构成。(当时正直的人如吴黎平、陈毅等觉得惊诧,但无力改变此项决定)其时,苏区已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中,明知覆巢之下无完卵,而瞿秋白被硬性命令留守,并责成排练什么话剧,似乎是要他扮演空城计(其实是曹操杀弥衡的重演)。领导者们却纷纷乘骑坐担架走了。

瞿秋白知道,他在“八七会议”的“过火”,与张国焘、彭述之等人结怨很深;在莫斯科处理学潮时,与米夫·王明一伙意见相悖,动摇了米夫的权位,被这伙人仇视,欲置之于死地。还有,其他的人忌刻等等。长征前夕被弃置陷阱中,这也是必然的。瞿秋白个性淡泊,豁达不计恩仇,他无求于人,他毫不抗拒地服从了留守的决定。也不提任何要求,甚至缺少油盐 and 照明的蜡烛,他就淡食和早眠。一清早起来,还是和一群天真的青少年排练话剧。他是以此为醉来麻痹自己。在他当时思想里,可能是将革命原理与儒佛之道混为一体,而后化解成:“为党牺牲最光荣(儒说:“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与旧传统彻底决裂”(佛说:“躯壳解脱”)。这是瞿秋白当时被置于死地的逆来顺受的情状。

被捕后,更接近了死神,瞿秋白心神烦忧了,不是恐惧个人的生死,是忧心忡忡的关注着党的安危和整个中国革命前途的忧患。他心忧的是“此何人哉”那批人。开始,情绪有些低沉,写了《卜算子》《浣溪沙》等诗词(“眼底云烟过心时,正我逍遥处。”“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年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继而又回想再过的六部小说,其中就有“多余的人”的影子。后来,从历史的反思想到:幼年的党及其脆弱的领导、路线的错误、指挥的无能、干部的盲从、群众的彷徨……事事处处都有忧患。其中也包括了自身的过错和失误。身处囹圄,心急如焚,于是,想到《黍离》诗篇,写下了《多余的话》。这是写《多余的话》的历史、社会、思想的三条根源。

标题为《多余的话》,其背景很简单。即:作者是“被拉出了队伍的人”。瞿秋白早年喜爱俄罗斯文学,曾有“六年的文字因缘”与耿济之等从事俄国文学译作,读过不少有关“多余的人”的作品(例如屠格涅夫的《罗亭》,冈恰罗夫的《奥勃洛摩夫》,普希金的《奥涅金》等书),他也时常

标题为《多余的话》,其背景很简单。即:作者是“被拉出了队伍的人”。瞿秋白早年喜爱俄罗斯文学,曾有“六年的文字因缘”与耿济之等从事俄国文学译作,读过不少有关“多余的人”的作品(例如屠格涅夫的《罗亭》,冈恰罗夫的《奥勃洛摩夫》,普希金的《奥涅金》等书),他也时常

① 幽王宠幸褒姒,想杀太子宜臼,立褒姒儿子伯服做太子,宜臼母亲是申侯女儿,宜臼奔申,借犬戎之力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亡于犬戎,平王靠诸侯援助,迁洛邑建立东周政权。



以“多余的人”自况，在狱中以双关语写《多余的话》，这是很自然的。

用什么格调来写“最后的坦白的话？”“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瞿秋白首先想到了“知我者……不知我者……”为引子，坦荡的“自我分析”，委婉地说清“历史的纠葛”“历史的误会”，“排除”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但是，有许多事不能在班房里剖白，特别是触及敏感的理论争议、失败责任诉属、今后任务与现状等等大事，不能平铺直叙的公式化，文字必须曲折有含蓄，于是《多余的话》写成了幽默的散文，它有哲理的隐喻，又是史实的剖析，它启迪读者理解了历史真相。

《多余的话》以自我批评的方式，隐喻党内宗派活动与权势之争的危机。例如“历史的误会”：瞿秋白表明自己从小就无意从政，也无治国平天下的大志，由于家境贫寒才考入免费的俄文专修馆。又因偶然的机遇，当了翻译，在特定的环境被推上领导地位。乍一看来，这像一篇文学作品，瞿秋白为什么要写这类乎“辩诉”的文字？原来，就是因为他当了“领导”引出了事故，他不得不最后说说心里话。

“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觉得好像是拆台……”这是指1927年“八七会议”。这个历史原因竟铸成一股不共戴天的仇恨，就是与领袖欲强

的人从此结怨，其中特别是张国焘。因为“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机会主义，张国焘亟想取代陈独秀。但是，瞿秋白传达共产国际电令和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决定：开革了张国焘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因为他在“南昌暴动”中违反了党的决定。张国焘大发雷霆，迁怒于瞿秋白，从此结了怨恨。瞿秋白谦恭地说：组织决定如此，但仍希望你以丰富的老经验，随时匡正中央的不足之处。当时因“南昌暴动”失败，国民党正紧急通缉张国焘，瞿劝告张暂时隐居，以保安全。张愤怒地自汉口去上海，专访陈独秀，鼓动陈另组“工农党”对抗中共。后来因为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陈独秀不愿出席，张国焘策划的“工农党”也就未实现。

这是《多余的话》中写的“历史的误会”的写作背景之一。其次，是1928年7月在中共“六大”会上，瞿秋白被拉下马，并被软禁莫斯科不许回国，这也是写作“历史的误会”背景之二。这时米夫、王明一伙人搞宗派活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嫉恨瞿秋白，把他看成阻碍篡党夺权的绊脚石。这期间，米夫和王明博古一伙勾串了张国焘、向忠发等扮演闹剧。张国焘则觊觎总书记权位，满以为投效了米夫，把瞿秋白拉下马，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因为，陈独秀不出席“六大”，就等于放弃选举权，不能再为冯妇；李立三有湖北省总工会的错误，周恩来对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应负责任；蔡和森是宣传机会主义的第一责任者；张国焘自以为与米夫有了默契，按照“六大”预备会上布哈林示意他张国焘可当仁不让，以老资格稳坐总书记的宝座。

是《多余的话》中写“盲动主义与立三路线”的来由。

瞿秋白从不诿过于人,他坦荡的自承错误,主动检查了“八七会议”以来左倾盲动的错误,举例说“广暴”失败后还认为革命形势也继续高涨,作了错误的指导。“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以我个人而论,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

这一段“自我分析”很值得深思。

有关“三中全会”的情况,《多余的话》也坦直地说明未能按米夫意图执行的错误。

“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都抑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提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有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和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其实,这段话是流露出了与米夫国际路线的抵触情绪。“派别观念”表明中共基层同志抵制王明、博古等的事实。“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换言之,李立三执行的就是国际路线。但是瞿秋白又缓和的解释说:“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的逻辑的发展。”

对“调和主义”帽子,瞿秋白也一肩挑,使周恩来轻松地过了关。但是,米夫十分恼火的是“更没有有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和实际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也就是未按他的叮咛指示把王明博古捧上台。原先,以为瞿秋白在莫斯科软禁了两三年,在张国焘形影不离的监控下受尽了各种折磨,精神萎靡,病骨支离,如今放回中国,在周恩来陪伴下,一定会在“三中全会”上乖乖地执行米夫

指示,驯服地完成使命。岂料放虎归山,竟敢如此悖逆!米夫、王明一伙决意剪除瞿秋白。这就是“四中全会”先开革,“长征”时指令留守,然后假手国民党屠刀杀之泄恨。

借刀杀人的先例不止一二例。王明在新疆诬陷俞秀松、董亦湘等被杀害是一例,“四中全会”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恽雨棠等反对王明路线,认为“四中全会”是非法的,有几十个人抗议,结果被告密遭逮捕,在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被枪杀了。23人被判刑。瞿秋白之死,也是这一条黑线贯串的。

总的一句话,《多余的话》是一篇心忧书。它坦荡的“自我分析”,承认错误,却隐去了“别人”的一切是非,更没有亮出背景人物的脸谱。在“脆弱的二元人物”中写明:“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就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这意味着甘愿承担一切罪错,为了保全共产国际的威望和某些领导人的颜面。既已身为死囚,自愿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而献身,捐躯就义,也为了促使以后的青年吸取历史教训,免蹈杀身之祸。

对《多余的话》评议不一,有些人不了解瞿秋白的品德秉性,不知道写作《多余的话》的背景,更不懂得他苦心孤诣的隐衷,包括他的亲近友人在内,大都是信笔所书,说《多余的话》是什么什么,凭一己意念下结论。有人说它是坦白交代,有人说它是揭发什么,有人说它是忏悔录,甚至有人说它是殉情的葬花词等等。我想,秋白在九泉有知会哈哈大笑,他一定会再告诉你:“中国的豆腐是很好吃的东西!”

但他还是预料地说:“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

(责任编辑:刘文)

(上接83页)签呈的拟办意见,是中共地下人员王和陆共同字斟句酌地写成的,大致内容是:陇东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域,回族与番民等习俗信仰,均与汉人不同;由于传统隔阂,经常有械斗仇杀之风,近年正叠起风波,凶杀县长徐某(原省政府机要秘书)一案尚未了结,暂难施行“警备班计划”和“联保连坐法”,因恐激起更大变乱。构筑碉堡亦将引发民族误会,而土木石方工程也难就地取材。因此碍难克日成立区指挥部。奉此,拟恳垂察地方实情,准予暂缓施行;一俟与少数民族间嫌隙稍得弭平,该区经过教化安抚后,当再遵办……云云。这条拟议意见当然符合谷正伦意愿,签发了。

显然,一个曾经以杀人为职业的老宪兵司令,忽然

不愿意配合反共,决不是有什么觉醒或同情共产党革命,而是第一要保全本身官位,措词适当的呈复,可以不受谴责;第二对平级的蒋鼎文、小字辈的胡宗南,不甘心为他们当阶梯;第三,陇东地区如果真的构筑碉堡,耗资亿元,省政府无力负担,而且地形复杂,难以封锁;第四自己心灵上得到安慰,免得与中共短兵相接,丢盔弃甲保不住妻妾。这些心态,就是破败胡宗南四面包围延安的因素,中共地下人员不费一枪一弹,巧妙地取得了胜利。

反共磨擦专家梁干乔为此抱怨、愤懑,悲怆地喝完最后一杯苦酒,大叫一声,咯血数口,走上黄泉路。

(责任编辑:刘家驹)

卢沟桥事变的 那一天

近年来，日本政府的文部相藤尾、国土厅长官奥野、法务相永野等政要，隔三差五地站出来为日军侵华罪行赖帐，说什么是中国人的“捏造出来的”。我们震惊之余，不能不警惕这夥人想干什么？！中国人数千亿的财产，数千万人的生命决不能让历史湮灭，让我们重温已过去近60年的这部民族血泪史——

8时30分——

枪声彻夜未停，守卫卢沟桥的三营营长金振忠，从营部向团长吉星文报告完敌情后，又急匆匆地赶回前沿连队。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他和他的部属们的心像待射的箭，白天黑夜都放在绷紧的弦上，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打盹儿。他每天早、中、晚必须到卢沟桥前沿阵地去巡视，他真担心，在这种时候出了问题，那是不能仅仅用“失职”二字来搪塞的，团长会暴躁得揪下你的脑袋试问。

近些日子，宛平人连嚼冰糖楂都感到了火药味，他们预感到这离发生枪战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从昨天开始降落的这场雨，给天地间罩上了一层令人压抑的水帘子。日军演习的枪声，穿透厚厚的雨帘子散发出来的声音，沉闷至极。

这会儿，金振忠站在烟雨朦胧的卢沟桥上向北望去。噢，每一枪都像射在他的心肺上。

他熟悉哪支演习的队伍，是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三大队的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队，演习地域在卢沟桥以北的回龙庙附近。

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庙内驻有中国士兵。日军竟然在我军眼皮下挑衅。金振忠哪里知道，日军此行，公然在中国长驱直入了。后来当他随何基洋将军在淮海战场起义之后，他才看到日军当时的《卢沟桥战斗详报》：我们从回龙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力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12时30分

何基洋旅长这些天连睡觉也睁着一只眼睛，他的旅分散在北平附近的各个点上执勤，卢沟桥此刻的情况引起他严重的关注，他让吉星文团长在电话里，给金振忠传达了自己的指示：要密切关注敌情，如果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

金振忠营是1936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和卢沟桥防务的。当时的卢沟桥，形势已经相当吃紧；丰台的大部地盘已落入日寇手中，日军的军事演习日益频繁。金营长多次对同事和部下这样感叹：“我们守卫的这座桥一旦落到日本鬼子手中，北平就变成了一座死城，华北也唾手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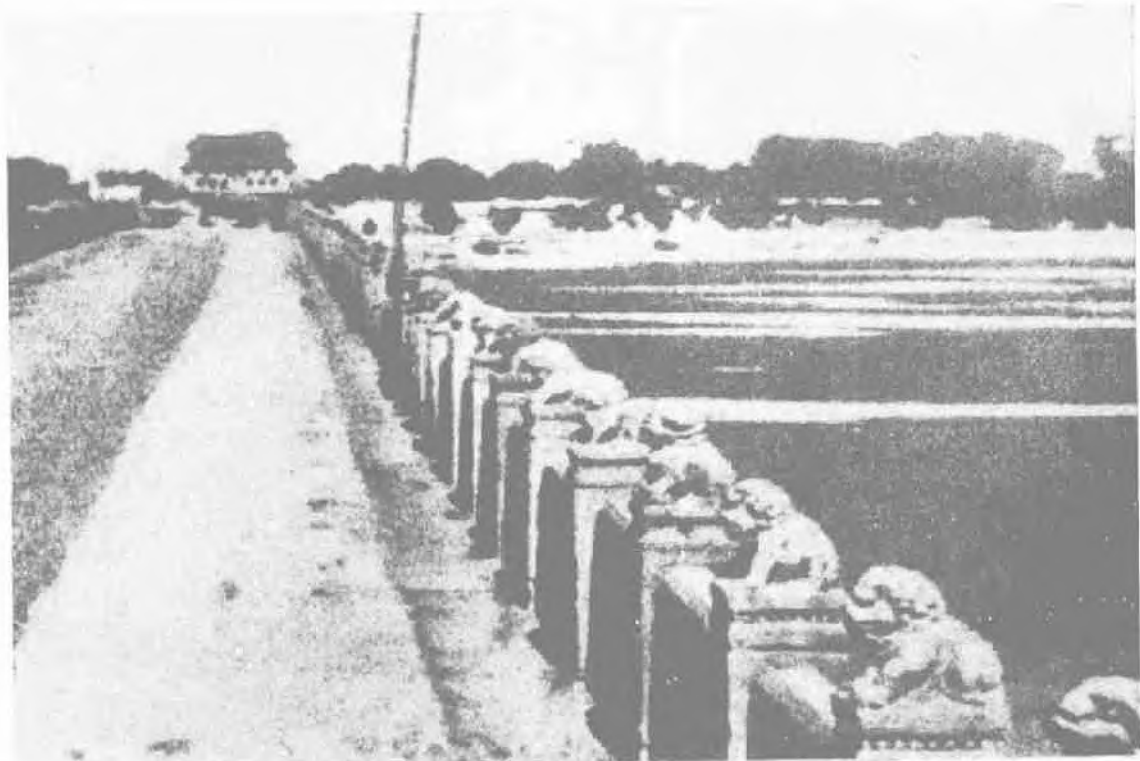
卢沟桥的西首，有一座庙，当地人叫大王庙。三营营部就在这庙里。

现在，到卢沟桥观光的人还可以看到这座庙的遗址。

14时30分

三营的军事会议在大王庙召开。由金振忠主持，从一个军人的直觉，战争迫在眉睫了。到会的都是营、连三级的指挥员，他在进行战斗动员。会场的气氛紧张、肃穆，每个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

“日本人马上就要下手了！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如果有一个来



犯的鬼子从我们的火网里逃走，那就是我们的失职，做下了有辱于国家和民众的事情。追查责任，首先要追查今天在座的各位。”

他继续说：“当然，只是日军进入我们阵地百米内，我们才能射击……。”

尽管日军不间断的军事演习给人们带来了不祥之兆，但7月7日这一天对宛平人来说，似乎与往常任何一天没有多少区别，人们照样担心，照样地下地干活，打水做饭，照样地吆喝牛到河边去饮水，……宛平城里没有少什么，只是多了这场冷不丁落下来的比昨天还大的雨，这雨仿佛把人们与外界隔绝了。

很巧，这一天是选举“国大”代表正式投票日，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清早一起床，就分成几组到各区乡镇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监票。一直忙乎到下午才收场。

22时30分

卢沟桥畔日军演习的枪声还未平静，宛平城东面又突然响起几声枪声。很刺耳，像钢锯在划玻璃。

不久，就是日军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大地在震颤。

县城里的地方官员被吵醒了！居民们也躁动了！

北平市市长也是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寝室里的电话铃不间断地响了起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的电话……

负责对日交涉的委员林耕宇的电话……

二十九军营地的电话……

他们报告的都是同一件事：

当晚10时40分左右，日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走失士兵一名。日方称该士兵被中国军队绑架到宛平，他们提出要率部队进城搜索。

秦德纯问：日军方面讲没讲他们的士兵是怎么走失的？

答：讲过了。当时演习刚结束，他们正在整理队伍，二十九军驻卢沟桥部队向其开枪射击，演习队伍

一时混乱起来，便丢了一名士兵。

秦：二十九军向他们射击？血口喷人！

稍停了片刻，他以非常干脆且洪亮的声音说：

“卢沟桥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军队事前并未得到我方同意就强行在这里演习，这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妨害了我国主权。日方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

他强调说：

“任意走进中国的一个城市去搜索所谓他们走失的士兵，他们没有这个权。不过，念起两国的友谊，可以等天亮后，令该地的军警代为寻找，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8日0时30分

日本使馆武官给北平市打电话威胁：如果不允许进城搜索，将用武力保卫前进。

中方给日军的回答很明确：不能同意你们进城。如要进城，一切

后果由日方负责。

日军立即包围了宛平……

宛平城内出现了一派异乎寻常的景象。军民们早先产生的那种紧张恐惧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家齐心协力地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防卫日军破城的工作。干着活儿的人们显得非常兴奋，卖力气。

不用动员，居民们都志愿参加了“运输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或背盛土的麻袋，做临时防御工事。

东西城门已经被大家用沙袋堵紧了，仅在西门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都用棉被遮着窗口，这样既可以防止灯光外射，还能防止流弹。

一些当夜在宛平城里的人，在50多年后回忆起“七七之夜”，无不感慨地说：什么都不怕了！甚至有一种逆反心理，让鬼子早点进城来，这样好收拾他们。他们欠的债太多了，只有拿脑袋才能还清。

与此同时，吉星文团长向秦德纯报告了一个新的情况：

约有一个步兵营的日军配属了一个机关枪连，还有山炮，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

秦忙打断对方的话，问：

“你在给我报告的同时，采取了什么措施？”

吉星文回答：我已经将城防布置妥当，迎候敌人的突然袭击。

秦：我是说宛平城和卢沟桥两个重点战区的情况如何，现在就是把子弹推上膛。

吉：是的，子弹已经上膛！

秦德纯继续说：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要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敌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也不可轻易让人！

他又倒过去讲一次。吉星文听着听着胸部热了，是军长的心烘热的，是军长的话暖热的！

秦又说：老吉，请你把我刚才的话转告给冯师长，还有何旅长！

吉星文攥足劲，对着话筒大声喊了一个字：是！

1 时 30 分

日本代表佐佐木来到秦的公馆大厅里。他原是驻北平同盟分社社长，和秦的交往密切。

“日军昨晚进行的只是普通演习，并没有实弹射击。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中国方面进行了‘不法射击’……”

秦德纯打断了佐佐木的话，极不耐烦地说：“你来就是给我讲这些吗？”

佐佐木忙说：“不！别误会。事情发生后双方肯定都是满腔火气，我想谁都应该克制些，协力做调解工作，使小火不要变成大火。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那么，你有什么想法吗？”秦问。

“我是搭桥人，中国人叫穿针引线。松井找你已经很久了，他想与你面谈。”

“他要谈的问题告诉你了吗？”“并没细说，可我知道他想化解矛盾，改善日中眼下的紧张关系。”

秦的脸上浮出一缕硬硬的笑，说：

“那好吧，我准备会见松井大佐。”

半个小时后，日军特务机关部长松井来到秦公馆。两人简单的寒暄了几句之后，便切入了正题。他们很快商谈了一个初步协议：

先将两国军队隔离；大致上日军在永定河东岸，中国军队集结于西岸；尔后，由双方派遣代表到现地商定具体办法。

秦说：这个协议只是权宜之计。但眼下很需要走这一步。

松井：双方都需要冷静，只有冷

静下来，理智才能战胜感情。

秦德纯对于松井这“理智”二字极不愿听，什么叫理智？中国人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就是理智。他本想发作，回敬松井几句，但忍下了。

松井满脸喜气离开秦公馆时，时针刚刚迈过凌晨三点。

3 时 30 分

一张不大的椭圆形桌子周围坐满了人，中方的代表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委员孙润宇、参议林耕宇和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专员兼县长王冷斋。日方代表松井久太郎孤身一人坐在另一边，脸上挂着热汗，正以手当扇地扇着。他是急匆匆赶来参加会的。

没有人宣布谈判开始。

但是，已经有人报告发言。双方一开口就是据理力争“谁开第一枪”的问题。

王冷斋开头炮：“枪声来自宛平城东门外，这是每一个长着耳朵的人都听到了的。我方在那里并无驻军，何谈开枪？”

松井不以为然地说：“需要更正王专员的话，是枪弹声。枪声是从宛平城和铁路桥附近传来的，那两个地方驻有中国的军队。”

王质问：“我们已经查过了城内的每一个守兵的子弹，一发不少，怎么会有枪声？”

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

中日双方为澄清这个问题，谁都在谴责对方，谁都不愿承担这份罪责。

“第一枪”的“悬案”挂了50余年，响过的枪声立即就消失了，放枪的人也许已经被历史忘记了。

冷却、凝固、沉淀了的历史，有时往往反而能给人们提供明晰的事实、推断公理的依据。

我像众多的历史学家一样，无法回避“第一枪”的问题。



我像用犁头钻进板结的土层，从浩瀚如海的材料堆里，发现了两份极为珍贵、而且比较客观的史料。它们都是出自日本人的手，一份是当时当事人的现场记录，另一份是当时目睹者的事后回忆与分析。

清水节郎，这位在现场的日军第八中队队长，“演习”的第一线直接组织者。他在《清水节郎笔记》里记下了当时的战斗情况：

“晚上10时半左右，传令休息。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象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天（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

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1937年担任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先生，当时详细地调查了事变的发生经过。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是这样回顾的：

“我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最初报道，已是在7月8日上午10点多了。”

“报道说：‘丰台我驻屯军一个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7日夜在卢沟桥演习中，于10时40分左右，突然遭到中国方面数十发不法枪弹射击，因而不立即中止演习，侦察情况，并要求中国部队长官赔罪。开枪者为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某营。’我想，是终于开始（战争）了吧。最初的消息是夜里两点由军方发表的，因此对现场的情况大概不会很清楚，所以其消息不一定完全准确。事态如何发展，很令我不安。”

“……我详细地调查了卢沟桥事变突然发生的经过。据寺平氏

说，清水中队于7日晚10时40分决定演习结束，特派传令兵向假敌传达，但被假敌误会了，因而用轻机枪向传令兵打了30—40发空枪。像是对这些枪声的反应，突然由永定河的堤防上（第一联队战斗详报说‘从龙王庙’）的中国方面射来两三发实弹。寺平志楠在他的回忆录《卢沟桥的枪声》中说：‘中国军队听到轻机枪声，以为日军开始进攻了，于是不知不觉扣响了枪机。从只打了两三发枪弹便停止射击的情况来看，也决不能想到中国军队会有他意。在沉静了一段时间后，日军的集合号声响彻夜空。中国军队不理解这是什么号音，误认为‘是开始进攻的信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判断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开始连续射击了十几枪。’虽然并不清楚枪弹是从哪个方面射来的，但日军的战斗详报，却记为是从宛平县城方面射来的。中国军队看到日军没有攻击，也就随即停止了射击。这就是在7月7日夜10点40分到11点之间，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情况。”

应该说，事后的这些回顾要冷



静,客观得多了。

这个事变他们都承认无悔了:是日军的“空枪”引起了中方的“射击”。

……争论中,松井心虚了,突然转移了话题:“我们的士兵被贵部绑架进城,我们要进去搜索。”

王反驳:“你们在城外演习,士兵怎么会在城内失踪?再说,宛平城在夜间已经封闭,你们的兵是长了翅膀飞进去的?”

松井坚持己见:我们必须进城搜索!

对于他们的蛮横不讲理,王冷斋很愤然,他不得不站起来甩出一句话:就算你们丢失了士兵,也与我方无关。宛平城不许任何外国军人进去搜查!

冀察当局的几位代表,很少讲话,好象他们的任务就是“坐会”。

松井看到王冷斋竟是这样毫无情面地与自己论战,心中十分恼火。在战火暂停几分钟时,他很傲慢地问:

“王专员既然是中方参加谈判的主要代表,我希望能带来一些与军方不同的情况。”

王冷斋说:“很遗憾,没有。我

只带来了事实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就是:日军演习的地方在宛平城东门外,我方在那里未设一兵一卒,我城中守军也并未开枪。只是在日军轰我宛平城时,我军才会进行还击,以示惩戒。”

松井再一次失望地摇摇头。

就在谈判进行当中,出现了一种具有喜剧性、也是富有讽刺性的事,我方代表得到可靠的消息:日军失踪的士兵已经归队。

我方代表交头接耳一阵骚动,引起松井的注意,不安……

其实,在此之前半小时,松井已经知道了此事。但他仍然装疯卖傻地提出要进城去搜查已经归队的士兵。

日军声称走失的这个士兵是个刚穿上军装不久的新兵,传令兵,他在执行任务返回时,由于天黑路滑走向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如此而已。

既然将把柄已经抓在手,只有揭穿日方的谎言才可以制止它。王冷斋又一次站起来,端出了这个消息,他提醒松井不要执迷不悟,说:

“松井先生,据我方得到的可靠

消息证明,你们那个下落不明的士兵已经归队。”

松井一惊,他望了王冷斋一眼,马上装作镇静地说:我们调查他是怎样走失的很有必要。

真滑稽!他不提搜索的事了。

王冷斋当然不可能没词对付松井,他说,怎么走失的,你们最好去问问那个士兵本人就明白了。

松井不讲理到了耍赖的程度,就是坚持要调查日军士兵失踪的原因。

……

谈判无任何进展。

该“坐会”的人说话了。明目张胆的地出卖国家主权、领土的事料定他们也无胆去做。但是,为了维护祖国尊严而去痛斥谴责日寇的事他们也无胆去做。折中,调和,就是这帮人的看家本领。

最后,冀察当局屈辱退让,同意了松井的意见:双方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待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

双方的调查人员各3人。中方:王冷斋、林耕宇、周永业。日方:冀察绥靖公署日本顾问松井,日军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

就在双方人员准备一起前往现场调查时，王冷斋等中国代表接到方才秦德纯已经得到的那个报告：驻丰台日军数百人，正全副武装开赴卢沟桥。

王冷斋望望夜空，心情像锅底一样沉闷。

一辆汽车载着双方代表驶向宛平城。行至丰台时，被日军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拦住了，他要求中方代表到他们兵营去面谈。王冷斋心里直打鼓。

他身不由己地走进了联队院里，中方的其它二位代表紧紧相随。

等大家都坐定后，牟田冲着王冷斋说：

“阁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问题处理的全权责任。我军失落士兵一事，要迅速处理，以免延误扩大。”

牟田讲话的口气很大，他正在代理河边旅团长的职务，还能不威风？

王冷斋说：“刚才在你们特务机关部商定的结果是，先调查后处理，现在我所负责的只是调查的使命，还谈不到处理。”

“我的大大的不明白，作为文官的你，有制止中国军队行动的权限和气魄吗？”

王冷斋回答：“我已经给你说过了，现在事情还未调查明了，谈不到什么处理，更无所谓制止中国军队行动一说。”

牟田露出凶相，赤膊上阵了，他对王冷斋说：“你现在就下令，让我们进城搜查。”

王冷斋大笑起来：“阁下不觉得卖国的帽子戴到我头上不合适吗？”

牟田一甩手，走了。

王冷斋等三人乘坐的汽车一离开丰台日军的军营，就看到路边数百名日军分乘八辆汽车先他们一步向卢沟桥方向开去，他的心一沉，有

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看来刚才牟田让他们在丰台停留是别有用心心的……

这是牟田和一木清直正演着的一出双簧。

一木在电话里请示：“中国军队再一次向我军射击，请示联队长，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才好？”

牟田肯定地回答：“受到敌人的射击，就予以回击！”

一木深知挑起战争的严重责任，因而又紧问了一句：

“那么，我们真的开枪也没有关系吗？”

牟田不说话，心里直骂这个饭桶！

一木确实感到分给自己的角色没有演好，有些愧心。马上说：

“好，我这就进攻敌人。既然如此，这件事事关重大，请把时间核对一下。”

牟田抬起手腕瞟了一眼：“4点23分。”

一木校正了自己的时间。他在抬腕的瞬间，整个身躯都抖了一下。

此刻，预谋这场战争的所有的，好战分子都在校正时间。在他们的眼里，阴谋得逞的时刻肯定是辉煌灿烂的。

一林清直率领第三大队，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中国阵地扑去。

一木肯定会有一种感觉：今晚，大概所有关注中国卢沟桥的目光都盯着他。

他接受了发动进攻的命令后，在五里店附近遇到了向宛平城行进执行调查任务的松井少佐。

一木告诉松井，他是去卢沟桥和进宛平城的。那完全是一种无尚光荣的口气：

“到时候，将会是我宣布卢沟桥被日军攻占了。明白吗？我们注视卢沟桥这座不平凡的桥头堡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松井听罢自然很羡慕，连他也觉得有几分得意，因为这里有他的一份功劳。不过，他想了想，又有点深思地说：

“中国的军队会不惜代价地反击你的进攻的。这，我早就听他们说过的。”

“他们说过？谁？”

“冯治安师长！”

“冯治安？”

“我见到过他，我提到了二十九军向我军的不法射击。冯说，他属下的部队不会派到卢沟桥去的，如果城外有部队射击，那一定是土匪。”

“土匪？那一定是骂我们的了！”一木不傻，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松井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在城外部署了兵力，不必隐瞒，有冯所指的‘土匪’，你进攻起来就有了保证，所以，我支持进攻卢沟桥。但是，对宛平城的攻击，我们则要等一等了，因为城内有很多良民，这些良民的厉害不会亚于军队，我们会寸步难行的！”

一木率领部队鼓起心帆去赶路了。他到了卢沟桥附近的沙岗村，身未下鞍，人未休息，就部署攻击了。部队全部散在各个点上，展开了战斗队形。步兵炮对准了回龙庙。

“准备射击”。这是他要下达的第一道命令。

日军为什么要把回龙庙选为进攻卢沟桥的突破口，也可以说是整个“七七事变”的突破口？

回龙庙是个战略要地，中国常年有驻军在这里守卫。驻军的任务主要是与宛平城驻军为犄角，从南北两方护守平汉铁路桥。日军一旦进攻铁桥，就会受到两翼驻军的夹击。

此刻，一木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强攻夺取回龙庙，尔后攻取铁路桥，长驱直入卢沟桥。

如今，在卢沟桥再也找不到回龙庙了。它早被历史的风尘淹没殆尽。

卢沟桥事变中这座庙宇是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地，守者顽强，攻者死拼。它曾经三失三得，那三间正殿、四间配殿，毁坏严重，荡然无存。只是那土台高坡尚残残缺地赤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最初，庙基柱础还依稀可辨，后来很快就被风沙掩埋得无影无踪了。

4 时 30 分

王冷斋一行来到了沙岗村。停车。下人。

这儿离宛平城东门只有二里地。

王冷斋看到，公路边的沙岗和铁路涵洞一带的地方已被日军占据。借着朦胧的微光，可以看到那些鬼子兵大多数伏卧在地，做射击准备。机枪和炮也都已架起，不长的炮筒伸进了黑洞洞的夜色里。

寺平坐的车是第一个停下的，他却是最后一个下车。

“请你过来一下。”寺平向王冷斋招手。

王站着未动。

寺平只好走了过来。步子很快，气势汹汹的，像一阵旋风。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地图，对王冷斋说：

“王长官，现在事态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中方和日方都拿出了开枪对立的准备，用你们的话说，就是一触即发，我们按原先的步骤调查，谈判显然不行了。你说呢？”

王：“什么叫双方开枪对立？中国军队是捍卫自己的国土，日方是侵占别人的国家。”

寺平以缓和的口气商量说：“不要赌气嘛，眼下最要紧的是双方都解除对峙。我想了这么个办法，现在只有你迅速命令城内守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双方再商讨解决办法。”

“你是颇费心机的，你现在比牟田更明确地提出我军撤出，让日军进城，这种无理要求，我不同意。”

寺平一双小眼睛一忽闪，问道：“我们的军队为什么不能进城？平日日军演习都可以穿街而过的。”

王立即反驳道：“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并不明了以前的情形。日军的演习向来都在城外，我们从未允许演习队伍穿街而过。你所谓的先例是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

证明。”

寺平接前任的工作还不足三个月，被王冷斋质问得张口结舌，满脸通红。不过，这只是一瞬间的尴尬，很快他就变得恼羞成怒，说：

“我提的要求，是奉命办理，事在必行！请阁下见机而行，免得被动。”

王冷斋的回答只两个字：“请便！”

又一个人出来与寺平搭伙威胁王冷斋。

此人就是那个所谓代表日方全权处理问题的森田彻副联队长。这时，他一脸杀气地走到王冷斋前，说：

“请诸位过来，看看日军的阵势，受受启发！”

于是，中方代表被胁迫到日军已经部署好的阵地前。

一排排枪炮在夜色中凝聚着阴森的寒光。

仿佛还可以看到爬卧在地上的那些日兵们的凶神般的脸。

寺平“解围”说：

“双方的矛盾宜解不宜结，万一事态扩大，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烦，谁负全责？”

王冷斋见状，也无别的良方可





▲金振忠

施，便与其它几位中方代表交换了意见，同意到城里谈判。

他们走进宛平城。

日军攻城的枪炮声打断了谈判。

我军被迫还击。枪炮齐发。宛平城淹没在烟火里。夜空里窜起一股尘烟……

王冷斋正在守军指挥所旁边的一间平房内与日方代表谈判。

王冷斋质问松井等日方代表：“是日军首先开枪破坏大局，酿成了这次事变，责任完全在日方！”

松井无话可说，只是说：“阁下息怒！阁下息怒！”

王冷斋：“你必须承认，日方要负完全责任！”

松井强辩：“开枪或许是出于误会。我们还应该致力调解此事，勿使扩大！”

“误会？宛平城都要被你们的大炮摧毁了，还误会！”

王冷斋甩下这话，破门而出。

当一本清直大队请求牟田联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射击的时候，日军驻平副武官今井武夫就在现场。

他立即给东京驻军中央部发了电报。

之后，他便筹划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这时，8日凌晨的晓色刚刚爬上窗棂。招待会就在武官院内

内的槐荫下进行。到会的大多是日本的记者。

今井武夫给记者们讲了“士兵下落不明”的详细经过。他告诉记者们，今夜卢沟桥枪声的响起，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即将开始。

记者们走后，今井武夫在武官院子里参拜了招魂社，为东洋的和平作了祈祷。

后来，若干年后，今井武夫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这样写道：

记者们走后，这已是早晨五时半左右，天开始淅淅沥沥地地下起雨来了。恰巧就在这一时刻，西南方向响起了大炮声，震撼着低雨蒙的昏暗天空，沉重的轰鸣犹如在给远东抒发着凭吊的哀吟……

是的，这不仅是远东的哀吟，还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是永远留在史册上的。

好大的雨，足以使整个卢沟桥浸在水中，却不会洗刷掉那些狰狞的声音。

这是1937年7月8日凌晨5时30分。

8时30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立即向全国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报”：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7日夜10时，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

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风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一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7年7月8日

（责任编辑：刘家驹）

老舍为什么 没领到诺贝尔 文学奖

●舒 云



诺贝尔的遗嘱问世以来，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坛上几乎每一年都要刮起一股令人注目的旋风。很可惜，这一股又一股的旋风很少出自亚洲地区。屈指算来，从1901年到1992年，除了因世界大战或其它原因未授奖外，获奖的90多位作家中，仅仅有几位亚洲人。

而1968年以前，诺贝尔文学奖仅发给亚洲人一次，这位幸运者就是印度的泰戈尔。

诺贝尔把他因发明烈性炸药而获得的丰厚专利920万美元的遗产，统统用作诺贝尔奖，奖励给人类造福最大的个人与机构。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奖的六种奖之一，按照诺贝尔遗嘱的要求，必须授予曾经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

那么，悠悠亚洲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吗？或者干脆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无缘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鲁迅先生活着的时候，曾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名单，他明确表示不要。

近年，巴金、冰心和艾青也曾入围诺贝尔奖，成为候选人。

每一年，都要由评选委员会提名几百名候选人来竞争这项世界级的荣誉。几番严格的筛选之后，剩下5名，再投票表决，票数最多者就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直到1992年止，巴金等中国作家甚至包括鲁迅，都没有打入前5名，唯独一名中国作家例外，他不仅打入了前5名，而且摘下了第一名的桂冠。

他就是老舍先生。

四五十年代，美国人曾经议论，诺贝尔文学奖该考虑中国人了吧？

林语堂、胡适、梁实秋和王莹在美国也曾经讨论过，如果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哪位中国作家有资格呢？讨论来讨论去，他们一致认为，此奖非老舍莫属。

梁实秋回到台湾后，突然意外去世。他的如夫人见到老舍夫人胡絮青后，对她说：“梁先生叫我传达一句话，中国获诺贝尔奖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老舍先生。”

无须讳言，诺贝尔文学奖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奖，获奖的多数是西方作家。那么，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什么有几位也荣获此殊荣呢？

俄国贵族出身的蒲宁，是这个国家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作家。他在红军解放敖德萨的当天登上轮船逃往法国，他是以法国作家的身份领取诺贝尔奖的。蒲宁曾与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齐名，但苏联从不提及这第一位获奖的作家大名。

继蒲宁获奖后，《日瓦戈医生》的作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奖是因为他描写了知识分子在苏维埃时代的悲惨遭遇。

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又一次光顾苏联，《静静的顿河》有争议的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得到了这份荣誉。

紧接着到了1966年，过去要挑一个中国作家的话题又重新提起，瑞典文学院组织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委员会要看作品，可委员中没有一个人懂中文，只能从英文或者瑞典文中挑选中国作家。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文化革命后才译成英文介绍出去。只有老舍先生的著作早已在西方流传，其中有瑞典文版的。

搬来一读再读，众评委顿感这位名叫老舍的中国作家出手不凡。

尤其是他的《猫城记》，寓言化地描写了人际关系的复杂，嘲讽了人类中性恶的人的劣根性，具有超越国界的世界性。这本《猫城记》，解放后的中国没有出过单行本，收在《老舍文集》中，一般中国人都能提起《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但是，要是问一问《猫城记》的作者，十之八九要摇头。而在国外，老舍的

《猫城记》是和《骆驼祥子》并驾齐驱的。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苏联的一本很大的杂志叫《新世界》，发现了老舍的《猫城记》，连载后又出版了单行本，发行了70万册。在当今中国，长篇小说上一万册算是畅销书了，一般小说仅四五千册，有的根本不能开机。那时，中苏关系正紧张，江青一听说苏联如此流行《猫城记》，立即命人把解放前上海一家出版社印的旧书找来，政治局委员人手一本，看看到底苏联人为什么喜欢这本书。确实是很奇怪的事，老舍先生仿佛是预言家，他预言到会有把图书馆烧了的一天。江青大怒，简直是在污蔑中国，批判！于是，不仅《猫城记》，老舍先生所有的书连同老舍先生一起被揪了出来。

这时，老舍先生并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拍板定了他，他决然选择了西去的道路。

诺贝尔文学奖从来不给死去的人，无论他多么著作等身，多么名声巨大，全一样。现在要证实一下老

舍先生是否还在人世间，他们听说不少中国作家找不到了，那么，老舍先生呢？于是，委托瑞典驻中国的一位外交官去打听打听。本来一个中国作家去世用不着保密。偏偏文革中谁也不知道谁的消息，甚至一家人也如此，更何况谁敢理外国人？就这样，瑞典外交官好不容易得到老舍先生自杀的消息，又好不容易证实了这一消息准确无误。

于是，打回电报。老舍先生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注销了。

按照常规，在剩下的4名候选人中再投票选一次，原则还是照顾东方人。

这样，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的得主是日本的川端康成。这是东方人继泰戈尔之后第二次获得该奖。

颁奖仪式在日本举行，很盛大。瑞典驻日本大使透露了这段长期秘而不宣的细节。那是他们日本民族第一次的光荣呵。

中国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责任编辑：刘文）

▼老舍全家(1959年)





公刘，原名刘耿直，1927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诞生于南昌，二十多年后，他成了我军著名诗人。1957年，耿直的公刘被总政一些人划为“右派”。他的冤案平反后，以惊人的毅力写了32部著作，享誉国内外，本文是他回忆在“劳改”中多次死里逃生的情景，读来令人酸楚。

我的“右派”生涯 片断回忆

大难不死 尚待后福

●公刘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而我经历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先后就有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

看官须知，我这个人活得“皮实”，命大。

那是1958年，几百名“钦犯”被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山西“劳动锻炼”。五一劳动节那天，正式在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上工。

“右派”们干劲十足，不到半个月，水库的坝址清基工程便结束了，为了赶在汛期山洪暴发之前，教大坝达到70米高度，真个是“每天挖山不止”。这一天，我们排被分配到一处陡崖下挖土，我分在推车组。挖土的人只图省事，刨下多大块，就往筐里装多大块。殊不知，镐头呼呼地震动了崖头，只听得轰隆一声，天塌地陷一般，一丈多高的崖头迎面栽了下来，一时黄尘滚滚，我正在崖下等着装筐，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我被劈头盖脑地打得天旋地转，车

子倒向了右侧，把一条右腿别成了直棍。我右首的装筐难友，已经被埋在了无数块斗大的土坷垃中，左首那位却一跳逃了灾难。

不幸被埋在土里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段炼，事后，众人跟他开玩笑：“都怨你名字取得不吉利，命中注定要锻炼锻炼！”还有一位难友，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而我呢，只能算作入了四分之一股。同班好友刘玉璋，慌忙将手中的小车掀翻，转身招呼一时吓懵了的同志们（也许应该是说右派们），先把堆在浮头上的碎土扒拉开，然后使劲儿用手挪开那压在我右膝盖关节上的大土块，我爬出来一瘸一拐地趔趄往一边就地坐下察看伤势，这时，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闻讯赶来，俩人脸色煞白，神情紧张。正副班长陈振华、吴占一忙着向上级汇报。许多人用锹和镐一点儿一点儿刨土，不敢大铲大挖，唯恐伤了闷在土里的人。这会儿，我的麻木感消失了，渐渐疼痛起来，出现了肿块，肿块的

周围火烫火烫的。

人多心齐，不一会儿，段炼同另一位先后获救，人们一面慰问压惊，一面忘不了开玩笑：“感觉如何？”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免悲从中来。

由于连续作战，我的手腕，又青又红的肿了起来，还呈现斑斑点点的瘀血紫癜，按理说是完全不应承担活计了。可是我能向谁诉说呢？大家都彼此彼此，还有绑着绷带上阵的，真他妈的跟打仗一样。

我一连拉车跑了七八趟，单程距离1500米，最高处的坡度为仰角30度；而且由于车多，运输量大，取土场愈来愈远，全程愈来愈长。临近傍午时分，腹中擂起了小鼓，是饿了，有点虚脱，热汗开始变冷汗，眼镜片上水雾蒙蒙，还不时腾出手来扶正眼镜架。沿路都是撒下的土，大坝上的秩序出现了零乱无章的状态，人们争着抄近路，以致险象环生。当我正架着一挂压得死沉的重车顺坡往下溜，不好！只见迎面一辆

空车狂奔而来，想必对方也是乱了方寸，刹不住车，显然，是他违反了轻车让重车的规矩，可事到临头，谁也躲闪不开了，眼看就要相撞，我担心我这连人带车上千斤碾过去，肯定要伤着对方，我自己也好不了；与其伤两个，不如伤一个！心一横，便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扭转车轱，直朝大坝边上栽着的一根电线杆子冲去。我心存侥幸，指望电线杆能把车子和车上的土保住。岂料……一霎时天旋地转，平车根本不听指挥，在电线杆上猛弹了一下，车子一颠，轮子一滑，竟然掉过头来，不是人拉车，而是车拉人，600斤的黄土，150斤的平车，拖上我不足百斤的身子骨，一个劲的往下哧溜，不知受了什么阻碍才不再移动了，反正等我睁开眼，望见的是大坝座了——原来是大坝半腰的一堆洋灰包救了我。

此刻，我惦记的是车子摔坏了没有？要是摔坏了，那就意味着又一场斗争会啊！如今，我可以坦然承认，哪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财产，不是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千万别上斗争会。

上帝保佑！平车基本完好，这主要靠了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全是土的缘故。

以上两次，只能算我死里逃生的小小的序幕。

小平车运土，土方量还是供不应求，“右派”们开动脑筋，献计献策，提出了铺设轻型钢轨，利用废弃的煤矿斗车，再在远处山腰新辟取土场，借自然坡度，重车滑行下，空车则由人力往上推。这一合理化建议很快被采纳了。运行的结果，居然比小平车翻了四番。

我被编在推车组。大组下面设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成员有副班长吴占一，还有战友段星灿。吴占一当过文化部长陈沂的秘书，后调创作室担任秘书，不久便调走了。反右开始，硬是将他揪回来“批斗”。据说，某大将坚决要拉陈沂下马，硬

把陈划作“右派”。创作室主任想对陈沂反戈一击，于是，声嘶力竭，在吴占一身上做文章，整出什么致命的“材料”来，充当“炮弹”，拿去轰炸昨天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吴占一在劫难逃。批斗会上，主任给了吴占一一个封号：陈氏家丁。另一位积极分子干脆接着喊“家奴”。我在批斗会上忝陪末座。吴是个正派人，我是同情他的，可我已铁定是“右派”，哪有勇气“仗义”？又哪有资格“执言”？这一场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有如地震海啸，一阵紧似一阵，诚如党报每日严厉警告的：谁想“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这天天气不好，下开了牛毛细雨，雨似油，粘粘乎乎的，我们三条汉子，却热气腾腾，都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儿。我们实在太忙太累太乏了，一趟接一趟，总也捞不着喘口气的机会。

我们推车组是固定组合，空车推上去后，必须立即从另一头跑步下来；等实车下来了，一辆一辆倒空斗子，并且敲打干净，又用扫帚呼啦一遍，务必不把剩土带了回去。当然，这一系列动作，都得争分夺秒，干净利索，一环扣一环，容不得思想开小差。在这种场合，人就是机器。无奈钢轨不够，没法铺复线，只有靠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跑！跑！跑！一个劲地将空空的斗车推上斜坡，进了取土场。

谁能料到，我们三个正埋头推车，离取土场大约只剩300米，没听见值班的吹响那尖锐的长长的哨音，重车却“自动化”了。以惊人的加速度冲下斜坡，5米、10米、20米……死神来也！到处是一片惊呼

声。

段星灿在我左手边，吴占一在我右手边，我夹在当中，即便抬头，也给车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此时此刻，我们惊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纯属偶然，我们三个得救了。

由于钢轨必须经过一段从高粱地里填筑起来的路基，整个路线是弧形的，就在这个拐弯处，段星灿大概是意外地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吓得“土遁”而去；车子突然间少了三分之一的推动力，不得不偏向一边，我还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幸亏吴占一眼尖，只听他大喊一声：“不好！公刘快跳！”立刻，我跟着也纵身一跃，尾随他之后，掉进了十几米深的高粱地，简直像“飞”一般，这当然并非绝技，仅只是本能而已。

这当口，但听得咣当咣当轰隆轰隆卡嚓卡嚓一连串骇人巨响，空车重车都倾覆了。它们一共8节，全扣倒在路的另一侧。

当我们出现在奔来救援的人们视线之内时，欢声雷动，大伙儿都替我们庆幸：狗日的，我们还准备开追悼会呢！可你们又不愿带这个头！

开追悼会？怎么开？悼词就没办法写！同志？先生？反革命？或者模仿判决书上的那个不明不白的“该犯”？那年头，人命本来就不值钱，何况还是“右派”呢！

这次脱险不多久，竟再次遇险。这一次，虽然吴占一不在场，但我要说，仍然是他救了我。

我和吴占一，仿佛注定了是老搭档，这回又一齐被分配到了采矿小分队，分工专管探矿，然而单兵作战，每人名下配属两位青年民工。我手下的两个，一个叫王招财，另一个的名字我已经毫无印象了。我们三个结伴一直往西南方向走，整整一个白天，走的尽是盘山路，都靠近榆社县地界了。天愈来愈黑，山愈来愈大，当晚赶到了一个名叫古香林的小村子，这名字很美，我一听就觉得肯定会产生诗，不久，我果然哼出来一首。野地里月亮特别大，从破墙烂屋顶朝上望去，非常晃眼，一宿无眠，自然，失眠非关月色，端的是一半由于兴奋，一半由于惶恐。

下面，先来上一段抒情的，再说那不怎么有情可抒的骇人故事。

多谢啦，夜的古香林，
乍相识，就赠我半床明月，满枕涛声；
三五青山，好似一群淘气的邻家少年，
倚着窗儿，对我直挤眼睛……

仿佛说：“打一个哑谜，你可要猜准，
铁，究竟藏在我哪一只手心？”中
青山呀，休怪我所答非所问，中中中
告诉你们，祖国，需要一张坚固的盾。

这首小诗的题目是《夜宿古香林》，还安了一个副标题：探矿日记之一，它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我的思想状况，即天真，又痴呆，依然在具体地爱那个抽象“国”！我完全没有份的“国”！

我只带了一条线毯、几件换洗衣服、一只军用挎包，里面塞了洗漱用具以及纸和笔，比当年行军都要简单，省了背米袋、大枪。吃的是派饭，一家一户轮着供应。男女分灶，只能扎在男人堆里，这种形式的集体生活，新鲜得古怪。

古香林没有古香林人，全拉到别的地方去了；如今住在本村的，竟都是外村人。男的归一堆，女的另归一堆；这无疑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奇事。那阵子作兴搞“大兵团作战”，往往一个公社组织一个“兵团”，便于统一号令，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其所以移民迁居，男女隔离，据说正是出于这种战略需要。我想打听古香林的受苦人都去了哪里，答案是，男人们下落不明，女人们不明下落。像这样，男的和女的“各住各的营房”，岂不把家都拆了？还怎么过日子呢？问起这一点，说话都没好气：“骗了去球！”“男人不是男人，婆姨不是婆姨的，就是叫咱们回去也没半颗粮食，锅也砸了，献给国家了，吃甚呢！”我听了，不敢吱声。

据我的观察，人们唯一显得生

气勃勃的时刻，就是开饭那大半个钟头，不像如今居家过日子，好赖可以歇晌，来当“兵团”战士，抹抹嘴就又该进入阵地了。饭食的确是“敞开肚皮吃”，大海碗的高粱面条，半截砖似的玉米面窝窝，还有菜汤，几片白菜加几片土豆，偶尔漂三两点油花花。一般说来，大伙儿是相当满足的。妇女们叨叨说比家里吃得舒坦，不用吃了上顿愁下顿，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才会悄悄摇头叹息：这哪像过日子？诚心败家呢！长不了，保险长不了……这种“落后”话，是决不可让干部们听见的，干部们听见了，倘对方是贫下中农，就会日一通你祖宗，遇上成份高的，那活该批判“反动思想”。要知道，党报上正在讨论“粮食多得吃不了该怎么办？”这样唱反调，不是对着干，搞破坏，又是什么？

古香林座落在深山腹地，野兽出没，是意料中事。村里村外所有的土墙上，甚至大门上，都用石灰画满了老大老大的白圈，旧的剥落褪色了，再描上新的，很是醒目。这说明附近有狼；狼多疑，望见白圈，它就不敢随便进家伤人了。

为了探矿，一连好几天，我们尽钻深山山谷，半天不见一个人影。这天，我们正走着，突然间，空谷里响起了一阵猛烈的喧哗，抬眼望去，只见很远很远的高山上，有四、五个农民模样的人，正赶着三匹毛驴，驴背上搭着鼓鼓囊囊的白色口袋，不待问，是送公粮的。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大声喊叫？是和我打招呼么？我茫然地也朝他们回应了一声。然而，他们仍旧一个劲儿的大喊大叫，并且带有焦急的味道。

我收住了脚步，不再往前走，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远处山道上的那几个汉子，想瞧出个究竟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身后草棵里一阵沙沙乱响，还没等我作出有野物跟踪的判断，已经有什么东西拍我的肩膀了，啊，不对！不是一只“手”

拍，是两只“手”同时搭上来来了。哎呀糟了！狼！狼搭我的肩了！怎么办？我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勇气，站得牢牢的，只是感到后脖子窝被一个冰凉冰凉的什么家伙顶住了，开始闻到了一股恶臭，一眨眼工夫，数不清的念头闪过脑际，有骇怖和绝望之感袭来，但求生的愿望又无比强烈；这时，我想起了民间流传的种种关于人和狼斗的故事，其中十分激动人心的一个，便是当狼搭了肩时，那被搭肩者既机智又勇敢，飞快地抓住了两只狼前爪，将狼一直背进村，终于把狼打死。

我下意识地斜着眼睛瞟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我不是握着探矿锤么？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是左撇子，左手力气比右手大，我操起左手，一个倒挂金钩，狠狠给了它一锤子；只听得“嗷”的一声哀嚎，顶着其后脖子窝的那个冰凉冰凉的臭家伙蹭了我一下，便连同两只爪子脱离了我的肩背，沉重地落到地上了。但它似乎并未死心，还从我的左侧方往前蹿了一蹿，该死的畜牲！我又挥舞起探矿锤，准备迎击，然而它却无心恋战，调转头跑了。我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目送它一颠一颠地逃去。为什么它要取那样一种古怪的步态？我这才仔细查起铁锤来，原来是不偏不斜地正好砸着了它的左眼！探矿锤的尖端不但沾着狼的血，带有眵目糊和睫毛，以及一些好像是胶状物质的东西——破碎了的眼珠子！哈哈！我，一个名叫公刘的昨天的作家，今日“右派”，竟然教恶狼变成独眼龙了！

这时，远山道上的好人们又大喊大叫起来了：

啊——啊——喔啊——
揍狗日的啊——好啊——
揍得好啊——好啊——

这一回的呐喊，显然是助威，嘲笑狼，撵狼了；只是我没闹明白，到底我是“狗日的”，还是狼是狗日的？

山上的几条汉子，还在一个劲地跺脚，表示他们的由衷高兴。这完全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多么可爱多么善良的人们啊！太感谢你们啦！

洪亮的回声久久地在天地间回旋……

两位青年民工相继出现在我的身旁。招财摸了摸我的肩膀，嘻嘻一笑：“吓杀我了，我都扳下好几块磨石头，真想砸那狗日的，可又怕砸着了；我就怕你回头，一回头教那狗日的咬住喉咙就没救了。哎呀真个吓杀我了！”

为了安定“军心”，我强作镇静，跟他开了个玩笑：“好我的招财哩，都怨你的名字赖，你看，你招财（豺），我就只好招狼了。”他们两个听了都哈哈大笑。

我必须承认，这一回趁地狱之门尚未严丝合缝地关上以前，的确是为了找到铁矿，完成任务，哪怕是立上一小功，也会有助于早一点“摘帽子”。

写到这里，应该交代一下遇狼脱险之事与副班长吴占一的重大干系了，前边我已经说过，吴和我各自负责一片幅员辽阔的地区，各探各的矿，彼此不通消息；但在分手之际，承他的好意，替我也打了一柄探矿锤；送铁锤时，附带还给我一本四号字排印，错误百出的小册子：《怎样寻找铁矿？》这种探矿专用锤造型特异，把儿长得吓人且不论，铁锤本

身也蛮古怪，上端尖，像一枚敲秃了的大号钉子，吴占一说：“这是连夜锻造的，将就使唤吧。”

我非常感激这位好心的老战友。只是那一刻绝不会想到它除了探矿之外，居然还会变作我的自卫武器，并且致狼以死命！

最近，我给已经从司法部离休的老吴写信，还郑重地再一次旧事重提，再一次向他鞠躬致敬。我以为，人，就应该这样，自己给了人家好处，不要忘记，人家给自己的好处，可千万不能忘了。否则，岂不也成了狼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将三十多年来的般般往事，包括劳动改造的往事，整个儿捋了一遍，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遗憾；这句多少代人的智慧总结和经验之谈，对我完全不适用。就说重操旧业、煮字为生的这十来年吧，先是胃大出血，血压降到临界点；后是突发脑血栓，亮红牌20天；1984年，右眼又基本失明。难道这再三再四、没完没了的劫磨就是我的齐天鸿福？！显然，所谓的后福，至少目前于我纯属画饼，那么，寄希望于未来的岁月罢。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把这句俗话改作：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原载《人生六十年》丛书），

〈本刊已作删节〉

- 全国政治类核心期刊
- 全国政治理论类核心期刊
- 全国软科学核心期刊
- 国际交流期刊

哪里有领导，哪里就需要

领导科学 月刊

领导同志的参谋助手 干部党员的
益友良师

同类刊物全国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在全国各级领导者和广大机关干部、党员中享有盛誉。

本刊宗旨：突出应用性、可读性，服务领导工作实践，提高领导艺术水平

本刊内容：科学决策、领导方法与艺术、领导素养、用人之道、组织领导、青年领导、办公室领导、企业领导、乡村领导、怎样当县委书记县长、怎样当处长科长、军事领导、领导心理、文秘工作、外国领导

订阅对象：各级领导干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广大干部、党员、宣传理论工作者等。

邮发代号：36—104 定价：1.60元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均可订阅

咏「臭老九」

梁漱溟

九儒十丐古已有，
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
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
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世，
也要揪出满街走。

此诗冷隽而酸辛，是诚春秋笔法。

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原是一片汪洋。亿万年前，印度次大陆脱离了古非洲，直插入欧亚板块之下，地壳隆起，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相继横空出世。全长2400多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成了世界最高的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高耸入云，地势险要，气候多变，中国

但因西藏高原的气候瞬息万变，未获成功。公元1902年，印度再次派测绘人员进行简易测量，经英国测量人员在1907年计算，得出8882米的高程数字。从此“珠穆朗玛山”便被英国和印度命名为“额菲尔士峰”。之后，我国也一直沿用了8882米这一高程数据。

地球之巅的高程

要从海平面算起

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当时的军事测量部门和水利、铁道、航运等部门各自为政，各建各的高程系统，共有10多个。计有：吴淞高程系统；大沽高程系统；珠江高程系统；废黄河高程系统；坎门高程系统；大连高程系统；……

这些高程系统由于互不联系，互不统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统一联测到黄海平均海面，发现差距太大，少则差20到30米，多则差400至500米。

●王友齐

珠穆朗玛峰上的奇迹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未能进行实地测量，直到公元1717年，康熙皇帝派兵入藏时，才派了两个学过测量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位奉命从西宁到拉萨，再从拉萨到恒河源，测量地形：“逾河源，涉万里，如履阶闕，一山一水，悉入图志”。后来因战乱所阻，好多地方不能前往，只能得之于传闻，但毕竟已作了大量的测绘和实地考察，并绘出了世界第一高峰的大体位置，命名为“珠穆朗玛山”。

由于未能测出“珠穆朗玛山”的高程数字，很多外国人也试图碰“运气”，可都未能如愿以偿。到了1852年，曾在印度测量局工作的英国测量员额菲尔士想测量珠穆朗玛峰，

地球上的陆地是起伏不平的，如何准确测量每一地高度呢？人们假设当海水处于自由静止的状态时，将这个自由静止的海水面向大陆延伸，就会得到一个假设的封闭曲面（重力等位面），这个面称为“大地水准面”。

然而，地球上所有大海的海水是不可能处于静止状态的。平均海水面的确定，就是在沿海地区，通过验潮的方法积年累月取其平均值，就是大地水准面。我们平时所讲的地面某点的“海拔高”，就是指从地球表面的这个某点沿垂直方向量度到平均海水面的距离。各个国家都用这种方法建立了自己的水准高程

这些混乱、极不准确的高程系统，将会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1956年，总参测绘局又组织测绘部队对中国沿海具有一年以上验潮资料的大坎门、吴淞、青岛、大连、葫芦岛等验潮站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分析。确定了青岛验潮站为中国基本验潮站，推算出青岛水准原点的高程为××米，名为“1956年黄海高程系统”，以这一高程作为全国统一的计算依据，正式列入了中国《大地测量法式》。

从1957年至1981年的24年中，总参测绘局、国家测绘局、水利部、国家地震局等部门组织了几十支测绘队、几十万人次进行了全国

至6公里埋设一座普通水准标石,每隔60公里左右埋设一座特别加固的基本水准标志。从而,把海拔高程从黄海之滨一直延伸到全国各个角落,北到黑龙江漠河河岸,西北到新疆天山的谷地,南到沿海各省,西南到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下。

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约有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不少地域终年高寒缺氧,荒无人烟,时而风和日丽,时而狂风大作,时而大雨滂沱,时而烟雾缭绕,时而雪花纷飞……所以直到1970年,



青藏高原仍是地图空白区。从1971年开始,总参测绘局组织了空军航测团,成都、兰州、新疆三个军区的测绘部队分片包干,总参及北京军区测绘大队和原武汉、福州、昆明等军区测绘部队分别配属参加作业。西藏、新疆、兰州、四川等省、自治区的各级党政机关、政府和人民群众也都竭诚支援,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测图大会战。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非常重视填补我国大陆最后这个测图空白区的会战。叶副主席批示:“力争1975年以前完成,如有具体困难,可设法解决。”周总理并挥笔圈阅同意会战的各

项安排。

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不仅使100多名测绘官兵受伤致残,还先后吞噬了47位测绘官兵的宝贵生命,然而,成千上万个干部战士却仍然不屈不挠地前仆后继,赴汤蹈火。

青藏高原是无图空白区,有很多雪山、大坂、山口都是处女地。测绘官兵们就根据自己在测绘中遇到的酸、甜、苦、辣,给这些无名地分别起了名,正式写到了地图上。现任解放军测绘学院副教授、当年的测绘股长李志良,带领两名参谋到胡玉民小组检查测量质量时,由于多次遇到了暴风雪,组里雇用的43头牦牛都先后倒毙,仅剩下一头,口粮也只剩一碗米了,大家舍不得吃,测量之余就扒雪挖野菜充饥。李志良派张国才和一名民工到几百公里外的大本营取粮,张国才发现大本营的全体官兵每天都要用清水煮马料充饥。后来,当他们保质保量完成那座无名山的测图任务后,大家就在图上标上了“马料山”三个醒目的字。

测绘兵会战世界屋脊,用了五年的时间。

参加“测图会战”的作业部队19247人次。

一等导线改造为一等三角锁2700公里。

测量三、四等水准路线4594公里。

测量一、二等天文点303个。

测量各级重力点1447个。

测出一比十万地形图755幅。

……

国内的有关专家这样定论:“假如不建立‘1956年黄海高程系统’,假如不布测数十万公里精密水准路线,假如不填补青藏高原无图空白区,即使单独专门测量出珠穆朗玛峰的本身高程数据,也是不准确的,因而也是不可信的。”

向珠穆朗玛峰冲刺

1974年11月2日,国家体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于1975年春季攀登珠峰。在此之前,国家体委、科学院和测绘部门已经商定,把单纯登珠峰变成登山、科学考察和精确测定珠峰高程三位一体相结合的活动。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意这个一举三得的计划。

当然,按照“1956年黄海高程系统”,把水准点一直测到珠峰脚下,再从珠峰脚下逐步向上延伸,要直接测到顶峰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须采取三角高程测量的方法。可是,珠穆朗玛峰那么高,如果顶峰没有设立测量觇标,目标就设法集中,照样也是测不准确,高差也求不出来的。所以,必须由登山运动员把测量觇标带到顶峰。一般测量觇标都有几十公斤重,最优秀的运动员也无法把它带上珠峰。为此,总参测绘局和国家测绘局根据航空摄影像片,经航测测得珠峰峰顶的走向、长宽度、以及后期进行交会观测点的位置和高程等数据,设计了一种高度为3.5米、重量只有3.74公斤的金属测量觇标,北京青云仪器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很快就保质保量赶制了出来。

特制测量觇标的问世,使测绘人员看到了成功精确测珠峰高程数据的曙光。总参测绘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商定,由49名测绘人员组成测绘分队。

这49名测绘官兵和测绘工作者,都从未受过登山专门训练,要到海拔5000多米至8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的各个地段去测量,最难对付的就是缺氧问题。英国的一位高原专家曾定论:“海拔5000米以上则是生命的禁区。”

49名测绘官兵和测绘工作者

到能不能上到海拔6000米、7000米、8000米地段，谁也无法预先判定。只好与登山队员一起攀登海拔5347米、比高为1700多米的哲蚌山，进行适应性锻炼。

适应性锻炼结束，测绘官兵和测绘工作者，基本上都是合格者，人人都喜笑颜开，激动不已。于3月1日打前站的同志在王玉琨带领下，乘车离开拉萨，到珠峰脚下海拔5000米的绒布寺建立了登山大本营。

他们到达绒布寺的第三天，发现这里紫外线特别强烈，人人脸部都变得黧黑黧黑，一层一层地脱皮，不少人嘴唇上还起了泡、溃烂。最使人发怵的是重度缺氧后的高原反应症，头痛、恶心、猛喘气。但所有同志都是这样忍受着高山反应争分夺秒地作准备，到3月8日，建立大本营的工作就基本结束了。绒布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座由50

多个棉篷和大大小小的其它帐篷组成的帐篷城。

3月8日，登山队大军乘车从拉萨市浩浩荡荡出发了。当天到达定日（县名），这是测绘官兵和测绘工作者按照“1956黄海高程系统”，把青岛水准原点引伸到青藏高原珠峰脚下的最后一个点位。

青岛水准原点——珠峰脚下的定日，相距一万多公里。

飞机要飞行7个小时左右！

火车要行驶8天8夜左右！

汽车要开上30天左右！

测绘兵和测绘工作者靠的是两条腿！他们在每几十米或百十米的距离设一个站，每个站要测两遍，等于是步行两万多里。

现在大伙看到了定日这个点位，心里觉得格外亲切，路途辛劳全忘了。找到了水准和重力起测点，为顺利开展测量珠峰打响了第一炮。

绒布寺是整个登山、科学考察、测绘人员的大本营，但要圆满完成珠穆朗玛峰的高程测量任务，还要建立前沿测绘指挥所。“前指”建在哪里？经过勘察，发现珠峰峰顶向下延伸有三大冰川（东绒布冰川、中绒布冰川、西绒布冰川）。这三大冰川再向下延伸有个汇合处，测绘分队不管进入哪个测区，那汇合处都是必经之路。于是，“前指”就设在海拔5400米的三大冰川的汇合处。

别看“前指”比大本营才高400米，气候、地形却更为恶劣。3月12日，王玉琨率领黄诗全、次仁顿珠、郁期青等几位同志到达“前指”后，简直像进入了冰的世界，一瞅温度计，好家伙，零下30摄氏度，每个人的手脚都麻木了，大家从走路、搬运、到搭小帐篷，全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你想快也快不起来，这才真叫人心有余而力不足。



高原弹唱



▲测绘小组在营地进行测绘准备

手脚不利索，可时间跑得似乎比内地还要快。帐篷刚搭完，夕阳就西沉了。没有一个人想吃饭，也没有一个人愿做饭，都走进了帐篷、钻进了鸭绒袋。说是睡谁也睡不着，说不睡又都躺着，闭着眼。帐篷被大风呼呼啦啦吹打着，响了一夜，他们就这么闭着眼听了一夜。天刚破晓时，黄诗全想解大手，他走出帐篷刚半分钟就提着裤子钻进了帐篷。不知是谁问了一句，“这么神速？”黄诗全苦笑着说：“我扯下裤子刚蹲下，一阵冷风刮来，就像几十根针扎屁股，我可经不住那种考验……”

黄诗全在海拔5400米的营地遇到这点小麻烦，与高山缺氧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人缺氧的难受劲儿，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王玉琨概括得好：“这叫全方位考验”。可不！天冷；滴水成冰。风大；昼夜呼啸。干燥；鼻孔出血。缺氧；头重脚轻。然而，测绘工作者不仅经受住了“全方位考验”，而且只用三天时间就搭起了几十顶小帐篷，还在凹凸不平的山坡上整出一块10米见方的小平坝，支起一顶特大棉帐篷，既是测绘分队办公、开会的场所，又是往来

于三大冰川的登山队员的休息室、茶水站。攀登珠峰的时间迫在眉睫，从3月15日开始，测绘分队的领导就带领大伙儿将仪器装备、粮草炊具等物资装车搬运。“前指”所在地离汽车停下的地方虽然不足一百米，可都是五六十度的陡坡，物资只得用人扛上来，这在内地是举手之劳，而在这世界屋脊就是地地道道的艰巨任务了。好几吨的物资搬上测绘前沿指挥所，测绘分队的同志们也一个个倒在帐篷里不想起来了。

3月21日，测绘分队领导又作了一次简短的动员，就按原先所分的六个测绘作业组（天文、重力、三角、物理测距、调绘、水准）下达了任务，分发了仪器、帐篷、炊具和食品。然后，各个测绘作业组奔赴各个冰川安营扎寨、伺机作业。

头三天他们是一步三喘往着拐棍向上攀登。第四天，大伙儿在珠峰半山腰、海拔6000米的营地搭起帐篷，刚睡不久，风声大作。在这狂风呼啸声中，只听得一阵阵凄苦的声音，像是马嘶，像是狼嚎，像是洪水冲垮堤坝后人们在逃难中的呼救、哭喊。人常说海洋是无风三尺

浪，却不知世界屋脊上有风就有三分狂。一顶顶帐篷摇摇晃晃、噼啦作响。王玉琨和战友们深夜多次起来加固固定帐篷的冰锥，紧拉绳索，才幸免吹倒。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王玉琨钻出了帐篷，“哇！”外头什么也瞧不见。世界变得太小了，面前的几顶帐篷都模糊不清。“测绘餐厅”已被雪埋了大半截，饭做不成了，大伙儿就集中到王

玉琨所在的帐篷里吃“北京糌粑”（一种以豆粉为主制作的压缩干粮，藏胞称之为北京糌粑）。大家啃着、嚼着，面对面瞅，突然笑了起来，原来是互相发现了真面目。自从进山之后，每个同志从没理过发、刮过胡子，也很少有人洗脸。以往天天是晴天，每天都在马不停蹄地工作，谁也没留神。眼下正在帐篷里面面相视，互相瞅见的一张张已被紫外线强烈灼伤的脸上，都是黑一块、紫一块、白一块，还起了不少水泡，掉了几层皮，模样已变、面目全非。要不是互相很熟悉，靠着平时掌握的“轮廓特征”，很难辨清谁是谁。

第二天早晨，风势和雪没有减弱，王玉琨从帐篷里钻出来，猛地发现一个“雪人”站在面前。他细细端详才“呀”的一声认出，原来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史学增。

老史对王玉琨拱手道：“老兄，我走投无路，只得投奔三爷来了！”

老史为了抓拍登山队上下山的真实镜头，独自在海拔5900米处的路边搭起了一顶小帐篷。机会来了，前几天他悄悄拍下了第一次适应性登山的精彩场面，可天公不给情面，呼风唤雪，登山队员们奉命下

撤了，他又开机抓拍。为了等候登山队员的再次到来，他坚持就地栖身，竟成了“孤胆英雄”。眼下王玉琨眼见身背摄影机的史学增，衣服上，帽子上全都沾满了雪花，眉毛、胡子上也都结满了冰碴，整个脸庞像似一团凸凹不平的冰块。王玉琨不禁鼻子一酸，两滴热泪夺眶而出，猛地扑上去，与老史紧紧拥抱在一起。

王玉琨把史学增迎进帐篷，帮老史掸净身上的雪粉；又先搓热自己的手掌，再去揉摩老史发僵的脸和耳朵。老史“还阳”发笑时，王玉琨趁着风势稍小的良机，抓起一块冰镐就冲出帐篷，在一块巨石下东刨西挖，他记得登山运动员在前几天进行适应性登峰训练时，曾在此地与测绘官兵小憩过，可能留下有食品。冰雪似乎在阻挠他，他越挖越硬，他用的劲越大，从那邦邦硬的冰块上弹回的力量也更大，他的虎口震得连心都疼。挖呀、刨呀，终于挖到了一小袋冻成冰疙瘩的牛肉干。

“老史，有吃的了！”王玉琨手拿牛肉干冲进了帐篷。

连续四天的暴风雪，在3月27日上午停了。测绘勇士们纷纷拥出帐篷，一幅雪地胜景映入了他们的眼帘，使他们如痴如醉：

头顶的珠穆朗玛峰高耸入云，远处冰峰林立，数十条冰川纵横倾泻，像玉龙在珠峰四周飞舞，真是气势磅礴。近处的冰塔顶天立地，互相依偎，像守卫在冰雪世界的哨兵，令人肃然起敬。在测绘勇士帐篷的周围，神话般的水晶宫在云雾中晶莹闪烁，似琼楼玉宇，又似仙山幻影。

为珠峰正名，为祖国争光的高度责任感，又一次在测绘官兵和测绘工作者的心头油然而生，他们决心把被暴风雪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王玉琨率领战友们身背行李、仪器，又步履维艰地向预定的测绘点位攀

去……

正当王玉琨和战友们奋力精测各个点位之间距离和其它数据时，测绘分队的前沿指挥所根据整个登山的部署，拟提前组织人员完成北坳的重力测量任务。这项任务不仅对精确测

量珠峰的高程数据有举足轻重的价值，而且还将对我国发展航天事业发挥重大作用。“前指”通过无线电话把王玉琨召回了指挥所。

王玉琨在“前指”了解到，前几天的那场暴风雪，驻扎在西绒布的一个导线组，一个三角组连续有36个小时没吃过一口热饭，没喝过一口热水，可他们在暴风雪过后又继续上山工作了；天文二组的顿珠多吉患了感冒全身发烧，还只身一人在一座雪山上露宿了两夜，胜利完成了为对面山上观测方位角司光的任务；三角二组组长刘三发累得尿血仍继续带领同志们观测。天文组登上海拔6350米的点位上测量时，藏族战士白玛严重脱肛，滑出的部分已经磨得又红又肿，医生说：“真是条硬汉子！”

4月4日，“北坳小组”成立了。指定副分队长陈顺斌同志带队，组员有6人：王玉琨、普布、大扎西、徐东生、吴泉源、郁期青。

4月6日，是北坳小组出征的第一天。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从18、



▲记者访问当年截去四个手指的普布

19世纪开始，陆续有一些国家的探险家、登山队也想从北坳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探测奥秘。据记载，从1921年至1938年，英国的探险家就曾先后7次试图从北坳攀登珠峰，但都未到达北坳就遭到了失败，有的还丧失了生命。因此，他们把北坳称作“死亡的路线”。

洋人把从北坳登珠峰，说得太玄乎了一点，可事实上，别说是上顶峰，就是登上海拔7050米的北坳，也是一件不易之事。对此，登山队领导专门派彭树力教练给北坳小组7人作技术指导，并与他们结伴同行，做他们的“保护人”。彭教练已有四十五六岁，骨瘦如柴，可一上雪山，攀、爬、登、跳、滚、滑、钻、挪，动作娴熟，手脚轻盈。北坳小组加上彭教练这8个人都是用胸绳一个连在一起攀登的，这样登峰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万一有一个人一脚踩不稳，一滑就是很远，同时其他同志得赶快叉开马步，将冰镐砸入冰内，否则，一摔就是一大串。北坳的下方，是一块约400米高的大

冰坡，就像是斜插在两峰之间的一块大镜面，坚硬而又光滑，冰坡上还分布着众多大小不一的冰裂缝，当他们一行登到大冰坡的中部时，王玉琨的脚未踩稳，身子一歪，眼看就要掉进冰窟窿；走在他前面的彭教练正巧回头见到这情景。飞快地将手中的冰镐插进了冰层内，同时又快速收拉尼龙绳，用劲一拽，王玉琨得救了。据说，登山队副政委邬宗岳与登山运动员们结伴向海拔86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冲刺时，为了留下海拔8200米以上高度的运动员们与大自然搏斗的珍贵镜头，邬宗岳毅然解开结组绳，走在队伍后拍摄电影，不幸坠落深渊壮烈牺牲。因此，所有参加登山的同志们都看清了结组绳的威力，称之为“救命绳”。

北坳小组登上海拔7000米处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感到氧气奇缺。从海拔6500米营地到胜利登上海拔7050米的北坳，这550米就花费了整整5个多小时。他们精确测量了北坳的重力数据，并在原来用飞机拍摄的航空片上精确地刺定了北坳的点位。此时，大家已精疲力竭了。陈顺斌与彭教练商量后，撤到海拔6500米的营地宿营。

夜幕已经垂下，晚霞逐渐变紫，变灰，变黑，终于遁去。高耸入云的冰山上，孤零零地支着两顶小帐篷，陈顺斌和彭教练、王玉琨正在商量谁去冲刺海拔7790米的珠峰第二道难关——高空风口。

“我和东生去！”大伙儿一瞧，是普布。刚才，大家发现普布与徐东生用藏语在聊天，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同志们从他俩的表情可以看出是要争取肩负重担。

测绘分队的领导和同志们都清楚，选拔来的10名藏族战士的适应能力都比汉族同志要强。尤其是1947年3月15日出生在藏南贡嘎县江当区的普布，父母都是农奴。

翌日凌晨，普布和徐东生与登

山队员一起，每四个人结成一组出发了。他们登上海拔7200米以上地段后，训练有素的登山队员都感到又进入了一个难关，浑身的肌肉特别紧张，嗓子冒烟，鼻腔被什么塞住似的，异常憋气。普布和徐东生更是觉得胸闷、头胀，两条腿就像绑上百来斤铅，迈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极度的缺氧，使他俩的脸憋成了酱紫色，嘴唇紫得吓人。到了海拔7750米处时，徐东生确实没有一丝攀登之力了。可他看到普布在一块冰板上连续三次坠滑下来时，他使尽全身力气用两手把普布的两只脚放在自己肩膀上，紧闭双眼，咬紧牙关，靠意志迸发的力量，把普布顶了上去。

普布登上海拔7790米的高空风口后，8级多的大风刮得他站不起身，头晕，眼昏，浑身软得像团棉花。只能闭上双眼卧在雪地上。这时，普布想起战友冯旭东，为了检查一个觇标是否移位，他在冰雪中咬牙爬行攀登1000多米，中途晕倒了，醒过来又爬，一直爬到海拔6300米的一个高峰，把移位三厘米的一个觇标修正过来，保证了测绘的精度……

想到战友无私无畏的精神，普布猛地从雪地里爬了起来，架起了重力仪进行测量。使普布恼火的是，戴着鸭绒手套的右手在调节仪器时显得非常笨拙，索性甩掉右手的鸭绒手套，冒着摄氏零下40多度的低温，连续工作一个多小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测量海拔7790米这样最高点重力值的测绘人员。然而，他下山回到大本营后，右手的4个指头已完全变黑。5月2日，胡志良专程把普布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做了4指截指手术，并向攀登珠峰的总指挥、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和政委天宝报告。

创造珠峰高程测量世界记录的关键是，必须把觇标竖在珠峰顶上，这也是我国登山运动员登上珠峰的

明显标志。对此，陈司令员和天宝政委通过无线电台当即指示登山队大本营，一定要克服各种困难，在珠峰顶上竖起觇标！

5月17日，登山队党委在绒布寺大本营举行了隆重的向登山运动员授国旗和觇标的仪式。

难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公元1975年5月27日北京时间14时30分，中国登山队的9名男女运动员：副队长、女运动员潘多，突击队党支部书记、男运动员索南罗布，男运动员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钦，带着全国人民的重托，从突击营地出发，经过6个半小时的艰苦奋战，终于登上了地球之巅。他们用超人的意志和毅力，不仅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最高处，还把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队”字样的3米高的金属测量觇标竖了起来。这时，突然一块浓云罩住了顶峰，登山运动员、五星红旗和金属觇标都从测绘勇士的仪器里消失了。

18时30分，浓云忽然散开，露出了又深又蓝的天空。红色觇标终于又映入了测绘勇士的眼帘。坚守在海拔5600米至6300米处的10个三角点上的测绘官兵和测绘工作者同时进行了紧张的观测，胜利地完成了测量珠峰平面位置和高程的测量任务，取得了完整的测量数据。对所得的数据进行了严密的计算和归算后，扣除了珠峰顶端覆雪深度，求得以青岛验潮站黄海平均海面为基准的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的精确数据！

（责任编辑：刘文）

胡宗南包围延安受挫记

● 立之

四十年代初，为了配合“皖南事变”，胡宗南纠集他的谋士们计议，炮制了一个“警备班计划”。他们希望像神话故事中说的“羊角喇叭吹塌耶利戈城”一样，满以为喃喃念咒，就可摧毁延安圣地。

原来，胡宗南部队驻扎西北，并不是为了抗战，它唯一的任务是监视、封锁、包围延安，准备选择适当的时候，乘机进扑延安。

在西安东仓门，有一个代号叫“效忠里一号”的高级特务机构，这是胡宗南亲自主持的反共谍报组织——一座老式院子，很僻静，室内陈设也俭朴。屋子里自天花板到墙根，满满地直悬着军用地图，在那十万分之一的细密的图纸上，用大头针插上了不少红黄蓝绿紫的小三角旗幡，标志着兵种番号，敌我态势。这群胡宗南的谋士，没一个面貌堂皇的：周天戮，浑名纸老虎，是一个满嘴多端的策士，佻傥身材，深度近视，他叛党后曾充任过康泽、贺衷寒的狗头军师，专为反共献计献策。1940年初又改投胡宗南。梁干乔，酒色之徒，常借酒装疯，因而有梁疯子绰号；他也是叛党后在康泽、戴笠等处助纣为虐，因屡次企图窃据兵符不得逞，才改投胡宗南。蒋坚忍，个性乖戾，刚愎不群，容貌铁青，面无人色，态度冷峻得令人寒冽，他负责总管“集中营”。葛武繁，是一赌棍，经常输红了眼就歪着脑袋寻衅打架，是胡宗南麾下的最粗鲁的一条棍子。徐先麟，胡的机要秘书，外貌谦卑，唯唯诺诺，能于酬酢中赢得人人好感。唐忍安，原是康泽、顾希

平等特务头子的帮手，随顾到西北后改投胡宗南。唐为人奸诈，满脸巧笑，一身肥膘，说话时不停地眨眼睛，令人莫测高深，浑名“笑面胖虎”。这群人每天早晨在“效忠里一号”汇报一次，决定各项反动措施。

所谓“警备班计划”，内容大意是纠合一群地主富农子弟，广招农村惰民、乡镇流痞，通过短期军训，组织以“班”为单位的武装力量。以这个“班”替代正规军驻守围困延安的碉堡。装备也特殊，像戏台上扮演兵勇的角儿一样：头扎毛巾，前额上扎一个结；身穿蓝布背心，前胸和后背都有一大白色圆块，中写一粗大的“警”字。班长像巫师一样肩颈上披一长长的黄色布条。按梁干乔疯狂的设想：“警备班”将是一支超越德意法西斯的党卫军、褐衫队的强大的反共别动队，是封锁包围攻占延安的主力部队。可是，胡宗南由于梁干乔原是中共叛徒，又有康泽、戴笠等私下嘱咐，心里有个框框；对梁干乔的“警备班”预以制约。给的武器只是单刀、木棍、梭镖、手榴弹和少数破枪，据说是精神武器第一，那就是“反共不怕死，杀敌保家乡”这两句咒语。“警备班”的任务是：封锁、包围、盘查、逮捕、偷袭、突击……凡属国统区去延安特区的人和物，一律查究或扣押，青年学生更是特别注目的对象，一经拦截，就由“班”押送集中营拘禁。

“警备班计划”由胡宗南密呈蒋介石，说明配合“皖南事变”的意图。很快，重庆“侍从室”复电批准，指令就在西安成立“陕西省民众动

员总指挥部”，实施四面包围延安计划。这样，这个在西北反共的最高行动机构，终于公开露面。

“总指挥部”的规模，比以往的“西北行营”和“战区司令部”更庞大，性质上是兼有军事谍报、武装突击、吹牛说谎、造谣生事的全套配备。人员编制，也打破往日由单纯黄埔军统垄断包办，这一次又搭配CC派的政客和党棍子们串联，像是由三教九流编成的一张网。

“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区指挥部”，分东南西北四面，严密封锁包围。办法是：围绕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构筑碉堡，用“警备班”驻守；堡区内居民则用联保连坐的保甲法控制；行政上，由CC派让出了部分党政权限。“区指挥部”自县团级以下增设了专职反共的副级人员，例如，“县督导员”、“副乡长”、“副保长”等等。

“总部”日常工作只做两件事：第一是，每周定期召开一次党政军警宪特的联席会议；主要情报来源是“效忠里一号”徐先麟的综合汇报，军统西安站长李人士的特务跟踪报告，省党部中统特务邮电检查的报告，宪兵特高课的枝枝节节情报等等。这是风雨无阻的大事。第二是，由谍报科长周光主持的对派遣特务在延安活动的电讯汇集。这批潜伏延安的特务，是1940年初由西北联大毕业的“优秀生”，经梁干乔以战区政治部名义培训后，假冒邮电人员，派驻延安等地活动。周光经常套上耳机，趴在收发台上接收电讯，然后向梁干乔密报。

“区指挥部”的重点，以延安南面的“洛洛区指挥部”为首，它受辖耀县、淳化、洛川等地；梁干乔兼指挥官，驻留耀县。它利用前哨回族部队“暂编骑兵第二师”与洛川解放军359旅王震将军对垒。东面是“商同区指挥部”，辖商县、澄城、大荔等县；蒋坚忍兼指挥官，驻大荔，着力于经济封锁。北面是“榆林区指挥部”，辖地为榆林、米脂、绥德等县；名义上由邓宝珊兼指挥官，实际上邓是胸有甲兵的老军人，深沉机智，在胡宗南的压力下他虚与委蛇，并未履行封锁包围任务。西面是“陇东区指挥部”，属甘肃省境，辖宁县、庆阳等县；因为跨省区，“指挥官”人选不能由胡宗南指派，必须商请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会商遴选。

四面包围延安是胡宗南的梦想，但实际只是两面。除了“洛洛区”梁干乔，“商同区”蒋坚忍；“榆林区”的邓宝珊是鞭长莫及，碍难指挥。胡宗南急切地寄希望于“陇东区”。

陇东地区是逶迤山脉，沙丘土堡，崎岖难行，地形变幻，风沙无时，实在无法封锁。假使胡宗南军在西安延安间封锁了通道，陇东区的羊肠小路仍可转运物资，虽是越沟跨涧的极其艰苦，但毕竟是为延安敞开的一扇门。因此，胡宗南不愿网开一面，想方设法要来堵这道缺口。

胡宗南推荐的“陇东区指挥官”名单，兰州的谷正伦和朱绍良不明确表态，他们只互相谦逊地请对方“酌定”，其实就是不愿意为胡宗南这个小字辈火中取栗。这时候，西安的“总部”又因人事磨擦爆发了一场狗咬狗的争吵，更引起胡宗南想借陇东地区环节来缓解内部矛盾。

“总部”人员编制是军统与CC，各占一半；但“区部”基层人员，均由军统系包办。特别是梁干乔急功好利，与当地县级人员即刻短兵相接。凑巧有一淳化县长叫冷刚

锋，他仗恃是CC骨干，又与彭昭贤（省政府秘书长兼“总指挥部副总参谋长”）是乡亲好友，因此对梁干乔措施坚决反抗。梁干乔急切地强行派下了“县督导员”李在冰和“副乡长”“副保长”等多人，冷刚锋大为不满，觉得是侵犯了县级权益，必须设法抵制。由于冷县长的唆使暗示，某一黑夜，一个姓罗的乡长率乡丁若干人，伪装是共产党，乘黑枪杀了才下放的一个副保长王某。这意味着逼迫外来的“县督导员”“副乡长”等都要撤退，并取消“警备班计划”。梁干乔桀骜的疯狂性格大肆咆哮，第二天立即报复，派警备班逮捕那批假共产党，搜缴了乡公所的枪械，把乡长等为首的两三个人拷打一顿，然后送西安法院究办。这件事促使胡宗南要加快“一体反共”来缓解内部矛盾。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地下人员掌握了情况。

通过多种渠道，延安驻西安的代表王××找到陆××，要他尽快赶往兰州，探明情况，设法阻止陇东区建立封锁包围线，并破败其“警备班计划”。（陆于1937年抗战初，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奉周恩来指示潜在国民党政府内工作）陆奉命到了兰州，利用公开的官职（军委会顾问处驻兰州办事处主任）接触了两位地方首脑：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甘肃省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经过多次闲谈，了解了这两个一品官之间的矛盾和他们的忧虑。关于陇东区的问题尚悬而未决，他们都不愿被胡宗南牵着鼻子走。这一点，给了中共地下人员以充裕的时间，完全可以设想出挫败胡宗南的方案了。不久，陆××又兼任了甘肃省府首席参事和第八战区政治部设计委员。

胡宗南挟天子令诸侯，通过重庆侍从室下达的训令是：“着即克日组建陇东区指挥部，受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节制指挥……一体反

共……”等语。这是以蒋中正名义签署的命令，自然不得违抗。按理说，朱绍良、谷正伦原是杀人不眨眼的大屠夫，特别是谷正伦当年在南京任宪兵司令时，雨花台下不知杀害了多少无辜和革命烈士，为什么四十年代他们放下屠刀，彼此都不愿配合胡宗南“一体反共”？对于遴选“区指挥官”朱谷之间都互相“谦让”，请对方“酌定”，其实都不愿成立什么“区指挥部”，怕扛木梢。

陆××游说朱、谷，力陈利害，介绍了陕西省内部纠纷的杀人事件，结合陇东区地形难以封锁等等情况，解说不能成立“区指挥部”的理由，并说明“警备班计划”会酿成少数民族闹事，扩大械斗仇杀风潮……这些见解正迎合了两个巨头的心意。他们心里不安的事终于稳定了。谷正伦从一摞积压的卷宗中抽出底层的红色（机密）案卷，找出一份“绝密”电令，批了几行字交给陆××说：“时间拖久了不好，你看怎么回复上去罢。”批的字句是“请陆参事赵处长审议火速呈复。”

这样，中共地下人员就完全掌握了延安的西面通道。可以进一步摧毁其他三面的包围圈了。胡宗南妄费心地拼凑反共阵线，地下党人凭一纸文书，就可不战而胜地来挫败胡宗南的罪恶阴谋。

所谓“赵处长”，就是胡宗南保荐名单中的赵龙文。原是从戴笠军统中转到胡宗南情报处的，1940年初任甘肃省社会处长。本来，他如果充任反共的“区指挥官”，可算是最佳人选，因他与梁干乔之流原是一丘之貉，早年在戴笠部下参与沪杭公路部署暗杀史量才有“功”，因而曾被戴笠保送英国学习警探工作。但这时候的“赵处长”即将变成“赵厅长”，他已不愿再涉足那蛮荒贫瘠的沙丘去演唱反共的开锣戏，因此赵龙文对陆参事拱手说：“一切请老兄偏劳了！”（下接61页）

川汉铁路股票 冲垮大清王朝的



▲盛宣怀



股票，它能使你顷刻间成为当代石崇，也能使你一辈子积蓄的金山化为乌有。这张小小的魔纸，还竟把一个王朝掀翻。

1900年，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岸，耀武扬威地坐着火车，沿津通铁路风驰电掣地冲向北京城时，义和团用血肉之躯，在廊坊与机关枪打了一仗，赢得了一天的时间。老佛爷顾不上尊颜和体面，扮作村妇模样，在骡车拼命的颠簸下，仓皇逃离紫禁城，一路乞食，向西奔去。她坐在怀来县的土庙中，愤愤不平地咒骂着手下无数的大臣不由得想起了北洋大臣李鸿章。1881年，李鸿章力排众议，坚持修成第一条唐山—胥各庄小铁路时，很多大臣骂他为“汉奸”，数典忘祖，引进外国人的洋玩意儿，震动皇陵，使樊篱尽撤。当时，慈禧太后也觉得反对者言之有理。现在她不断揉着酸痛不已的腰腿时，认为还是火车比骡车跑得快。回宫不久，便找督办铁路的大臣盛宣怀，给她弄了辆外国进口的“龙车”。

清廷最高统治者玩起“龙车”，于是各省纷纷要求修铁路。

1903年，清政府商部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24条，明文规定：准允华洋官商集股，建筑铁路。换句话说，即允许用集资、合资、独资等方法修建铁路。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官办的、商办的，也有皮包公司。公司出现一种新的洋玩意儿——股票又被引进中国。当英国伦敦的股票市场被外

国商人们玩得不能再熟的时候，中国人也开始发行铁路股票了。

1907年，成都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发行了川汉铁路股票。股票套色彩印，很是精美。（如图）

川汉铁路总公司，原为官办，是四川总督锡良1903年上奏朝廷恳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而设立的。自古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与外界沟通，是全体川民梦寐以求的心愿。总公司成立后，当即制定了先筑四川省铁路，从成都经重庆再到万县，打开夔门锁钥，沿三峡而宜昌，是为第一段。然后再从宜昌经荆门至襄阳转广水，与京汉铁路接轨，是为川汉铁路。

单说从成都至宜昌一段铁路，预算需白花花的银子约5000多万两，而四川全省岁入不过1600万两，不吃不喝，砸锅卖铁，累得吐血也不够。川汉铁路公司动了脑筋儿，决定向民间集资，发行股票，让四川人也玩把洋玩意儿。什么盐茶股、土药（鸦片）股、租谷股，即按租抽谷，“凡完收租谷十石以上者，按所收谷数提出三成，照市价折银，名曰租谷。”最后，平民百姓斗米只鸡都需入股，虽于人们苦不堪言，但心怀希望，赔上身家性命，换得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官办铁路公司,大权操纵于官,终日请客送礼,吃花酒,听堂会,贪污、挥霍,搞得乌烟瘴气,实在不成体统。1907年,川督锡良奏请川汉铁路公司改成“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大肆发行股票,到1911年,川汉铁路股票的发行量接在一起,早已接到宜昌;修成的铁路“已成通车运料者三十余里”。公司共收股本146百万两,其中71%以上为强行摊派的租股。“共支出各项费用410余万两”,“存材料约值60万余两,内有未付价者11万余两,购地亩约值19万余两”,其余都被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龟儿子”贪污了。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数年来,“寸线未经勘定,一事未有端倪”,引起人民普遍反感,也给朝廷出卖铁路主权一个充足的理由。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对铁路主权的斗争中,像野狗抢腐肉,谁也不肯松口。

1909年6月,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谋借洋款筑路,与英、德、法三国银团议定借款550万英镑草签合同。美国不甘心被排斥在借款之外,要求借粤汉、川汉两路借款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三国银团只同意美国借款为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总数的四分之一。美国转而要挟清政府,美国总统塔夫脱咆哮说:“若美国政府的合理要求被摒弃,则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清政府吓得手足无措,外交大臣梁敦彦提出增加借款总数为600万英镑,以便增加美国的借款。摄政载沣在给塔夫脱总统的电报中讨好地说:“关于借款问题,为答谢盛意,已命外务部与贵国驻京代办会商,期能获致适当决定。”

清政府在对外出卖铁路主权的同时,于1911年1月任命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多次参预过铁路借款,是个卖国老手。为了将川汉、粤汉铁路建筑权出卖给四国银

行团,清政府决定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同年4月9日,时溥仪才三岁,正坐在龙椅上戏耍,其父摄政王载津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向全国颁发一道上谕:“……朝廷每念边防,取劳宵旰,欲资控御,唯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谄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以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得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其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迨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生耗……用特明白晓喻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朝廷一道诏书,使川汉铁路主权收归国有,复又以盛宣怀出面,与英法德美四国银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额为600万英镑,四国银团享有湖南、湖北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及其它特权,清政府以两湖的厘金、盐税为担保。这样,原有川汉、粤汉铁路股票不再上市,成为不值一钱的废纸。清廷的卖国政策,将小民的数十年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冲得干干净净,也将绅商学生赤赤诚诚的爱国心,富国志,化作一杯清水。

于是,四川省铁路公司股东们集合在一起放声痛哭,哭得人心酸心疼。

川汉铁路总公司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会长是四川省諮议局议长蒲殿俊,副会长为罗纶。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张澜

(字表方)先生,也是保路同志会的重要成员。

8月24日下午,成都的保路同志会召开临时同志大会,会上散发的传单号召人们:“政府抢路劫权,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要求收回成命。”

于是,各店铺陆续上起门板,响应罢市号召。门板上都贴着光绪皇帝的牌位,两旁有“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的光绪帝遗训。

9月7日,四川人民和平的抗议活动惨遭镇压。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以议事为名,在督署拘捕了保路同志会的蒲殿俊、罗纶、张澜、邓孝可等人。各街绅商百姓得知后,纷纷头顶光绪帝神位,前往督署外广场,黑压压跪倒一大片,“哭号惨泣”,哀求赵尔丰释放保路会代表。赵尔丰即令士兵放快枪,当场打死群众几十人,伤者无算,“流血满地,染红先皇神牌,惨不忍睹。赵尔丰不让人收尸,曝晒三日,“死者犹抱先皇神牌。以至成都“阖城号泣,动地于哀。”

人民的血不会白流,只会激起更多的人反抗之心。很快,各地的保路同志和民团手持武器,与官兵接仗。哥老会等会党也乘机攻城。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会党更龙剑鸣等跑到成都南门外,用木板削成片,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再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江中。几百个“水电报”漂向下游,各州县的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向成都进发,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变为武装起义。

赵尔丰向朝廷告急,朝廷遂派湖北新军入川协助镇压,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10月10日,武昌起义乘势爆发,清廷忽喇喇,260多年的江山哄然垮台了,中国从此进入中华民国,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责任编辑:刘文)



长春真人 万里传道 成吉思汗

●纪 流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的军事力量处于极盛时期，他的版图已扩大到中亚南俄。

这年，正在西征路上的成吉思汗已58岁，他发现自己开始年迈体衰，急于寻觅秘方奇术，使自己长生不老。他听说中原有个长春真人会长生之术，立刻派近臣刘仲禄迎聘。

长春真人叫邱处机，是个爱国者，在大好河山四分五裂的情况下，他看到南宋已腐败透顶，金廷正濒临崩溃，只有成吉思汗能够结束战乱的局面。这个原只有宿卫80人，驸马72匹的小部落长，经历20年的吞并战争，已成为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大汗，只有他能使神州再获和平统一。所以当成吉思汗的钦差刘仲禄来到他家乡登州时，他毫不犹豫地欣然前往。

长春真人是全真道教龙门派的领袖，他以儒释道学说精髓，充实改革道教，使道教洗却“三分妖气”，独树一帜。南宋、金、元各个政府都对他竞相征聘，视为国师。

已年逾七旬的长春真人，选了18名弟子同行。刘仲禄为真人的安全，一路调兵遣将，攻深州，下武邑，打通了北上道路。真人到达燕京后，暂不能走，因刘仲禄还要停下来，给成吉思汗挑选处女。邱处机立即上表陈情：说春秋时，齐景公为了削弱鲁国。派人挑选美女80人送给鲁定公。定公和国相季氏朝欢暮乐，朝政日衰，孔子为此指责定公：君相沉溺声色，国家怎能勉力图强呢？”遂弃官出走。终使成吉思汗罢选。

真人一行刚出居庸关，夜遇强盗。强悍的盗首原想将他们全部砍杀，听说是长春真人，立刻跪在道边礼送。长春真人的影响如此之大，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过翠屏山到野孤岭。这儿是成吉思汗打败金将达实的战场。邱处机望着累累白骨，不寒而栗。他在给燕京道友寄书说：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穷极漏洩残喘在，早教生命得消忧。表达了他对生灵涂炭的忧伤。

过阿局河，发生了日全蚀。邱氏

以孔颖达《春秋疏》所说“月体映日，则日蚀”的道理，晓喻传众，一扫“天狗吃日”的谬说。夏至这一天，他竖起八尺之竿测量了日影，得三尺六七寸。后代经专家推算，该地当在北纬47°21′，东经107°21′。在图拉河向南转弯处。

他们在准噶尔盆地东侧，穿越博尔腾戈壁，这一带俗名白骨甸，滴水皆无，寸草不生。该地石子多黑色，热天泥土晒得冒烟，石子会炸裂。不久前，成吉思汗消灭太阳罕的部队就是在这里。

由于长途劳累，大量马牛得了病。他们弃置生病的牛马，夜行晓宿，终于走出了大沙漠。

为了迎接真人，成吉思汗派遣次子察合台，领军队消灭了沿途的叛民，修复了舟船，造好桥梁。但，前面的道路被大雪覆盖，无法通行，只得驻足邪米思干城。

这是座成吉思汗刚打下不久的城堡，守军三万皆被杀尽，俘民丁三万充役，余民五万令其献金二十万赎罪。城内万户萧疏，城外叛乱不



▲成吉思汗在西征的行军途中

断，真人随行弟子惊惧不安。真人安抚说：行善者与作恶者不是一条路，他们不会谋害我们这些道士的。

1222年春天，宣差带来了成吉思汗的圣旨：“真人来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辛劳已极。今朕已回，急欲闻道，无倦迎我（休息解乏之后请来行宫）”，又命令地方军事长官，以精锐部队保护真人过铁门关。宣差告诉他，向南进发，过大雪山，积雪甚厚，用马鞭鞭杆向雪中插去，尚不及雪深之半……

邱处机留下部分弟子于邪米思汗，只带五六个弟子同行，过碣石城、铁门关。途中，山势险峻。他们在一处难行的山弯处遇到山崩，隆隆的巨响震耳欲聋，滚落的山石，顷刻间中断了河流，头顶上飞过的巨石虽多，幸好无人负伤。路上又遇多处陡崖，车辆无法通行，士兵们用长绳拉车上坡，下山时缚住车轮，慢慢下放，艰难地跋涉过无数的险路隘关。

沿途，真人见元军屠杀非常惨酷，如破沙木尔城，把斩杀的男女头

颅堆成两座小山示众。

农历四月五日，终于到达阿富汗兴都库什山的雪山行宫，成吉思汗设盛宴迎迓。这位还欲挥师西向的统帅，迫不及待地问：“真人远来，有什么长生不老的药物送给我吗？”邱机处答道：“有保健防病的方法，而无长生的药物。”成吉思汗夸奖他诚实不欺。在自己宝帐东侧设两座帐棚。让邱机处一行人居住。

将到设坛问道的时间，由于花刺子模的三子札兰丁打败了蒙古的一支部队，成吉思汗决定御驾亲征。长春真人师徒只得返回邪米思干。当他们回到该城之后，城外又有两千户居民新叛，夜夜举着火把在城墙外边闹事。

邱处机西行三万里，无处不见成吉思汗滥杀后酿成民族的叛乱。他痛心已极，待成吉思汗打败札兰丁之后，邱处机返回行宫当面向成吉思汗提出了罢远征的建议。成吉思汗接受了他的建议，班师而还。利用途中休整，成吉思汗设坛。请邱处机论道。

长春真人在坛上说：

“道能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都是导源于道的。人们只知道天之大，不晓得道之大。我生平撇掉亲人出家，就学这个道。世俗之人眼睛看着美女，耳朵听着美妙感人的歌声，嘴巴离不开美味，思想上、感情上追逐着性爱，这样就会散掉‘气’。譬如气球，气足球就坚实，气散就变坏。

“学道之人，讲究去奢摒欲，固精守神，提高人的素质，转化为幸福、快乐，像神仙一样；愚迷之人，以酒为滋补，恣其情欲，耗其精神，损其神智，则沉沦而为鬼。

“修道之人，像推着石头上险峻的高山，一步不慎，就要前功尽弃。背离‘道’，追逐私欲者，像扔石头下陡坡，愈往下滚愈快，一瞬间就坠入深渊。世人都这么做，没有一个人觉醒。

“皇帝是天之骄子，上天不发一言，借皇帝之手而行事，要您除凶祛恶，谨慎奉行天道，以天的意志惩罚恶行，就像接替高级木匠进行木器加工，该削的削，该砍的砍；生杀于

夺之权，都操在皇帝之手……

“在人世间，皇帝应该切实地减声色，节嗜欲，使得圣体康泰，谋划长久。平民娶一个妻子，尚且损坏身体，何况天子有三宫六院。道经有云：‘不显耀可贪的事物，使人民不被惑乱，既已见到，戒之则难矣。愿陛下留心此事’。

“天地间创造了人类，人身难得，珍贵得像麒麟之角，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尊卑不同，但性命是一样可贵的。陛下修行之法，当是外修阴德，内固精神，体恤民间的疾苦，保护黎民百姓的生命，使天下的老百姓都有很大的安全感。

“神与气居于同一体中，精与髓本是一源。陛下一月静寝，不行房事，必觉神清气爽，筋骨强健。古人说：服药千朝，不如独卧一宵。譬如囊中藏金，不断地拿出贵金，不断地添换铁块。久之，黄金没有了，囊虽满，只剩下锈铁块了。服药与这有什么差别呢！

“人生寿命难得长久，正是由于人们战胜疾病、天灾、人祸不易，所以二十至三十余岁为下寿，四十至五十余岁为中寿；六十至七十余岁为上寿。陛下已到上寿之期，应该修德保身，以达到高寿。

“普天下国土不止亿兆，奇珍异宝屡屡出现，皆不如中原那高度的文明。那儿治国治人的手段、方法十分齐备。中原乃天下美地，但今天兵火相继，征战不休，逃亡流散之人，未能安置集拢。应该派了解当地情形的干练官员，去处理那儿的事务，给当地免除三年赋税，使国家军队有充足的丝绸供应，使百姓获得喘息的机会……

“修身养命之道传之尽矣，治国保民之术略陈梗概，是使用、是舍弃，在陛下之决断。过去，金国世宗皇帝（完颜雍），因色欲过度，衰惫不堪，每逢朝会，需两个太监搀扶行走，他到处寻找高明道士，访求保养的方法。也曾把我请去询问修真之

道，我就把前边的那番话，告诉了他。自此，他身体强壮，步行如故。”

传道完毕，成吉思汗说：“你以道教精义恳切教诲，我恭敬谨慎地听完了。所说的内容，都是很难做的事情；然而，怎敢不遵从仙命，勤恳去做呢！”讲道结束之后，成吉思汗命令近臣：“整理出来，留个文件，我将亲自阅读。里面还有天意未明或者道家高深学问、特别要旨，未弄清楚的再作请教。”

传道共进行了三次，都是在夜晚进行。成吉思汗命令手下人作好保密工作，不得遗失记录。他对在场的人们说：“神仙三论养生之道，我听得入神，很开窍，深得精妙。我命令你们，不许把论道内容泄漏出去。”

一路东行，成吉思汗不断向真人征询治国安邦之道。邱真人反复强调“敬天爱民”这一主旨，有问必答，切中时弊。成吉思汗封他为“神仙”，说：“神仙这些话，正合我的心意。”为了表示重视，成吉思汗召集诸王、太子及一些大臣来参加会议，会上说：“汉人尊重神仙（邱氏），就像你们敬天一样，我现在越来越心诚，愈加相信邱处机是天上派的仙人啊！”他把邱氏论道的内容，传达一遍，说：“上天派了神仙对我说了这些话，你们每个人要牢记心头！”

邱氏离开燕京已达三年，他向成吉思汗要求回归故里。皇帝说：“我已经东行了，陪我一道走行吗？”邱处机说：“让我自己先走，随意快慢，这样才便当。来的时候，汉族同胞问我，我还朝，我答三年回。如今，皇上所问诸事，答案都已进陈完毕。故再提出意见，要求早些回去。”皇帝说：“稍等三五天，太子来向我报告工作，谈些问题，悬而未决的从你这儿得了补充解答，我就放行。”他赐邱氏许多牛、马、宝物，邱处机都婉言谢绝。

成吉思汗向中原传旨：“（各）道与诸处官员每（们）：邱神仙应有的、

用于修行的道观，系逐日念诵经文之地，为天底下人们求福，为皇帝祝寿，以求万万岁者。所有大小差发赋税，都休叫缴纳。全真道教系统的应该全部免掉。对那些敲诈、嫁祸于出家人，暗中贪占捐税的人，告到有关司法部门治罪，案犯之主（谋）者，斩。”

皇上命阿里鲜为宣差，护送长春真人东还。

长春真人又穿越当时的十几个国家，跋涉了万余里，回到燕京。成吉思汗命他主管全国道教，赐北宫园（今北海公园），改住地之名为长春宫。公元1227年夏天，邱处机病逝，享年80岁。成吉思汗于同年同月终于西夏，享年66岁。

1995年《世纪》

杂志征订

《世纪》杂志由我国著名作家冰心、萧乾任编委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是一本集新闻性、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双月刊；内容丰富，栏目众多，贴近生活，富时代精神；创刊一年来，每期皆以发表鲜为人知的独家报导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世纪》杂志1995年度的征订工作即日起开始，全年一次预订，可以享受优惠。具体征订办法：

• 1995年度，每期定价3元。凡全年六期一次预定，订费18元，免收邮费。

• 老订户续订一年，九折优惠，全年订费16.2元，免收邮费。

• 订阅半年（三期），订费10元（含酌收邮费1元）。

• 零散邮购，每册3元，另加邮费0.70元。

• 订户若需用大16开信封和挂号邮资，请加以说明，邮资由订户自理。全年订阅，加邮挂费4元，共收订费22元。

《世纪》发行部地址：上海市复兴中路529号。

邮编：200025

联系人：宋建荣 杜曼丽

电话：（021）3278305

炎黄春秋



(藏达拉官喇嘛为登珠峰测峰高而游行)



(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接见外宾)

我和彭德怀交往十二年

我的军事外交官生涯

珠穆朗玛峰上的奇迹

张闻天在无锡最后十个月

老舍为何没领到诺贝尔文学奖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3.20 元